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总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真不知如何称呼龚育之才好！他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兼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既然访谈的内容限于学术理论范畴，就称他教授吧！

龚教授早年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后来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研究和当前党的政策理论的研究。已出版的这方面著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主编之一，1983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1986年三联书店）、《在历史的转折中》（1988年三联书店）、《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思想解放的新起点》（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1991年人民出版社）、《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1992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合著，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等。

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记者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采访了龚育之。

两位伟人：毛泽东与邓小平

记者：在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缅怀毛泽东的伟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问题又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龚育之：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应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来认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史和我们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

龚育之：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

这是作者答《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问，发表在1993年12月24日《经济日报》上，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一些补充。

联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记者：看来，您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指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伟人，不是没有所指的。

龚育之：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果暗中摸索。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记者：毛泽东夸邓小平“人才难得”，评价也很高。我听说，毛泽东还曾更具体地夸小平同志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光。有没有这回事？

龚育之：有。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小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了邓小平同志的那些优点。

记者：很有必要宣传宣传毛泽东对小平同志的这个“宣传”。

龚育之：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记者：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高的评价的大概不多。那式，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您认为有哪些共同点？

龚育之：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我看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讲共同点，我认为，强调“实事求是”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三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其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1989年5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我们今天也不能躺在前人的书本上，而要以前人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对新的实际去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要照搬具体结论，项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的科学成果要学习，要研究。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有的是苏联提供的模式，有的是毛泽东后期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记者：这个共同点太重要了。请谈谈其他的共同点。

龚育之：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也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八十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

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问题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记者：还有什么共同点？

龚育之：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犯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看不到中国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下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记者：希望使中国尽快一点富强起来，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点。

龚育之：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记者：在我印象中，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好像是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说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的人认为需要作些解释。

龚育之：这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

的正确性。

记者：请您谈谈这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吧！

龚育之：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记者：讲继承和发展，听起来似乎比较习惯些，把纠叫正也当作一条，而且排在第一条，恐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龚育之：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方面。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

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站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讲继承。讲继承这一条同讲纠正这一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讲得清楚。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人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势头相当强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记者：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

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总之，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记者：经您这一分析，我对小平同志的这段话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龚育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记者：继承和发展这两条，与“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飞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请您先谈谈“两次革命”。

两次伟大的革命

龚育之：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是要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从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这是十四大对党的七十多年

历史的一个新概括。

记者：“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中就提出来了。他刚提出时我还向您请教过。

龚育之：从思路来说，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那次全会前夕，他在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虽然小平同志过去多次提到这个命题，但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进一步作出了新的发挥。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就深刻他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因而就引起注意了，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文件。

记者：既然这是对我们党七十多年历史的科学概括，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成为我们党史、中国现代史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思路？

龚育之：现在，教科书通常还是把党史、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史分为两大段，一是民主革命时期，一是社会主义时期。我想，将来写党史，也许可以考虑分为三个时期，写成三大篇：第一篇为民主革命篇，写党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为社会主义前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中间又经历两次大的曲折，最后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为社会主义新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过程中，胡绳同志就提出过，在党的历史时期划分上，应该更加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七十年》一书还没有分三篇来写，但在结束语中讲了这个观点。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遵义召开的讨论会上和其它地方也讲了这个观点。

两次历史性飞跃

记者：“两次革命”的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纵览历史的大视角，似乎也为“两次飞跃”的提法奠定了逻辑前提。

龚育之：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为核心，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

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次伟大革命”是从实践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讲的。

记者：“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好像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

龚育之：是的。十二大报告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记者：这个表达只指出“两次飞跃”各“发生在”什么时间。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间，也就是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前篇”，也得有个说法呀！

龚育之：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说，这段时间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从实践上说，它是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第一次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既有重大发展又曾遭到偏离和歪曲。建国以后近三十年中，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和失误曲折交错，带来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党正是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并且在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新的重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大理论成果

记者：“两次飞跃”体现在“两大理论成果”上。对这两大理论成果的理解，都有一个科学、准确的问题。首先，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和理解，在历史上似乎就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

龚育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明确界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通过同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比较，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列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直是我们党认识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依据。

由于毛泽东后来在探索中犯了错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歪曲和篡改，特别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作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来宣扬，还由于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存在“两个凡是”即实质上坚

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潮，这就提出了一个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庄严任务。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实行整顿的时候，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提出了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7年，他又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开始了这个拨乱反正。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强调，总的指导思想上，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通过的《历史决议》，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历史决议》明确地具体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内容，并且把它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别开来，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涵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按照经过区分后的界定，只有毛泽东的那些正确思想我们才称它为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绝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要纠正这些错误。《历史决议》在肯定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的同时，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决议》还详细论列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方面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个《决议》是我们党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依据。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龚育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决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我认为，这种观点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做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都想动摇决议。

记者：曾有些搞理论的人认为，如果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思想，就应当把他的所有思想都算在内，如果错的不算，只算正确的，他们认为讲不通；他们主张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您的看法如何？

龚育之：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我们党用了这么多年，现在如果不用，政治上不利，也不合乎历史。而不合乎历史，也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难道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至于这个理论成果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既然过去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这

个理论成果，而毛泽东的确在创造这个理论成果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现在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取消这个称呼。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的许多观点，看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科学的理论成果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把它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

记者：您强调《历史决议》的权威，您所说的“权威”，是不是指它是通过法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确认的组织决定。

龚育之：这是组织权威。我认为，讲《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应包括两条，一条是组织权威，一条是科学权威。这两种权威相结合，才是最大的权威。光讲组织权威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个决议都具有组织权威，决议通过以后，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不合乎科学真理的地方，终归还是要加以改正。组织权威并不能保证党的决议必定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党的决议所确定的观点，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的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不通过组织程序，随便讲一通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就破坏了纪律，破坏了组织权威。当然归根到底，组织权威应该由科学权威来支持。如果没有科学权威的支持，不合乎科学真理，组织权威终归站不住脚，组织决议终究要改变。我认为，《历史决议》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动摇这个决议，既违背组织纪律，又违背科学真理。

记者：“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龚育之：前面讲纠正，是指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讲，那就是继承和发展。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加以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远远不止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能实现。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的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如实地了解和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同时又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有了新发展。

记者：理论上的这个新发展成果，是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系？

龚育之：已经开始形成。对这个理论新成果，在十多年实践发展的进程中，《历史决议》、十二大报告、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逐步深入和展开地进行了阐发。十三大概括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十四大又概括了九个重要方面。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归纳和概括方式。理论上确实有许多重

要的新发展。

记者：十三大以后，就有人主张把这些理论上的新发展称为“邓小平思想”。您认为此议可否？

龚育之：用个什么概念、语言来概括，这要中央下决断。十三大使用的提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看到的党中央的文献，有的提“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有的提“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这个理论的创立中的地位。十四大的提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看，这样的提法很好。缺点是作为一个术语，长了一点。好处是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它？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在毛泽东同志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点枝节的东西，而是有相当重大的前进，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开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邓小平论毛泽东

（一）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

一个是孙中山，
一个是毛泽东，
一个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孙中山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评价。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评价。

后继者对先行者、后一代对前一代的科学的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二）孙中山是在中华民族衰落到谷底的十九世纪末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面对着“虎视鹰磷”“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成为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口号。

孙中山的伟业，一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二是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新的革命斗争。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背叛了三大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拿着当招牌的孙中山没有多少好评。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那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左”的思想和狭隘情绪。是毛泽东，克服了党内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充分地、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这份政治思想遗产的宝贵价值。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科学评价，写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在他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在对七大报告作口头解释时说，我在报告里尽量把孙中山的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史辩证法的路。”

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对手国民党的缔造者作这样崇高的评价，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的极其宽阔的政治胸怀和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不仅在国共合作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仍然如此。他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和作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终卷篇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就表明了这一点。在1964年12月写的收入终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泽东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这是作者提交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毛泽东生平 and 思想研讨会”的论文，1993年12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19页。

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这里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不同于1958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释为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内从落后赶上先进的振兴和跃进。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始终是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把自己、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

（三）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努力，长时期内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击。红军被迫长征，证明了这种领导的破产。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如邓小平说的：“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由于领导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由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并在抗日战争中使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延安整风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变成了全党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1945年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很快，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二十世纪中国又一次更加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毛泽东因此而成为全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学习的指导思想。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总结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新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已经不成为问题。

然而，在这以后我们的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可是，在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却被强调地宣传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发展。对这些实践和思想的怀疑和抵触，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斗争和打击。从而造成了政治思想上极度的混乱和困惑。

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四）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的。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摆在这一代人之中。他曾经三次被打倒，都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有关。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第一次是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时毛泽东受排斥和打击，邓小平也曾被视为“毛派”而受到批判和处理。“毛派”这样的派别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视为一派，说明那时在思想和政策上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影响，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一个大解放区的领导人，在全党整风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他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就是确定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强调其指导意义并给以高度评价的最早的文献之一。从党的八大前后开始，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十年代上半叶，林彪以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名竭力制造个人崇拜，邓小平同罗荣桓等一起，对那时出现的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加给他的罪名很多，这成为其中的一项。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整顿中，邓小平特别指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重新提起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教训，这是针对“四人帮”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加给他的罪名很多，这又是其中的一项。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这样，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局面的关键。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切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

（五）邓小平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呢？

问题的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重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两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就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

（六）实现这个历史转折，经过了两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实践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而打破这个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这样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得好：“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他不以“凡是”的态度对待马恩列斯的本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如果说，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确立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议，那么，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新历史条件，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经过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又包括毛泽东晚年发生失误，中国的建设遭到重大挫折，这样的复杂情况），由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决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从批评“两个凡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七）邓小平指导制定历史决议，牢牢地把握住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摆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这两者的位置。前者是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4页。

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者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第二，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纠正这个错误，正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正是要把握这个契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四，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

第五，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第六，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

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这样一些指导方针和关键环节，都反映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其他许多文章中。

（八）作出历史决议，是一件大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内国外发生的风风雨雨中，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不动摇，继续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仍然是一件大事。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经常讲到我们党的历史，讲到历史决议和它所作出的历史结论。他还用了许多简洁的、鲜明的、一针见血因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语言，对这些结论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达。

“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他自己回答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12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8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03—304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55、263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2—263 页。

验后制定的。”

他正是通过讲建国后党的历史，来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十分重视 1957 年下半年以来“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于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意义。他说：“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我们的改革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那么一致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论述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决议的理解，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道路的理解，加深对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走回头路的理解，对于继续克服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无疑会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十年中，尤其是国内外出现政治风波的时候，总会出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冒头的情况。

1986 年有记者向邓小平说，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邓小平反驳了这种看法，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1989 年 2 月当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邓小平发出“中国不允许乱”的信号的时候，他又讲到：“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1991 年 8 月，当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时候，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论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这就是说，邓小平一直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以历史决议为武器，对否定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科学成果的种种错误思潮进行教育和斗争。

总之，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作出历史决议和坚持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9 页。

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决策表现出来的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个重大决策对于我们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的意义，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九）邓小平要求这一次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次历史决议作出的概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不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进入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早在开始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不久邓小平又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历史决议中，进一步加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条。

强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阐发的重要成果。

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三个要点统一的雏形。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有这三个要点贯串其中，这三个要点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具体的科学论点，我们都要学习和继承，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我们不能企望从前人的书本里去寻找解决新问题的现成答案。关键是要掌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去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新理论。

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十二大开幕词中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那两大段话，正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要点统一的最高概括。这三个要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4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5 页。

点，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十四大概括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指出的就是这一点。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说，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从开卷到终卷，这个活的灵魂贯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书。

（十）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继承和推进他的思想和事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 1956 年在孙中山九十五周年诞辰时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写道：“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现在我们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振兴的世纪！

论南方谈话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又在当前形势下，有鲜明针对性地重申和发挥了他的许多一贯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使这个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

许多同志指出，学习邓小平重要谈话，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再讨论，基本路线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加快建设的再推进。我看概括得挺好。

解放思想的再讨论

十四年前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解放思想的大讨论。那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恢复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在实践检验中不断纠正错误，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讨论真理标准，破除“两个凡是”，就是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的科学精神恢复和发扬起来。只有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才能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讲了，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

现在，形势要求我们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进行解放思想的再讨论，使党和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是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前提和先导。

要害是姓“资”姓“社”问题

这次解放思想的再讨论，一个重要问题，我看，就是要弄清楚如何看待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姓“资”。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从合作化以来：三次兴起，三次都被压了

这是作者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1992年4月1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

下去，因为它被判定为姓“资”，在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不被允许试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农民群众的这一创造才被允许试验，由于试验收到显著效果，三年功夫推广到全国，引起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村面貌的大变化。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比以前巩固得多了，农民拥护得多了。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为主要的责任制，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它姓“社”不姓“资”。

再一个典型事例是兴办经济特区。对于这个创议，也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中央采取允许试验、支持试验的方针。经过几年实践，正如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中说的：“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试想，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办经济特区这样的创议，不允许试验，一定要先问情、争清它姓“资”还是姓“社”，那么，我们的对外开放又会耽误多少个十年呢？历史还能等待我们多少个十年呢？

从根本的方向、目标而言，我们当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又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即我们头脑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必须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看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或者它们中的有一些只不过是隶属于某种模式、某种空想而脱离了生活的僵化观念。就人类进步的历史总进程来说，社会主义成为高于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要解决资本主义本身不能解决的固有矛盾，排除资本主义制度侵略、掠夺、压迫、剥削的罪恶，另一方面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成果和组织经验统统接受过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没有这后一方面，社会主义就不能充分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那种“宁要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谬论，只能败坏和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可是过去多少人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有一个正视现实、调查研究、开拓创新、大胆试验，从实践检验中去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设好的问题。在经济和科技工作中，对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形式和手段，不能因为它们曾被认定为姓“社”就加以固守。对于那些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成果、有利于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具体体制、形式和手段，不能因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就认定它姓“资”而加以拒绝。对于某种组织形式、协调手段，社会主义能不能采用，还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采用，要允许试验，用实践来证明。姓“资”姓“社”的结论，要做在试验之后，不能做在试验之前。如果一定要问清、争清姓“社”姓“资”，才允许试验，实际上就是故步自封，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试验。没有共识（共同承认它姓“社”）就不允许试验，没有试验又不可能取得共识。这是个死结。如果被这个死结捆住，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资”姓“社”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还有一个是有些东西确实姓“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却可以为“社”所用，对社会主义有利（如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允许下合法经营的外国资本、

港台资本和私人资本），也不能加以排斥。在改革的试验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我们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被认可了，市场经济却仍被一些理论工作者视为等于资本主义。有的文章以外国的经济学词典为依据，说词典中给市场经济下的定义包括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一条，所以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无法使人信服的。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典所下的定义，也不能作为出发点，何况是外国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词典所下的定义？更何况不同的外国词典还有不同的定义？讨论这个问题要从哪里出发呢？对此，邓小平有很精辟的论述。

1985年10月23日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邓小平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请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讨论问题的出发点。邓小平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是明确地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这个新观点的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美国学者时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像外国那本词典所说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以多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 and 计划的宏观调控下搞市场经济，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前面所引的邓小平谈话，我以为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邓小平还多次讲过，这次视察南方谈话又讲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邓小平反复讲这个问题，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形成的新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对邓小平这个新观点取得共识，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计划”和“市场”作为手段并不注定姓“社”姓“资”，从而更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有重

大意义。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又一场革命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鲜明地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深刻说明了 we 从事的这场改革的性质和意义。

有些同志以为，在这以前邓小平“还未明确地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念”。这不符合事实。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还是指邓小平倡导改革以前，也是指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前我国理论界的许多文章和讲话。至于邓小平自己，在这次谈话以前，已经多次讲过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这是有书报为证的。

前面引用的 1983 年邓小平同美国企业家的谈话，就讲到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1984 年 11 月 12 日邓小平同挪威首相谈话，也讲过“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更正规的场合，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讨论和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就是：《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其中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可惜，我们理论界未能很好地注意和领会邓小平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述的深刻含义，未能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宣传。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由此而来的自然的推论就是“改革是一场革命”。

有的文章说：“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商榷”云云，竟然包括什么“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之类的匪夷所思的责难。

1984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就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这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前夕说的。

第二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同日本二阶堂进谈话，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再过一年邓小平同希腊总理谈话，再次肯定这个命题：“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

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呢？我认为这是要让人们懂得这场改革已经和将要引起的社会变革的重大、广泛和深刻，是要动员人们高度重视、郑重对待这场改革，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这场改革。

这里需要从几方面划清界限。

一个方面的界限是：我们的改革决不是改变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改变，把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决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我们的改革也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虽然以“改善”社会主义相标榜，实践证明，它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继续下去只能葬送社会主义。

另一个方面的界限是：我们的改革不只是枝节的、细微的、日常性质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根本性质的变革，是机制的转换，是体制的革命，即“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因为我们这场改革对体制的变革带有某种“根本”性质，所以称之为革命。因为革命要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有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一个还需要奋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历史阶段，它是又一场革命，是我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次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82年9月1日)

(一) 写在前面

我这个报告，是一篇读书报告，主要通过摘录原著的重要论点、论述，来介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便于读者查阅并表明我的介绍是有根有据的，所引的论述一一交代了出处。我所作的编排，特别是我所作的评论，是否恰当，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几点看法：

学习邓小平著作的必要性 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学习马列基本著作、学习毛泽东基本著作同学习邓小平基本著作结合起来。第一部分学习是弄清本源，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由来；第二部分学习是结合中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第三部分学习是面向当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发展。学习不可能也不需要读很多书，三部分著作都要精选。但是三部分都不可缺，尤其是第三部分，不能把它看轻了，挤得没有位置。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随着各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用，没有过时。同时我很赞成邓小平同志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

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的科学著作，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在宣布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最近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针对当前的形势，论述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这篇谈话的许多基本观点，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曾经反复论述过，现在针对新的情况又有新的发挥，还有许多则是新提出的判断和观点。系统了解一下十几年来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学习视察南方谈话，是会有帮助的。

邓小平著作出版情况 主要有三本书：

(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987年人民出版社)；

(3)《邓小平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1987年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前一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拨乱反正，后两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全面改革。后两本书(主要文章)的外文译本，书名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除这三本外，还有散见于报刊、党的文献集(如《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1986年、1991年人民出版社)和邓小平专题论集(如《邓小平同志论教育》，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文章和报道，再有就是《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1989年人民出版社)。

许多没有收入文集的报道，包含有重要的论述，不可以忽视，下面引用的时候注明了报道的日期。

如果能够快一点把《邓小平文选(一九八二——一九九二年)》编辑出版，而且编得尽可能完备一些，不遗漏重要的东西，该多好啊。这是许多读者的迫切愿望。

邓小平和毛泽东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二是纠正，三是开拓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以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区别开来为前提的。没有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这一重关系，就没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继承和纠正这两重关系的综合，也就是拨乱反正。

还必须有第三重关系：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开拓新局面。全面改革，属于第三重关系。没有这第三重关系，也没有伟大的历史转折和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同美国记者华莱士谈话，说到“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而当华莱士强调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时，邓小平回答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同时他同意华莱士关于中国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观点，说：“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这些话，正好说明了上述的三重关系。

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 《历史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时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里讲的是毛泽东同以他为核心的那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对于邓小平同以他为核心的那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应该这样看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全党全民集体奋斗的实践经验成果。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和科学阐发的；有些观点是党中央文件和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同志首先提出和阐发，也是得到邓小平首肯和支持的。当我们说“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指的就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55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1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4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4 页。

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报告列举了十二个理论观点。头三个是：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

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不讲这三个基本观点。它们是这个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所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这个理论的逻辑起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作的一个中国化了的重要概括。毛泽东用这个思想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历史决议》）的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基本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这个观点的反面。“两个凡是”则是仍未能摆脱这种个人迷信的思想樊笼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且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3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64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21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09 页。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解释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

邓小平在上海表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当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希望。“思想更解放一点”，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前提和先导。

“走自己的道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密切的关系。把这三点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解释和阐发。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有共同远大理想的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运动，是统一的世界的运动。但是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本质上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的人民群众，寻找自己的道路。统一的模式和统一的指导中心，是不能有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来源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道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已讲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在十二大的庄严讲台上更加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现优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最先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名言的场合。紧接着邓小平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邓小平还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43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7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49、150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7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3 页。

义。中国不以别国模式为社会主义范本，因而不同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共命运。我们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来掌握，由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我们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来掌握。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础的组成部分。不是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吗？“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就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它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所应当依据的实际基础。

最先作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都对这个论断有所论述。十三大报告以这个科学判断作为立论的基础，是报告了邓小平的。邓小平批道：“这个设计好。”十三大闭幕后，邓小平同日本社会党土井多贺子谈话，说到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后来，在同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谈到中国过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左”的教训时，又总括地说：“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离开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离开特定的国家来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容易流入空想，为固定的“模式”框死。提出“中国特色”，提出“初级阶段”，开启了不是从外国模式、一般原则或主观空想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门。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1986年春季以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规划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步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至少要实行到下世纪中叶的基本路线。正如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和不断丰富发展。它的提出，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基本经验，否定了盲目追求“纯粹的”“高级的”社会主义、认为很快将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实事求是地规定了当前和今后很长历史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任务。可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寻找中国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指出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决定了中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党宣布了过渡时期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

的总路线，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论述：“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初设想大约要十八年，后来过于急促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被缩短为七年。过渡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时没有能够很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反而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相当影响，这成为后来“左”的错误的由来。经历过曲折，总结了教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几个依次连接的发展阶段，显示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构

这个理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需要形成一个框架结构。这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讨论的课题，会有不同意见和不同设计。各种设计可能各有短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概括，我认为既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公式，也为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这个公式是不是邓小平自己的概括？它是十三大的概括，也是邓小平的概括。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改革开放，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邓小平最先提出和反复论述的。不仅如此。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作出这样的概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三大的概括就是由此而来的。

1989年风波之后，邓小平一再说：要继续坚持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十三大报告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讲的，只是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思想理论的高度认识工作中心转移的必要和意义，邓小平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时候，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精装本第34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8页。

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这里不单纯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定中心任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问题。邓小平反复说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这一点尤其尖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是针对着“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来的，也是总结这方面长期失误的教训提出来的，同样涉及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跟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土走。”邓小平用这样的话来警醒我们尽最大努力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坚持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的重大贡献。

“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号。邓小平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下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80—18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7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7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4、225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1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14页。

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

这些话，既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为那时以后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预先定好基本的对策。这样的觉悟和决心，在最近几年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对我们的事业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和指导作用。

“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联系着主要矛盾。邓小平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把确定中心任务同确认主要矛盾统一起来，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确定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是统一的；由于未能顶住随后出现的国内外一些事件的干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却又讲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这种不一致不可能长期维持，终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确定中心任务和确认主要矛盾的统了。近两三年，国内外发生了更严重的事件，我们党冷静地正确地估量形势，不受干扰，仍然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不动摇（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重申了《历史决议》和党章确认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证明我们党比八大的时候成熟了。

“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根本任务联系着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根据这样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道：“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十三大报告中写道：“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0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81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64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并发挥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和重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彻底性和政治上的自信心。我们坚信自己政党的政策，自己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能够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好。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作百倍的努力，作长期的奋斗，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的优越性。对生产力标准的一些简单化庸俗化误解和曲解必须澄清，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由此而怀疑或否定生产力标准。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有自信心的共产党人应有的观点和态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位。邓小平 1975 年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经济和科技工作的破坏（包括对党关于科技工作的政策思想和指导理论的破坏），以马克思“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的论述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批邓”，《汇报提纲》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批判者竟然认为：“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论点；还说什么“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这种批判，不但反对马克思的命题，而且反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完全是逆历史而动的。粉碎“四人帮”，了结了这场荒谬批判的历史公案。1977 年邓小平复出工作，立即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的观点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且展开论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观点，首先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这就纠正了扰乱我们多年的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从总体上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恢复了 1956 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和 1962 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确定的关于现在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观点。

1988 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和同中央领导同志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9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7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65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7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86 页。

话时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概括。它是从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中提出来的，又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登上新台阶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在提出这一新观点前后，邓小平还说过：发展科技和教育是我们发展战略的“第一位”。“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在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91年4月23日还为科技界写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要求高科技的突破带动大批新产业的发展 and 旧产业的改造。

（五）坚持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根本政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这个政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同另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依存的”，都是围绕着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今后还要坚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这是党的路线的新发展，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

“改革是必由之路” 邓小平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既从正面又从反面反复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5 页。

1987 年 11 月 11 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27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8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5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9—150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40 页。

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他要求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不要回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有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1989年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就在6月9日的讲话中鲜明地回答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在1989年9月4日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这些话表示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于这项伟大事业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推进的坚定信心和殷切期望。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这是关于我们的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的一个重要命题。邓小平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这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前夕说的。

追溯这个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即已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这以前，邓小平已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和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在这以后，1982年邓小平又讲“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并且指出：“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984年针对“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邓小平又指出：它“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如果说。这两处提法是对某一项改革说的，那么，“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个命题，则是对整个改革事业的性质提出来的。

不久，邓小平同日本二阶堂进谈话，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重要命题。

是不是邓小平偶尔讲过这么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讲了呢？不是。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25、14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51、352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

1986年同希腊总理谈话，再次肯定这个命题：“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在这期间，类似的提法还有多次。比如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革命”。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则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由此可见，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要实现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成为他反复申述的一个重要论题。

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呢？因为我们的改革不只是枝节的、细微的，日常的、纯粹量变性质的变革，而是在社会主义这个总的质的规定性的范围内发生的带有某种程度和某些部分的质变性质的变革，不只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而是对原有体制的革命，即“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南方谈话，再一次强调了改革所要求的经济体制变化的根本性质，并且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深刻命题。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通过不久，邓小平即已说过：“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从而把改革、革命、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1985年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还说：中国的改革“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更能解放生产力”。1987年，他又说：十二大“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因为我们这场改革对体制的变革带有某种“根本”性质，某种质变性质，所以称之为革命。因为革命要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有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一个已经奋斗了十多年、还需要奋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完成的历史阶段，它是又一场革命，是我国人民夺取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次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一场试验”在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同时，邓小平强调：“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一个大胆的试验”，“一个重大的试验”，“一场伟大的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

1986年4月9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1985年10月15日新华社讯。

1986年9月14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1984年11月21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149页。

1987年12月25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

1985年7月2日新华社讯。

是一个大试验”；是探索“一条新的路”。

既然是试验，探索，新事物，新路子，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来从事，遵循怎样的指导方针来进行呢？就是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估计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有点风险的”[\(11\)](#)；“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当然“不能蛮干”；“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他还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我们不能避开风险，这个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

总之，“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要坚决地改，不丧失时机”；步子要稳，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11\)](#)

还有一个原则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只要这样，“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12\)](#)

所有这些论述，同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风貌，充分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开拓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

改革中的姓“社”姓“资”问题 改革中敢不敢闯，敢不敢试验，遇

1985年11月11日新华社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3页。

1985年7月15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

1988年7月9日《人民日报》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到一种思想困惑，就是怕学习和利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某些经济形式、手段和方法，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姓了“资”。

邓小平早在1979年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就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979年11月26日同《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谈话时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这个提问时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1985年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又说：“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从根本的方向、目标而言，我们当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同时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又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即我们头脑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必须拿到实践中去反复检验，看它们哪些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哪些并没有真正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可是过去多少人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有一个正视现实、调查研究、开拓创新、大胆试验，从实践检验中去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设好的问题。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句话，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且表述了我们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改革战略。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开辟自己的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首先进行农村改革来打开局面。这说明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上一直占据在极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农村的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包产到户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群众创造。从实行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屡次兴起，屡次被压了下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以后整顿农业

《邓小平文选》（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1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页。

合作社的过程中，出现了包工、包产之类的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核心的农村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些尝试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二次是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在错误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三次是停止“大跃进”以后的调整时期，这次兴起的势头很强，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当时邓小平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支持这个创造。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态度，也是生产力标准的运用。“白猫、黑猫”的比喻，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当时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开会研究。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这种主张遭到批判，又一次被压下去了。总之，在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时间里，这一群众创造一直不被允许试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形势和条件大不相同了，群众重新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自动地实行起来。安徽等省首先予以支持，在推行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在中央，邓小平予以支持，肯定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这样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的农户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新体制，几年功夫就逐步在全国推开，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迅速扭转长期停滞或提高缓慢的局面，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很快发展起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不姓“资”。实行这种责任制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比以前巩固得多了，农民拥护得多了。农村改革起步的成功，奠定了整个改革事业的良好基础。

中国农村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是兴办乡镇企业。这也是群众创造，邓小平给予热情支持和高度评价，他称赞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这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大创造。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早在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讲话中，在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時候，邓小平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75、27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第142页。

小平反复申述过这个政策，说这是“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所谓老办法，就是平均主义的共同贫穷。而新办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订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时期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制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提出来的这个命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经济方面所作的一个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回答。第一讲生产，没有生产发展就会是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谈不上共同富裕；第二讲分配，讲发展生产的成果归谁享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招，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同跟华莱士谈话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命题，显然是相通的。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和本质，又不是要求同步走向富裕，而是有先有后走向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很有新意。在这个概括里没有提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当然不是说可以忽视这两条。邓小平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但是，突出“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来概括社会主义原则，我以为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共同富裕是结果，所有制要通过财富分配的实际结果而体现出来，公有制是保证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的条件。问题的本质正是在发展生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从本质上来观察和考虑问题，就要求我们根据最有利于实现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来寻找社会主义当前阶段最合适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结构，而不要离开这两条原则去追求“最纯粹”、“最高级”的公有制和分配方式。

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一方面同不要公有制作为主体的私有化主张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区别于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公有制经济的传统观念。在一定历史阶段，个体经济（和一定范围的私有经济）、外资经济，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也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

需要寻找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两极分化划清了界限。它包含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包含了按劳分配以外的个体劳动收入，以及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还包含了反对非法致富和对收入实行适当调节。这就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调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打开了广阔的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展开了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一种指导的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表述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概括，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作出这个新概括，源于邓小平讲过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他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的会议上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随即又在中央顾委全会上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

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说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我理解，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和计划调拨的产品经济而言的。是商品就要通过市场交换，因而充分社会化了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再是完全无计划的，不仅托拉斯内部有计划，由于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计划了。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改革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根据实践的经验，应该如何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计划经济（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如果计划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专有，那么，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为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社会可不可以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

1985年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邓小平又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

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是明确地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和市场的问题，说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观点。

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时候明确声明：“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总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多次讲这个问题，南方谈话又讲这个问题，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形成的新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专就对外开放来说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要求，相互促进。如同不改革没有出路一样，“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不开放“没有出路”。邓小平还用这样的语言概括了我们的历史教训：“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9年6月9日的讲话又说：“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实行封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把对外开放提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社会主义先在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经济和科技先进并且仍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共存，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外开放以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东西来发展社会主义，就是必须极力争取的了。我们建国后对苏联开放，但受资本主义封锁，后来苏联也封锁我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际国内形势起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地把握这种变化，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表现了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

“经济特区好”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支持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海南岛的开放，上海浦东的开发，等等，初步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1984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后来他再次回到这个话题，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14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1986年11月14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

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这次视察南方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诚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个大政策。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这是一大创举。

“政治体制改革”从农村改革发展发展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对内改革推进对外开放；同经济的改革开放相适应，还要逐步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逻辑。

1980年，邓小平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后来，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题。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就国内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要发展的民主，当然“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邓小平历来反对宣传抽象“民主”，要求牢记“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教训，要求把对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效率、民主与集中、民主与党的领导的权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为规划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在为政治体制改革勾画蓝图的时候，邓小平提到“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到“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各级的关系；提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归根到底把目标放在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上。“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围绕并且服务于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1988年5月19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0—30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决定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而载入史册，这些决策当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随即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而发的，同时指出：极左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批判，今后还要继续批判，不能放松。上面列举的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都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下面列举的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都贯穿着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个坚持 “两手抓”是邓小平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按辩证法办事”的具体运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个坚持，这在“两手抓”的战略思想中是带总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历来的东西，但是在工作中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来讲，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具体针对性。把四项原则同改革开放作为总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一方面表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表明我们事业前进到新的历史阶段。这样既保证改革开放有清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又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发展。

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说：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中国社会主义。除了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是“两个基本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6月9日讲话说：“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 改革开放实行不久，1982年邓小平即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1986年邓小平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认为犯罪活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在总结1989年风波时，邓小平指出，他早就强调“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今天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他认为，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不力是我们的一个失误，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一方面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抓紧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

这次视察南方，邓小平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经济犯罪、腐败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决不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也不是改革开放所应该容忍的。改革开放为这些消极现象的滋长带来许多新的条件，也使我们同这类现象作斗争遇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如果放松斗争，这类现象就会恶性发展，引起人民的不满。而打击经济犯罪、扫除“六害”和惩治腐败的工作抓得愈紧，愈有成效，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篇祝词同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相呼应，成为最先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任务的两篇重要文献。第二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着重论述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体制改革、打击犯罪、党的整顿相并列，称之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十二大报告在全面概括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5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6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2页。

征”，缺了这一条，就“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这个方面，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方针，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为我们历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又如：只抓经济，不抓教育，“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还有：精神文化活动和精神文化产品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等等。他特别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建设这个方面，认为讲理想、道德和纪律，讲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优势。“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

而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稳定压倒一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保持稳定，是邓小平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他早就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所以，不能让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来搞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1987年初，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989年初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只有政治稳定，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发展民主，同时也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有真正的稳定。所以邓小平说：中国发展的条件，“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0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16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7、20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3页。

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社会要在稳定中发展，这是总结中外历史经验而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科学结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反社会主义思潮，这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有其国际、国内的原因。如何对待这种思潮，关系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左”的教训，就是扩大化，斗过了头，斗错了人，甚至是非颠倒；也有过右的教训，就是斗争不力，软弱涣散，甚至姑息纵容。这两种倾向都会给社会主义造成极大危害。邓小平以主要力量坚决纠正和防止重犯“左”的错误，同时一再提出要注意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他就提出了批判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的任务。后来，他把这种思潮称之为“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明确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一方面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这个斗争的政治尖锐性，另一方面又有利于防止滥用“咱由化”概念而导致扩大化。

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任务，“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随后又进一步指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防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搞和平演变。抵御和平演变，用什么思想做我们的旗帜和武器？只能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做我们的旗帜和武器。只有站在这个新的思想高度和历史高度，才能正确地有效地进行这方面的斗争和教育。归根到底，要靠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导下，努力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搞好，把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说，我们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他要求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作科学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也不应该“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根据这个精神，党章规定要“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6、217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28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4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8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4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95、297 页。

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精神文明决议规定要“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

阶级斗争“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为纲”也就是当作主要矛盾。随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邓小平回答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在邓小平这个论断的指导下，经过反复讨论，在《历史决议》中，形成了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范性的概括：“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已经写进党章的总纲中。这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一个主要理论成果，也是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基石。

按照这样的理论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又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已经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包括1989年风波的考验。这场风波的出现证明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的确可能激化，而我们党果断地解决这场风波，又不因此而改变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仍然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从而证明我们党在理论和路线上的坚定和成熟。

“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反复说：“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他一方面指出：“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又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鲜明地抵制了当时国外甚嚣尘上的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多党制”喧闹，又强调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党政、党企关系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本来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我们党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几乎完全被弃置了，邓小平在新时期恢复并发展了这个制度，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邓小平强调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来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9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30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0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257页。

来保证”。他说：“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为此，提出了干部队伍在革命化的基础上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他还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强调要选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领导机构。

（七）祖国统一和对外关系

在国内发展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要求在解决祖国统一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定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先是为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而设计的，后来用于解决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我国主权的问题，已被中英、中葡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草案所接受。港澳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力地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

“一国两制”是现实可能的最佳设计。它是从中国几十年、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的现实出发的，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共同愿望出发的。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是不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立场？恰恰相反，这个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的主体（大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身边，“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点勇气，没有点胆识，是不可能制定出这样的政策的。这就叫做实事求是。“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这是个新事物”，是“一个新发明”。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创造。

“一国两制”作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重大争端的引起世界注意的有效努力，由此而产生了又一个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个设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外交方面的一个创造。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国内有个稳定的环境，在国际上有个和平的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取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75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95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86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3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8 页。

1988 年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9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05 页。

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对客观形势的清醒判断和对外交方针的正确把握。

“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这就说明了国际形势的估计同国内方针的确立之间的关系。由国内方针的确立，“调整了对外政策”。“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

邓小平一方面根据当代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突出问题或根本问题，并且认为经济问题是“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出这个判断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恰恰是要求全世界人民为解决这两大尚待解决的问题而斗争。为此，他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应该是发达国家的要求”，因为“从长远讲，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继续落后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

“党和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在总结国内发展的经验教训，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也从总结我们党过去同外国党论战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处理同外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新原则。后来党中央把它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邓小平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9—25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4 页。·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5 页。

1988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讯。

198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讯。

1989 年 9 月 19 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78—27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6 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79 页。

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意识形态方面。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方面，邓小平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近年来一些外国党和原来由它们领导的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坚持上述的原则，并且根据新情况，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的方针。“冷静观察”，包括对国际局势变化趋势的冷静观察和全面分析，也包括对一些外国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冷静观察和全面分析，以便于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变动中善于自处，同时借鉴外国党的教训来巩固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沉着应付、稳住阵脚”，其中就包括要沉着地、稳稳当当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八）结束语

在结束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在总的方面还要介绍两个论点，提供一点看法：

“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以来，邓小平多次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声明：我们党确定的新的路线和政策不会变，不能变，不许变。这样做是因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每出现一点新的情况，在人们头脑里就会发生政策会不会变，要不要变的问题。

1980年贯彻调整方针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指出：在调整的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1983年邓小平又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

1984年是邓小平讲“不变”讲得次数最多的年份。2月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4月他说：“如果路子对，谁也不能改变，因为那样做不得人心。”6月他说：有人担心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10月初他同港澳人士谈话：“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78—27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1—32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1页。

1984年4月18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页。

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10月下旬他在中顾委讲话：“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

再一个反复讲“不变”的年份是1987年。1月他向外国来宾说：学生闹事和党的总书记更换，“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3月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4月更进一步说：“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1989年风波以后，邓小平在6月9日的讲话中尖锐地提出：“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对这个“大的问题”，他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没有错。”“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他同李政道谈话时说：“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

这次南方谈话，中心也是这个“不变”问题。

由此可见，党的基本路线不变，在本世纪和下世纪都不变，一直是邓小平关心的一个总的主题。其所以不要变，最根本的是因为它使广大人民得益，为广大人民所拥护，改变它，人民会反对，坚持它的人，最终会胜利。

“警惕右，主要防止‘左’”在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防止和反对“左”的和右的干扰，是邓小平一直关心的又一个总的主题。并不是工作中和思想上的一切偏差和错误都要上到“左”或右，远远不是，大多数不是。但是，如果涉及从方向上背离基本路线，背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就确实会发生“左”和右的问题。“左”和右的倾向发展下去都会葬送我们的事业，都必须防止和反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1—20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3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6页。

就既讲要批判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又讲要批判从右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1981年3月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他赞成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意见，同时强调：“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写历史决议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些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

1983年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同时强调“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来批右，“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

1985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左”的大亏，“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1987年初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有的干扰。”4月他重新强调：“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7月重申：“‘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这就为十三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明确了指导方针。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基本观点是：既反“左”又反右，坚持辩证法，不搞片面性，任何时候都没有讲过只要反“左”，或只要反右；从不同时候的具体情况出发，有时这方面侧重一些，有时那方面侧重一些，但是决不容许用“左”来反右，或者用有来反“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动乱这些右的东西，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时强调从拨乱反正来说，从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说，主要是反对和防止“左”。为什么？他讲过许多理由：“左”的“根子很深”。“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左”的错误“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文选》（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第152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34—33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34页。—9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254页。

是极左。”由于根子深，时间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而改革的历史任务，正是要根本上改变在我国已经形成为体制和习惯的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因此，在改革的进程中，要警惕和反对右，主要是防止和纠正“左”。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创造性 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新的科学成果。它的正确性，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所取得的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证明，尤其为近几年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中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所证明。在经历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之后，在东欧和苏联局势接连发生剧变之后，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稳住阵脚，就是因为十多年来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看到光明的前途，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党现在的基本路线；就是因我们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理论和路线沉着应付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不因这些干扰而动摇和偏离我们党现在的基本路线。我们今天的稳定和发展，依靠这一条；我们今后要保持稳定和更快发展，还要依靠这一条。

现在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眼光看问题，社会主义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挫折，乃至一时和局部的失败，不过是展示了人类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总进程的曲折性。曲折或小或大，这与主观指导和努力的正确与否和正确程度有很大关系，所以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实现对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指导。但是历史的曲折发展，这是客观规律。困难和挫折，考验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从总结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克服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的斗争中，朝着更加健康的、更能反映和指导时代潮流的方向获得创造性发展。邓小平不愧为当代中国坚定不移的、勇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坚定性和创造性的体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8页。

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 ——围绕邓小平有关论述的对谈录

客：1992年4月份你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颇受注意，特别是其中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介绍了小平同志的几段没见人引用过的有关论述，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和兴趣。

主：是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那篇《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汇报》上发表的那篇《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新华文摘》六月号收录了。趁此机会，我又改正了两文初次发表时的一些错字和几处误排、漏排。

客：听说也有争议吧？

主：有争论是好事。百家争鸣嘛，自由讨论嘛，实践检验嘛，只要不是用大帽子吓唬人就好。

客：有些什么争议？

主：大概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问题。

小平同志的六次有关论述

客：小平同志论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所谈的那些意见，很重要，给人很大启发。

主：我觉得，小平同志的论述，最重要、最给人以启发的，还不在那些论述的细节，而是在于他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问题，同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贯串在他的有关论述中的一条红线，就是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只有遵循这样的思想路线，才能找到正确解决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问题的门径。

客：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很多吧？

主：在我的那篇读书笔记中，介绍了五段。最近，报上发表薄一波同志在“《半月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颁奖会上的讲话，又介绍了没有发表过的一段。这样，一共有六段：（一）1979年11月26日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二）1984年10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三）1985年10月23日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四）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五）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这就是薄一波同志最近介绍的；（六）1992年1月到2月的南方谈话。

客：除了这六次以外，听说还有谈话涉及这个问题。

主：我也听说过，但是，迄今为止在各种文献中发表了，我看到摘了卡片的，就这六次。

客：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小平同志这六次有关论述的背景和内容？

第一次论述的背景和内容

主：先讲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同吉布尼等人谈话那一次。这时，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到一年，历史决议起草刚刚酝酿。谈话广泛地涉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客：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一些好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

主：确立这样的指导方针，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去试验一切可用的好方法，在实践中去决定取舍和加以发展，而不是首先从观念上拒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方法，才有可能接受和确立这样的指导方针。

客：小平同志就是从这样的指导方针谈起，谈到市场经济问题的吧？

主：正是这样。在谈话中，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他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还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

客：小平同志认为肯定不正确的观点，是什么人的观点？

主：我想，有两类人持这种观点。一类是资产阶级的许多论者，他们赞美资本主义，赞美市场经济，反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这种好东西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的，不能搞市场经济。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死了。一类是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者，他们同前一类人立场相反，而论据却相同，他们也认为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他们也把社会主义看死了。

客：两种都是教条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

主：不妨这么称呼。当然也不必一定这么称呼。总之，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僵硬观念上敲开了一个缺口，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并不是不可以兼容的，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思路。

客：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这是第一次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吧？

主：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且给以初步的界定和说明来说，在党的文献中恐怕是第一次。从破除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市场经济的观念来说，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以前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客：什么时候？

主：远的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久，在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对经济问题讨论得很广泛。务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

客：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与一年以前这次讨论有关吧？

主：我想恐怕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

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认为主要的缺点就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认为导致这种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就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从这种探讨中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这是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但又是必需的。

客：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的由来吧？

主：当时领导人们讲话，有用这个提法的，也有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还有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或“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思大体差不多，提法没有定于一。提法上的一些差异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

客：1979年11月，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与这些探讨有关吧？

主：恐怕是的。当时理论界还有更展开的探讨，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光明日报》1979年3月17日关于一次理论讨论会的报道，题目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报道中介绍，有许多人主张结合，阐述了结合的好处和方法，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有不赞成的，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它结合”，“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抬头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另一个材料是吴敬琏同志最近（8月1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谈话。他说那时理论界有些同志已经提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新的思想和提法。

客：哪些经济学家？

主：比如，薛暮桥同志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就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但在理论界也有不同意见。有的文章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并且批评说，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如果按照商品经济原则，把国营企业改变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确认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不是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而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客：结果呢？

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报告的提法

主：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中形成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规范性提法：“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确立这个提法。比起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点，是党的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一大前进。

客：不过这里还没有使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提法。

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报告中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这同历史决议中的提法是一致的。但是，十二大报告确认了计划应该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部分的新思路，从而纠正了通常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就是指令性计划的传统观念。报告中还强调，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这些都是历史决议中还没有的，表明党的理论和政策思想比历史决议又前进了一步。不过，十二大报告中也还没有使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提法。

客：党中央形成了规范性提法，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以前党中央领导人不同子规范性提法的那些提法，都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因而以后不要再用，以后都要用已经确定的规范性提法，改变过去不合乎规范的提法？

主：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通常，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中央已经确定某种规范性提法之后，总是采用这种规范性提法的。仔细想来，党的决议形成的规范性提法同过去的一些不同提法之间的差异，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过去的一些提法经反复讨论和实践检验证明为不正确或不准确，那当然不要再用；第二类情况是，过去的一些提法同规范性提法，在提法上虽然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不同或者并不互相排斥，那就没有必要非得处处用规范性提法，不许用有所不同的其他提法；第三类情况是，有些提法并没有错误，甚至是创新的、前导的，只是还没有在决策圈取得共识，所以还没有被采纳为规范性提法，将来取得共识，就可能被采纳为规范性提法。

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属于哪种情况？

主：我想，至少不属于第一类情况。我推测，小平同志也不认为属于第一类情况。

客：何以见得？

主：因为小平同志后来并没有放弃使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提法，现在介绍一下小平同志有关论述中的第二次。

客：等一等。刚才介绍的第一次论述，小平同志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你是从哪里引用来的？

主：1981年9月，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刊物，刊载了一组辑录的文献，题为《邓小平副主席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的讲话摘编》，其中摘录了小平同志同吉布尼等人的谈话。我的两篇文章，介绍了小平同志的这段谈话，就是从这里引用来的。

客：来源可靠吗？

主：查对过了，是可靠的。不仅如此。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同吉布尼等人谈话的全文，早已收入《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内部发行的，印数有十万册之多。

客：啊哟。可是理论界似乎大都不大了解有过这么一篇有关市场经济的谈话，都还以为你有秘本呢？

第二次论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主：从我看到的文献来说，小平同志第二次谈到这个问题，是1984年10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客：在1979年谈话到这次谈话的五年间，有没有再谈到“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相结合”，或者“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主：大概会有吧。小平同志第二次论述到这个问题的讲话，背景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经济改革，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加上专业户的大量发展、农产品价格的初步调整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部分放开，几年功夫，成效显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迅速提高，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城市经济搞活也已起步。形势要求我们把从农村开始的改革推进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形成统摄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战略决策和理论指导。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适应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上一次更大的前进。它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它还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确认必须“逐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在两年多前，这种观点还是受到公开批评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时，小平同志即席讲了几句话，对这个决定有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接着召开的。小平同志在这次顾委会上的讲话，已经选入公开发行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这次讲话比较展开，称赞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是个好的文件”，是“纲领性文件”。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

客：又是讲解放思想，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思想路线。

主：这是贯串着的一条红线嘛！强调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强调新话，也就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平同志在别的地方还说过：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89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作过简要报道。

客：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是新的思想观点。

主：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新的思想观点。这个新的思想观点从何而来？小平同志强调它是从实践中来的，特别是从前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提高。实践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理论争论中实践最雄辩。

客：听了你刚才介绍的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有赞同、有反

对的那些讨论，对于小平同志为什么说这个文件几年前写不出来，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增加了理解。

主：小平同志了不了解理论界的这些讨论或者了解到何种详细程度，我不得而知。反正小平同志了解，多年来在我们的队伍里只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总把商品经济视为异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传统观念很顽强，没有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成就，要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是因为他在中顾委全会上讲话，对象是老同志。我们这些人也可以算是老的理论工作者了。解放思想，我们老理论工作者有这个任务。

客：中央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中央确认的规范性提法，理论界取得了共识吧？

主：至少为取得共识提供了基础。《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决定》在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指出：它“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这就是否定市场经济；有的则认为，这只是否定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般地否定市场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代市场经济，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已经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受到政府干预、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而不再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理论界赞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也申明并不主张社会主义实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客：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通过，是不是意味着既已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规范性提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就不应该再使用了？

主：我看不能这样说。至少许多人认为不是这样。我看，小平同志也认为不是这样，证据是他后来谈话仍然不回避从正面使用市场经济的提法。这就要讲到小平同志的第三次有关论述了。

第三次论述和生产力标准

客：就是 1985 年 10 月小平同志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那次谈话吧？

主：这次谈话的时间，刚好是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通过一周年。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向小平同志提问。他问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小平同志回答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段谈话由新华社于 10 月 23 日发了消息，第二天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的。

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强调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理的实践标准，运用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根本是非标准，也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研究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客：记得你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曾经引用小平同志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讨论问

题的出发点，批评了那种把外国词典的定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

主：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不从定义出发，而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我看到有的文章讨论市场经济问题，以外国某种经济学词典为出发点，说词典中给市场经济下的定义包括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这样一条，所以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我是针对这种意见来发议论的。我说：“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典所下的定义，也不能作为出发点，何况是外国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词典所下的定义？更何况不同的外国词典还有不同的定义？”我的这番议论，引来一种质问，说：讨论问题难道可以不用定义吗？这完全是误解。不能从定义出发，不等于不要用定义。讨论问题，表达思想，运用概念，概念就得有定义。但是，定义是多样的，是变化的。讨论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其中就有要根据实际来检验、分析、选择、创造定义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实际，包括已然存在的实际，发展变化的实际，正在开拓创造中的实际。说市场经济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这样的定义，顶多反映已然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实际，连资本主义某些国家有若干国有财产这种实际也未能反映，更谈不到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这种开拓和创造中的实际了。其实，有的外国词典，例如英国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就有所不同。它给市场经济下的定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而价格则是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自愿交换产生的。”这个定义并没有把私有财产制度包括在内。市场经济同所有制的联系问题，这本词典的说明是：“市场经济通常也包括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然而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作用。”我并不认为这本词典的定义就完全符合发展变化、开拓创造中的实际，但是显然比那个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定义要高明一些。最近看到《国外理论动态》介绍的法国经济学家勃拉尔顿的一篇文章《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企业，其当事人是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能自由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企业家的决策自由和责任可以同各种不同的产权形式相一致，这些产权形式是：私有产权，混合产权，国家产权等等。标志着市场经济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不是企业的法律地位，而是企业家的决策自由和责任”。他所说的法律地位，即所有权的法律属性。这篇文章对市场经济同所有制的联系的看法，就更加开放了。

客：你认为市场经济怎样定义为好？

主：这要经济学专家来认真研究、讨论和表述。我以为，从我们一般讨论问题的需要来说，把市场经济定义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也就可以了。用这样的定义，而不是用“市场经济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本原则”的定义，才有可能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当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仍然不是定义，包括我所赞成的定义，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成就和经验、问题和出路实际。

十三大报告和第四次论述

客：请再介绍小平同志第四次有关论述的背景。

主：1987年10月的十三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思想，比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又前进了一步。十三大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作出的决策。十三大报告没有重申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所说的“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请注意，决定中在这个地方用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在全社会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当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报告中还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必须是竞争的 and 开放的……

客：这些思想都很明确啊！

主：十三大以后，理论界有些同志建议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们认为比较发展的、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认为有商品就有市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两者可以视为同义词，他们认为，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可以突出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特征，指明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我是基本上赞同这些意见的。1988年我写了一本书《解放思想的新起点》（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写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充分发展的，现在还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排斥和限制商品经济，而高度集中行政管理的产品经济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和某种特定任务上是有成效的，一般来说，已经证明是缺乏活力的。现在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在这个基础上搞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是个新课题，是难点又是特点。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因为要搞市场经济，这就要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吸取那些反映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共同规律的文明成果，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品，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对于这类观点理论界有很不以为然的。

客：后来呢？

主：小平同志第四次论述到这个问题，是在1989年6月9日的讲话中。当时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小平同志在那次讲话中尖锐地提出：“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这是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问题。小平同志明确地回答：“没有错”，“都不变”，十三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

客：这个“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当然包括我们党在改革十年的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许多新的理论和政策思想。

主：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随后就公开发表了。

客：这个讲话中，是不是又讲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主：在公开发表稿中，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客：当时的背景就是治理整顿吧？

主：治理整顿时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小平同志把它看作一个时候在实际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措施，至于作为方针、原则、指导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与计划这些问题上已经形成的那一套，不能改。

客：不能往回改。

第五、六两次论述的背景和内容

主：小平同志第五次论述到这个问题，薄一波同志在《半月谈》1992年第15期作了介绍：1990年12月间，他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客：1991年3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引人注意：“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段话是不是本着小平同志1990年12月那段谈话的精神，或者小平同志另外作过的谈话的精神来写的？

主：这我就知道了。

客：小平同志这时为什么提起“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主：据吴敬琏同志的那篇谈话介绍，理论界有不少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的文章，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基本制度直接联系，认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些文章运用跟1984年以前批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体相同的论据和语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只能以私有制为基础，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混淆了”，“甚至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这实际上是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突破的传统观点来否定全党已经达到的共识，是认识上的后退，是往回改。

客：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的背景，恐怕同这些情况

有关吧？

主：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鼓吹私有化，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批判。如果把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当作它的理论基础来批判，那就应该说是方向、政策把握得不准了。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否，在理论界完全应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问题。

客：小平同志今年初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其实是重申他以前讲过多次的思想。

主：这第六次论述是重申，又有新的发挥和发展。他还是首先从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提出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客：这跟 1985 年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强调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是一个思路。

主：邓小平同志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有的同志理解为：合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姓“社”，不合乎的就姓“资”。我看这不准确。比如说，过于高度集中的、完全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不合乎三个“有利于”，但是，你能说它姓“资”吗？吸收国外投资，合乎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政策，但是，也不好说，“三资企业”都姓“社”。顺便说一下，三种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简称为“三资”，不贴切。如果一定要简称，我以为不如称“三外企业”。小平同志说过，中外合资合作，“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没有说它全姓“社”。我以为，对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标准的准确理解应该是：凡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就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凡不利于这三者的，就决不是社会主义所应当坚持或者允许的。

客：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个新概括。

主：作出这个概括，目的之一，就在于要说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两个“不等于”，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或者说，是根据事物的新发展和实践的新经验，改变了我们“老祖宗”说过的某些老话。诚如皇甫平文章所说的：“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客：这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共识

主：综观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的思路是一贯的。十三年中他至少六次论及这个问题，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形成的新的思想观点，一直没有放弃。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巩固和发展这种共识，将大大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已经确定的目标一步步向前发展。

客：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确定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了。

主：我看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里首先是个实践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总结十几年实践的经验，事实很明显，我们的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总的说来成效很好，虽然我们没有用市场经济的提法，而是用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些提法。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很快，那里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肯定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我想可以理解为也包含肯定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姓“社”不姓“资”。珠江三角洲等几个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很快，活力很强，许多集体乡镇企业，许多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很快，活力很强，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市场经济中运作不能不承认是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经营搞得活的，原因也很多，较好地面向和进入市场不能不承认是一个重要原因。过去由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说到这些经济成就的时候回避它们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现在明确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人们就不需要回避和忌讳了。其次，这是深化改革的需要。当前改革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但大多与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有关。国有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价格扭曲要调整，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转移到基本由市场供需变化来决定的轨道上来；市场体系有待培育和发展……。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模式，可以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明确的方向。

客：那么，你能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作个简单的说明？

主：“市场经济”，是共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性。作为共性的“市场经济”的规定性，前面已经给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小平同志1979年就讲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这是说的共性。至于个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小平同志着重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制基础不同。

客：就是说，作为方法、手段，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需要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方法、手段有什么不同。

主：基本上相似嘛。方法上也可能还有某些差异，这个问题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来解决，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在试验之前争论清楚到底有哪些区别。

客：区别主要还在所有制基础。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规定性。

主：有些同志担心搞市场经济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论者断言市场经济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而且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论者也把转向市场经济同实行私有化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转向市场经济就要抛弃社会主义、抛弃公有制。于是，他们反其道而断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拒绝市场经济。我们党的主张不同，我们党主张坚持社会主义，不搞私有化，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搞市场经济。这是一条需要我们去勇敢地开拓的道路，是一条大有前途和希望的道路。客：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主：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不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吗？现在搞社会主义改革，既不是走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前人之路，也跟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公有制基础上搞计划经济之路有相当大的不同。

客：在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上有某种根本性的不同。

主：在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也有不同。过去我们的所有制结构，强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唯一基础，一个时期还强调公有制越“纯粹”越“高级”越好，现在我们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也参考当代世界别国经验，确定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也要改革。不但集体所有制要改革，从近于变相的国家所有的形式，改变为充分体现集体所有的权、责、利的形式，国家（全民）所有制更要改革，从基本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附属物、指令计划执行者的形式，逐步改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中平等竞争的经济法人。就未经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说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还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过改革，还说它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那就没有道理，全属偏见了。

客：改革公有制，拒绝私有化。

主：对！私有化也要界定。我们拒绝把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这叫反对私有化。生活资料，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张公有化。生产资料，我们现在也不完全排斥私人占有。个体劳动者占有他们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自然是允许的；一定范围作为补充的私营资本和外商资本，也是允许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内外有些论者称之为私有化。不对，农村土地是公有的。当然，农户还可以拥有农具、耕畜乃至农用机器等另外一些生产资料。企业试行股份制，国内外有些论者也称之为私有化。也不对，股份制的性质决定于股份持有者的性质，股份持有者有国家，有集体，有私人，不能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

客：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规定性，还有别的方面吗？

主：有。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那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必要的计划调节、行政管理下的市场经济。而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计划、管理，要体现这样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他们国家的市场经济的许多具体方法、经验，很值得我们了解、借鉴，根据我们的情况学习和运用。这里面有共性。但是，国家性质不同，这是个性。

客：对搞市场经济的担心，一是私有化，二是无政府。

主：我们有政府，而且是社会主义政府。小平同志 1979 年开始讲我们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就说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1992 年南方谈话中又说“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的政权对市场经济要有宏观的计划调节，但是计划调节的概念和方法都要同过去有许多不同。

概括起来说，我们要建立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计划宏观调控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客：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本身没有基本制度的属性，为什么还要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主：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等同物。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现代化，现代化本身并没有基本制度的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客：怎样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这可是个大题目。我谈不来。总之，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是把我们已经做了的一切，换个名词，原来叫“市场调节”，现在叫“市场经济”，就完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转变观念，要设计方案，要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我们的国家很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发展也很不平衡。一方面，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九十年代是关键时期；另一方面，要长期努力，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的、更加定型的制度。”无论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取得共识，这一点很重要。有了共识，大家的努力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合力。

实事求是，百家争鸣

客：6月以来报纸上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报道和文章比较多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界现在有了共识吧？

主：共识要在讨论中、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现在对市场经济问题，能够实事求是地自由讨论了，这就很好。赞成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这样理解的，那样理解的，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在理论界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至于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办法、步骤，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预先准备的对策，更要展开自由切实的讨论。

客：最后一个问题。赞成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志，引用小平同志的论述来支持自己。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实践为真理标准，不是以权威的引语为真理标准。这是不是有一点……？

主：好，我正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许多同志引用小平同志的论述，是为了研究、介绍小平同志的理论思想。引用者赞同某段论述，加以介绍，那是因为认为这段论述有道理，合乎实际，并不只是因为它出自某人之口。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们已经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对于“老祖宗”，我们现在不是也不认为他们讲的话“句句是真理”吗？小平同志自己决不会认为也决不会要求别人认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总体上说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和丰富发展。他的这句话，那句话，是不是真理，都要由实践检验，是允许讨论的。第二，有些同志在论述某些问题的时候，引述小平同志的话来支持自己，除了因为认为这些话正确以外，的确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要借此抵挡大帽子的吓唬，取得自由讨论的保障。这也是实际情况。小平同志的话，固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至少不便于横加指责吧？

客：“姜太公在此”！“泰山石敢当”！

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我们的“姜太公”、“泰山石”。

论十四大报告

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

理论工作在十四大以后应该有一个新的活跃。不是说“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吗？这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精神，也是十四大的精神。为了这三个“一点”，或者说，适应这三个“一点”，还必须有第四个“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

十四大对新时期十四年的历史，做了一个基本总结，为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篇章揭开了新的一页。对十四年的总结，文件上、报刊上说了很多话。比如说，这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十四年。在这么长久的时期中，经济建设没有被政治运动中中断、冲乱，这的确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又比如说，这是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最快的十四年。虽然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总的来说，这是有历史比较的数据和国际比较的数据可以证明的。又比如说，这是人民生活改善最明显，得到实惠最多的十四年。吃、穿、住、用的变化几乎是人人可以感觉到的。还有同志讲到，这是心情舒畅的十四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心情”是一种很高级、很敏感的运动形态。但是，如果回顾一下，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地百分之五再加百分之五再加百分之五，搞得人民内部、党内关系非常紧张，很不正常。和那个时期比较，应该说这十四年确实有了根本的变化。诸如此类还可以讲很多。我今天想再讲一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树方面，这十四年也是建国以来成果最多、最大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最重要的成果当然就是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和讨论，在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最近有一篇报道：《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介绍了小平同志着了十四大报告草稿后说的一段话。报道中说：“小平同志还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钻出什么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就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小平同志强调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想在这个“群众”、“集体”中包含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理论界。理论界在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中，在我们党的重大政策的决策和重要文件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作出的贡献，这十四年也可以说是最大最显著的时期。

有四件事情最明显。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

这是作者1992年10月26日在《文汇报》于北京召开的理论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在另一次会上作者又说：“我作过一个发言，题为《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现在，我想补充两句：题目更实际一点，队伍更广大一点。所谓‘题目更实际一点’，就是说，少一点空论，更多去研究实际的问题和经验。所谓‘队伍更广大一点’，从思想上说，就是不搞小圈子，不搞唯我独‘马’，唯我真‘马’，在爱国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和发挥更多的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和讨论的积极性；从组成上说，就是吸引和接纳多方面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吸引和接纳更多的实际工作者，参加到理论研究和讨论中来。”

评。由此而形成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整个新时期的开端，这主要是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支持、领导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理论界在引起这场讨论，推动这场讨论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件事情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的清理。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弄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什么，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弄清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才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理论界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件事情就是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对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而得出的一个科学成果。民主革命时期，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对确认和论证我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次对于提出和论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理论界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第四件事情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上，突破旧观点，探讨新观点，经济理论界是走在前面的，许多深刻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开拓性的意见，是一些倾听实践和时代呼声的经济学家们首先提出来的。经过反复的讨论和实践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个创造性的新观点，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点，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在这一探讨过程中，那种创造性的声音逐步扩大，最后变成一个强烈的声音，变成党中央所确认的声音。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确立起来，到这次十四大，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确立起来，这里面理论界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还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这三个问题正是十四大所概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中的头三个问题。十四大报告在理论上的新贡献就是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关系改革全局的指导性理论。在这四大问题上，理论界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功不可没。写新时期十四年这一段历史，应该好好写一写这十四年中理论界工作的历史，把十四年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一下。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在今后的新阶段中，为理论界更有效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既要总结在这十四年中理论工作发挥作用的好的经验，也要总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曲折，许多教训，以求今后发展得更好，更顺利。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能使我们在主观指导上为理论的健康发展更多地排除一些障碍，更多地创造一些条件，使得那些联系实际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思想能够有更好的氛围和环境，发出应该有的声音。不同意见的讨论是真理发展必不可少的，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阻碍和迟滞真理发展的、即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批评的那种“拿大帽子吓唬人”的做法。动不动拿大帽子吓唬人，势必窒息理论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总结这十四年，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是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从固定的框框出发。如果一切本本上有的东西、固定框框中有的东西就一概

不能动，没有的就一概不能说，如果是这样一种思想路线，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的活跃和前进。再有一条是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实事求是的对立面是本本主义，百家争鸣的对立面是帽子主义。不要这两个主义，而要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实事求是的方针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这两个方针，就可以使我们的理论工作更活跃一些，在十四大开辟的新的历史篇章中，写出比前十四年更有建树的一页。

精髓·前提·哲学基础 ——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报告认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系列基本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报告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概括，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富有新意。这就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

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造。他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标志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而今年初他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大更大一点，建设的步于更快一点，是标志新时期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一）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在十四大报告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因为这个报告在总结十四年历史的时候，摆在头一条的就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而在概括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如上所述，也是把它包含在第一条之中。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没有思想路线的转变，就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历史是非的清理，没有工作中心的转移，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时候说过，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去独立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上去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答案。因为“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他的第一篇哲学著作，题目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他的哲学名篇《实践论》，他的整风纲领《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是论述思想路线问题的经典之

作。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样的思想路线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它的反面。“两个凡是”则是仍未能摆脱这种个人崇拜的思想樊笼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是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所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改革深入和思想解放深入

如果说，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初主要是围绕特定的拨乱反正任务，即拨“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乱，那么，随着改革任务的提出和推进，解放思想的要求也就向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方向发展了。改革每一次迈出重大步伐，都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先导，并且推动着解放思想的前进。

最鲜明的例子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这个突破的实现，同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克服过去长期形成的把“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维定势，是分不开的。

这种思维定势是从哪里来的呢？回顾历史，从实行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屡次兴起，屡次被压了下去。第一次是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出现了包工包产之类的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核心的农村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些尝试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二次是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在错误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三次是停止“大跃进”以后的调整时期，这次兴起的势头很强，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当时邓小平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支持这个创造。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态度，也是生产力标准的运用。“白猫黑猫”的比喻，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当时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开会研究。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这种主张遭到批判，又一次被压下去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势和条件大不相同了，群众重新提出这个

要求，并且自动地实行起来。尽管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不少怀疑和反对的声音，中央文件最初也还保留了若干限制。但是中央文件和中央精神总的还是允许试验。有些省在积极推行这种试验中带了头。在中央，邓小平予以支持，肯定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以农户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新体制，几年工夫就逐步在全国推开，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不姓“资”。

这里之所以不吝笔墨，详细记述这个过程，是因为这个过程最典型他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推进改革是多么的必要，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若问这项改革的效果如何，十亿多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不就是靠的这一招吗？

再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兴办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这个突破，也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件事情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担心作为旧中国屈辱标志的租界又来了，担心有外商投资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同志的思想被不适应新形势的旧观念束缚住了。现在的新形势是，中国的政权在人民手中，又具备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经济特区是在我们的主权管辖下，按我们的政策吸收外商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圳等地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总结了集中反映在这两件事情上的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由此来说明，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僵化观念，大胆去闯，去试验。十四大报告在总结十四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时候，对这两件事情郑重地作出了历史的结论。

如果说，以上两件事情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实践上的两大突破，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则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更加关系改革全局的理论上的两大突破。

过去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新观念，是思想的一大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发展。这个新观念，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和城市初步改革的实践中来的，也是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广泛参加的理论讨论中来的。虽然在这种讨论中也有不同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声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但是，广大农村城市事实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所收到的活跃经济的显著成效，使人们的思想从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发展了新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是在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立的。以这个新观点为核心，中

共中央的决定为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决定还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也就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任务。再认识，也就是解放思想，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的理论观点。十二大的重要贡献，是系统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对中国国情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是改革深入的进程中，我们思想的又一次大解放。小平同志评价十二大，说十三大“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观点的确立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有关系的。

（三）新阶段和新的思想解放

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三月政治局会议和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要求新的思想解放。南方谈话是新阶段解放思想的新宣言。十四大报告也把“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作为这次大会的任务。

十四大报告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十四大的有巨大意义的重要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是又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说过：“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我看，对于十四大报告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是完全适用的。

小平同志这里只讲老同志有解放思想的任务，因为他是在顾委会讲话。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有解放思想的任务。

小平同志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很早就发表过重要意见。1979年11月同《大下刊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10月他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还有相当的影响，理论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也有不以为然的意见。近两三年来，这样的声音有时调门提得很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两个“不等于”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或者说是根据实践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的某些话。小平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为我们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人们摆脱了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阴影。江泽民同志今年6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深刻地论述了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样就为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作好了理论准备。

一方面是改革实践的发展。十多年来，市场的范围和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势头就比较好。一方面是改革深化的要求。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都取决于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作用。实践第一，实践最雄辩，实践推动人们认识的前进。正如十四大报告所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的确立，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它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对于进一步思想解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三个“有利于”和两个“一切”

新阶段新的思想解放，方面很多，一个总的主题就是不要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的手脚。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些话非常重要，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反映着急切的现实要求。真正是切中要害。十四年中，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关于经济特区的问题，关于商品经济的问题，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无不是拴在这条绳索上。十四年如此，四十年何尝不是如此。

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思想路线，在于我们在生活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时候，用什么做标准。是用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做标准，凡不合乎这些观念。——141——的就一概加以排斥？还是用实践做标准，凡是在实践中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就一概予以欢迎？如果在实践中合乎三个“有利于”的东西，不合乎我们固有的观念，是抵制这些东西，还是改变我们的观念？

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任何观念的东西，不论是从书本上来的，还是自己头脑中想出来的，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只有当它们在实践中被证明为真理时，它们才有正确地指导我们行动的意义。而且这种检验不是一次完成、永远完成的，它们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发展，才能保持正确地指导我们行动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中的实践标准，用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就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共产党人制定政策、确定方针的

根本标准，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在新时期拨乱反正一开始，就鲜明地重新提出了这个标准。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一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他就重申这个标准。比如他在回答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就强调“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二大报告正是根据小平同志这些论述的精神，着力论述了生产力标准，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直务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里讲了国力，讲了人民生活，讲了精神文化，讲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全面的；归根到底讲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报告鲜明地提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并且在两处地方讲了“两个一切”：“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三个“有利于”，正是针对当前改革进程中仍然困扰我们，妨碍我们前进的一些思想情况，再一次重申和进一步发展了他历来主张的生产力标准。十四大报告在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时候，把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的论断，贯串起来，作为这个理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很有逻辑的。十四大修改过的党章总纲，也写上了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这说明，十三大也好，十四大也好，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始终一贯的。

关于生产力标准，有一些糊涂观念，需要弄清楚。

一种是把生产力标准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看到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我们坚信，在中国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一点，同旧中国比，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同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比，我们现在的发展势头和未来的发展成就，也必将予以证明。如果说四项基本原则竟然可以是外在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则，最终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好，综合国力增强得更快，人民生活提到更高水平，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支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涉及我们头脑中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些固有观念。这些观念是否正确，是否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拿到实践中用三个“有

利于”的根本标准加以检验。根据检验的结果，坚持其中正确的东西，抛弃其中不正确和不适应新情况的东西，增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得到的新的发展和新的内容。十四大报告在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这一条里，一方面讲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一方面又讲四项基本原则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十三大报告中也是这样论述的。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贯的。或问，有什么新的时代内容？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新概念的确立，就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更新了内容。如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这个问题上的陈旧观念，坚持高度集中、行政指令的产品计划经济，那样怎能适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不断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能够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好。所以，把四项基本原则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并且归根到底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对自己制度、路线的自信心的表现。同时，这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作百倍的努力，作长期的奋斗，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制度和路线的优越性。

另一种是不赞成两个“一切”：不赞成“各项”“各方面”，说是太宽泛、太绝对了。这也是不对的。世界上的事情固然多得不得了，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从中国共产党从事和关心的事业范围来说，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从总的出发点来说，难道有哪方面、哪项工作可以离开生产力标准，不顾三个“有利于”吗？既然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明确了我们的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根本任务、这个工作中心，而不可以干扰和离开这个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因而必须以生产力标准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而不可以不顾和离开这个根本标准，另立别的根本标准。各项工作当然还要有各自的一些具体的衡量标准，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有必要也有可能把这些具体标准同根本标准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赋予这些具体标准以新的时代内容。至于对生产力标准的一些庸俗化的理解，如把它歪曲为一切向钱看之类，那当然是需要纠正的。在纠正各种错误理解的同时，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的生产力标准。

总之，还是两个“一切”：一切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这个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也就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它是我们摆脱姓“资”还是姓“社”的抽象争论和无穷困惑，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敢闯敢试的锐利武器。

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 ——十四大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四大胜利闭幕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欢迎大会的成果，正在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十四大报告。以此为契机，一个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热潮正在兴起。

十四大报告在谈到当前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时候，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历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十四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十四年的伟大光辉的实践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进一步确认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出了坚持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从而为我们党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确立了新的理论，举起了新的旗帜。这对于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能够掌握中国的命运，夺取自己事业的胜利一样，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定能够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夺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加辉煌的胜利。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

考察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有个方法问题、角度问题。十四大报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考察角度和分析方法。

（一）对于十四年的实践，十四大报告用了一个概念来加以概括，这就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小平同志说过多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南方谈话中他又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而深刻他说明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道理。新的革命、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理解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意义，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开创性质，有极大的启迪，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问题的角度，一种重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历史性的飞跃。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完成的革命，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这个革命，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个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过去，我们不赞成“一次革命”论，那个意思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越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

作者 1992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十四大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报告。本文是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革命。中国革命要分两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两次革命。但是，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考察，从更高的历史层次来概括，我们分两个步骤的革命，完成了一个什么事业呢？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化。从完成这一个伟大历史过程的整体来看，说这是一次伟大革命包括两个步骤、两个阶段，这不会和我们过去不赞成的主张越过民主革命阶段的“一次革命”论相混淆。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青年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举起旗帜，就可以集合队伍，进行战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绝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已经产生了新的理论，中国革命的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曾经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才能解决自己面对的新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他谈话的大意。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第一次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的改革，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十四大报告作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要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文化仍然落后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革命已经进行了十四年，现在尚未完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集体要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它继续推向前进。完成这个革命要多长时间？从基本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来说，它还需要进行若干年；从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说，可能还需要三十年；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可能要到下世纪中叶。因此，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十四年是这个革命的光辉的开始。在这十四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如同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马克思主义一样，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理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讲了我们上面介绍的那段话以后，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

也是不行的。这段话是他谈话的要旨。就是说，正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时代要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论的任务。毛泽东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他写出的新的著作。但是后来发生失误，没有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只是在总结过去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这十四年的新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才初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开始形成了新的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举起这面新的旗帜，按照十四大报告的说法，就是举起“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或者说是举起一面引导中国第二次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二）两次革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们的意义怎样来比较呢？

我认为，两次革命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

首先，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过去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第二次革命就将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充分地体现出来。

其次，过去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又经历了新的曲折：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急促和粗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体制，虽然有其历史的由来，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外国模式和自己某些空想的影府包含着严重的弊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的根据，第二次革命的由来。

第三，新的革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国际间的较量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和科技方面有许多新的成就和经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经历了巨大变故。这些新的形势在以前或者不曾存在，或者有些已经存在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突出和尖锐，或者有些已经明显而我们没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两次革命的意义：第一次革命，正如十四大报告所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有史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始终受压迫和剥削，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劳动人民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奠定了。第二次革命现在还没有完成，在它完成以后来估量它的意义，其伟大性，如果不说超过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至少不亚于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因为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将由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伟大振兴而向全世界特别是不发达世界作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毛泽东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建国时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

（三）对于用“新的伟大革命”来概括十四年的实践，现在有种种

不同的认识。

有一种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种意见，对革命一般地采取否定的态度。按照这种意见，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不仅二十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意见一般地推崇改良，认为只有改良才有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这是当前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在中国也有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改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承认我们不少同志过去确有对改良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的偏颇。但是，我们不能赞成一般地否定革命的观点。我们主张充分地、客观地估计革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革命为推动历史前进打开闸门的伟大意义，主张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确定不同的历史内容，运用不同的革命方法。

还有一种意见，是担心提出新的伟大革命，会不会同“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相混淆。这的确是一个应当区别和解释清楚的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错误是在劳动人民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仍然要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实践的结果已经证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只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们现在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革命，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指出：“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正是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中，正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我们强调，我们现在说的新的革命，同过去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性质不同。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现在的革命，当然不是要推翻现存的政权，而是在我们党和人民政权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和更新。同“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但是历史决议又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剥削制度，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并说：“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会导致用改革否定和取代革命。在这种意见看来，不应该被否定和取代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呢？如果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那么我们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的确不应该再进行这样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如果是指别的，那么还有什么比改革更具有革命意义呢？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必须是质变，而改革只能是量变，所以不能把

改革称为革命。我认为这种意见没有看到质变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就根本的社会制度这个层次来说，改革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在这个层次上改革不是质变。但是，就经济体制这个层次来说，如十四大报告所说，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是说，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内部的纯粹的量变，而是在体制这个层次上的质变，是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革命性变革，即对体制的革命。量变和质变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过事物发展过程根本性质不变的条件下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可以说是讲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毛泽东后来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说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层次性质变。可见不能把量变和质变截然分开。看不到改革也是质变，是层次性质变，把改革仅仅当成是量变，就不能很好理解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就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阐述了这个观点，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些论述，都是把现代化同改革连为一体，以现代化为改革的目的，以改革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来阐发它们作为深刻、广泛、伟大革命的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其已经引起和将要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的确是一场新的革命。十四大报告讲新的伟大革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历史决议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十四年来我们党的一贯观点，又是对这个观点的新的丰富和发展。

（四）十四大报告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顾了十四年的历史，对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了郑重的历史结论。用历史来证明理论的正确和伟大，这为我们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和分析方法。

十四大报告对十四年历史作结论，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统一对历史的认识，是为了全党在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历史决议结论做到1980年，那以后还没有专门的历史结论。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历史决议。这是第一个理由，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些年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大家都要冷静地思考过去，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我们的路线、我们的许多决策，包括历史决议在内，是否正确？

先是在1984年，在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任务以后，国内外有许多议论。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有人担心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

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

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开展以后，小平同志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他还说过：“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这以后又发生了1989年的国内风波和近两年的国际剧变，这两件事的严重性和震撼性，是近十几年来我们遇到的国际国内事件所不可比拟的。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小平同志在那篇著名的“六九”讲话中就说过：“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这的确是一些同志头脑中发生了的疑问。小平同志认为，这是大的问题。他认为，对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他说：“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

在去年的国际剧变之后，在一些同志头脑中重新发生了这个问题。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正是根据小平同志这些讲话的精神，十四大报告承担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作历史结论的庄严任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重大决策和由这些决策体现出来的理论和路线作出结论，肯定下来，这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第三个理由：从十二届四中全会选出江泽民同志为新的总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担当起了领导全党的任务。十四大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的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样一个郑重的场合，对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事业，所建立的理论，作一个历史的结论，表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党要坚持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全党所确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把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拓的第二次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由于这三点理由，十四大报告对十四年的历史作出了郑重的结论。

听到一种议论，说为什么十四大报告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五年，讲这五年不就行了吗？有的文章讲，常规是只讲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这一次是特例。我想了一下，我党的常规似乎反倒是总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总结很长的历史。当然，过去党代表大会间隔的时间也长。七大报告，总结“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追溯到1924年的国共合作。八大报告倒是从七大以后讲起，但这两次大会之间就包含了两次伟大历史进程：完成了民主革命，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总结的跨度也很长。九大是一个错误的大会，错，也是从历史上讲起，从“和平民主新阶段”批起。十二大报告，不是只从十一大讲起，而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讲起，回顾六年。十三大报告，也不是只从十二大讲起，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总结九年。因为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交待，说这五年做了什么什么工作，而是要对我们的事业进行一番理论思考。这样的思考必须有深刻的历史感。所以历次代表大会并不都是限于对两次代表大会

之间的若干工作的评论。既然要提到理论上思考，就要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思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并不是特例，而是常规。

（五）十四大报告在回顾历史部分，对十四项重大决策作出了结论。如果加上概括理论部分提到而回顾历史部分未提到的两项（第十、十一项），共有十六项。

头四项都属于拨乱反正。

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是头一项重大决策。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先导。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提出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这第二项重大决策，是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这两项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所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

第三项重大决策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更准确他说，是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

第四项重大决策是清理历史是非。这件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四中、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至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正如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从总结历史中，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在全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的领导地位，为七大作了很好的准备一样，第二个历史决议，从清理历史总结经验中，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在全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的领导地位，为十二大作了很好的准备。

第五项重大决策是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这是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深刻阐述的。这个口号和三步走的战略，十四大报告称之为“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

“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小平同志曾经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改革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

第六项重大决策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的局面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第七项重大决策是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特别讲到这两件事，说一开始都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实践的成就证明，两者都姓“社”不姓“资”。十四大报告对这两件事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用历史结论把它们肯定下来。

第八项重大决策是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小平同志称之

为“纲领性文件”。

这三件事，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外开放的突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指导这个改革的新的理论突破，是改革开放中三件最重大的事情。还有三件事情，则是从思想和政治方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保证。

第九项重大决策是两手抓。一系列“两手抓”，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小平同志正是在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时候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进行长期的教育和斗争。

第十项重大决策是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根据这样的判断和对世界战争可能性的客观估量，决定调整对外关系，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决定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走注重质量的精兵之路。

第十一项重大决策是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很大的创造，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现实道路。

后面五项，是从十二大到十四大之间的事。

第十二项重大决策是在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对我国国情的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制定和执行现在这样的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政策的根本依据。

第十二项重大决策是经济的飞跃发展和治理整顿。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充分肯定了1984年到1988年这五年经济的飞跃发展，认为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是需要的，治理整顿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也要归功于那几年的飞跃发展，并且是为了以后的飞跃发展。

第十四项重大决策是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同时宣布党的路线方针决不因为这场风波而动摇。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一件大事。小平同志1989年6月9日的讲话对这件事作了最透辟的论述。

第十五项重大决策是在这两年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也是关系我们在国际剧变中如何稳住阵脚，不受惊扰，坚持自己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一件大事。

第十六项重大决策就是当前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这是今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由三月政治局会议确定的。

这样，十四大报告对新时期十四年中的十六项重大决策作出了结论。从十四年前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这头一项重大决策开始，到今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号召思想更解放一点，中央政治局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速度的重大决策为止。既反映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清理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又反映了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其他方面体制、从对内开放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既有确定重大战略方针的决策，包括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在国际剧变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有确立重大理论观点的决策，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姓“社”姓“资”、1984年到1988年经济的飞跃发展是功是过，都作出了结论。对几次历史性的会议——标志新时期开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基本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提出“两步走”（后来发展为“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十二大；转入

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进行长期的教育和斗争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十三大；在平息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宣布党的基本路线不变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都作出了评价。

十四年中我们党的决策还有很多，这十六项是最重大的，它们显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迈步前进的巨大而坚实的足印，展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胜利进程。

事情很清楚，作出这些决策并不是很容易的，许多决策都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不是没有一些人一时跟不上。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不仅是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不仅是说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十四年的经验教训也是如此。解决这些问题，十四年的一个创造，就是不搞争论，不搞批判运动，主要看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打通人们的思想，实践提高人们的觉悟，实践最雄辩。

十四年党的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从实践效果中得到证明，又由十四大作出郑重的历史结论，用科学的权威和组织的权威这双重权威使全党获得共识。科学的权威，就是说，实践证明这个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组织的权威，就是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组织结论，确认这个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科学的权威和组织的权威，归根到底，是科学的权威。因为组织的权威如果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科学的权威，党终究要重新作出组织结论，因为我们党终究是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党。但是，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的权威，又由组织的权威加以支持，这对于一个需要统一认识和行动的，由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战斗的大党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它将更加有力地促进全党形成共识。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就能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更加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沿着我们已经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

（六）说到用实践效果来证明理论正确，还需要对这十四年的实践效果作出综合的估量。十四大报告简单扼要地作出了这样的估量。

报告说：“回顾十四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起来说，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是：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时间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由此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的这个“大台阶”，是有数据的，有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数据的，也是我们大家几乎人人都能从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生活感受中体会出来的。

如果说，这些都还是表层的、现象的描述，那么，深层的、本质的分析是：“十四年改革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是真正体现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要求的境界。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经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不单是企业应该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整个社会肌体、它的各个系统和各个细胞都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

1987年5月12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针对“左”倾错误导致的长期停滞和缓慢发展，这样说过：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活跃起来”，“充满活力”，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和追求。

正是在这些从现象到本质的综合估量的基础上，十四大报告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 international 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七）十四大报告对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下了一个定义，作了一种评价。这对我们理解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有很大帮助，也是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的考察角度和分析方法。

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对这个理论已经作过多次的概括。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文献提出了思想路线，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这个理论开始产生，那么，对这个理论的第一次初步的概括，我认为应该数历史决议，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决议的第三十五条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认为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一共列了十点。

十二大提出了这个中心口号，提出了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但没有对这个理论用列出要点的方式进行概括。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至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趋于成型。十三大报告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要有新的大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并且指出：“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报告列举了十二个观点，认为它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党建等方面，列举了十二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的讲话中，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三大方面进行了概括。

十四大报告在上述概括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概括，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次的新概括，总结了十四年中这个理论的主要发展，特别是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最新发展。这次谈话贡献了新的重要论点，对过去阐述过的论点又有新的重要发挥。

第二、这次的新概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经验、理论渊源、集体智慧和个人贡献，作出了论断。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实践基础，十四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是直接的实践基础。历史经验，包括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我们党的直接的实践，历史上的实践；还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也是实践，对我们党来说是间接的实践。理论渊源，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关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讲到时代特征，就不仅仅指中国的实际，还有当代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时代发展。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是它的继承和发展。就是说，如同七大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科学定义一样，十四大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了一个科学定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智慧的结晶，在总结全党全国人民经验的基础上，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个理论的创立都作出了贡献，而作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的，当然是小平同志。这个理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小平同志的著作和谈话以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议这些文件中。

小平同志非常强调群众的创造。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改革最突出，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针对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小平同志还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就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报告指出：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第三、这次的新概括，着重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的理论高度来进行论述。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科学评价。

这里从中国实际来谈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讲的是个性，是中国特色。当然也联系到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和当前国际的剧变来思考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个性中包含共性，但是我们用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不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

（八）这里还要专门谈谈“第一次”的问题。十四大报告说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不是不承认过去探索答案的成果？当然不是。

我们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不是不承认这以前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在寻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答案中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李大钊当然是有贡献的；陈独秀情况比较复杂；霍秋白犯过错误，无疑也有贡献。党的一大、二大……到党的六大，都有贡献。1945年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六大的基本方面是予以肯定的。但是，一方面必须肯定这些贡献，一方面又必须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时的确还没有比较系统地正确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那时党还处在幼稚时期。只是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时候，才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回答，就是毛泽东思想。

用同样的方法来看我们现在讲小平同志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也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成果，否定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过去领导我们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很重要。但是也必须如实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到过去这些探索尽管有重要的成果，总的说还是幼稚的阶段，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解决好，还有过许多失误和曲折。只有总结了这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十四年中有了新的创新和开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建立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比较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然还是初步的回答，这个理论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和丰富发展。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既成的体系，但是，是初步地、比较有系统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它这样的历史地位要有充分的评价，同时又不是用绝对化的观点把它当作固定不变、不能再发展的东西。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看待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

如前面所说的两次革命之间有三重关系一样，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也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二是纠正，三是开拓和发展。

小平同志在主持制定《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明确指出第一条方针就是要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党和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奋斗的历史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他的这个方针，体现在历史决议之中了。的确，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

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和坚持，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我觉得，小平同志敢于批评“两个凡是”，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重大的错误，在当时这是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的。在指出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在世界上发生许多事情的过程中，国外，也包括国内，确实产生了一种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成就的思潮。在这种思潮面前，能够顶得住，要求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那样的潮流中坚持这样一条，我觉得也是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的。这种勇气的可贵和这种决策的远见，十四大报告说，随着国际变化和国内发展，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如果没有这样一条，我们自己毁弃自己的历史，自己否定自己，那我们就没有立足点，也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以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区别开来为前提的。有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科学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没有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一重关系，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必须明确地、坚定不移地把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东西加以否定。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含糊。

小平同志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继承和纠正这两重关系的综合，也就是拨乱反正。

但是，拨乱也好，反正也好，都还是在毛泽东已经提出的思想、观点的范围里，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加以划分，哪些是晚年犯了错误的，我们总结教训不再坚持，哪些是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还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的东西的范围。

所以，光看到这两重关系还不够，还要看到第三重关系：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开拓新局面。没有这个发展和开拓，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很赞成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新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

小平同志的文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文本书名改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这两个书名都很好。我们说一个理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一个理论，就是因为它解决（或者说初步解决）了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系列

基本问题。这次十四大报告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从它解决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理论高度来进行概括的。一是“基本问题”，一是“一系列”，一系列，也就是表明有一定的逻辑结构、一定的科学体系。一系列基本问题，共有几个呢？十四大报告列了八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加上用“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一共九个。九个问题构成一系列，一个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因为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作中，概括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部著作中又总结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纲领，这也是回答基本问题。此外，还有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等基本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批评“左”的错误的时候，认为“左”的错误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发展不平衡性没有认识。像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它比较系统地、正确地回答了，这样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我们考察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括时，联系一下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作一点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十四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概括，把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群众路线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是很有新意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如历史决议所概括的，正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样一个概念，并且把它概括为这样三条，我认为这是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新概括、新阐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唯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中国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依靠书本和外国），独立自主地去开辟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成就，就在开辟这样的道路。他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这是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他在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中有成就又有失误。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努力，又总结了毛泽东后来探索中失误的教训，开始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多次讲过他就是“实事求是派”，在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

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并且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样的思想路线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它的反面，“两个凡是”则是仍未能摆脱这种个人崇拜的思想樊笼的产物。

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所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小平同志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标志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思想解放不是一劳永逸的。改革开放每一次迈出重大步伐，都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先导，并且推动着解放思想的前进。改革实践上的两大突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经济特区，是如此；改革理论上的两大突破：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也是如此。改革开放的深入，要求思想解放不断深入。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三月政治局会议和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要求新的思想解放。南方谈话号召全党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是标志新时期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科学判断，是对我们的国情进行再认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一个科学成果。这样一个判断的科学意义，就如同我们党和毛泽东确认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这个基本的科学判断出发，引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步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答案一样，现在确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为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必须依据的国情判断的基础。

最先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在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都重申了这个论断。十三大报告以这个科学判断作为立论的基础，是报告了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批道：“这个设计好。”小平同志说过，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后来在谈到中国过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左”的教训时，又总括他说：当时“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今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个论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的组成部分。

我有一个看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一个讲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个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并不是说，全国胜利就结束了新民主主义。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确定

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建设的纲领。1953年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理论同过去的理论是什么关系呢？当时周恩来同志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恩来同志力求把过渡时期总路线同过去讲的还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找到一个统一。当时设想这个时期还要十八年，后来过于急促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时期缩短为七年。过渡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当时没有能够很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反而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相当影响，这成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一个由来。经历过曲折，总结了教训，我们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么几个依次联接的发展阶段，显示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

以上这两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的基础。这个理论的大厦，建立在由这两条打下的地基之上。下面的五条，则是这个大厦的五大支柱。

（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要讲支柱，这一条是中心的支柱。十四大报告在概括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论点时，把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点，同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论点联系起来，由此得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本任务联系到根本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十四大报告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个问题上，把这几个论点贯串起来，反映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里指的就是没有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根本任务，是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三座大山推倒、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们的根本任务应该转向发展经济和文化。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曾经正确地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次会议前后，党多次讲过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由于当时东欧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由于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我们很快改变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而动摇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为主要任务、为根本任务。这种“左”的错误，由于后来国内外一些事件我们又未能清醒对待而进一步发展，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这个历史教训的确是极其严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决策，就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转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上来，这是标志新时期开始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工作中心”，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确立正确的观点，来之不易。坚持这些观点，仍然不易。当然，情况根本不同了。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

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过国际国内的风风雨雨。如果不能清醒对待国际国内这些事件，或多或少地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动摇我们党关于“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的基本观点的偏向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时在舆论界不是没有看到某些迹象。但是，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沉着地对付和处理了这些事件，同时又不受干扰，不因为这些事件而离开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观点。党中央是这样把握局势的，也是这样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

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在这以前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两个提法是完全一致的，都很深刻，有新意，真正抓住了本质，撇开了一些并不属于本质却被人们当作本质的东西。提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我体会，一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二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样来澄清姓“资”姓“社”争论中的混乱思想，要求不要把一些并非社会主义本质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物和观念，当作社会主义去固守；不要把一些并非同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当作有损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加以固拒。在人民公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是如此，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问题上也是如此。

这里还应该提到，十四大报告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把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列进来，而且把它当作这个理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的五个主要论点之一，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刻体会的。把发展生产力摆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他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论述，都立在这个重心之上。正是这一点，使这个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精神。而在现代的条件下来谈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不能不突出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否则就落后于时代。正是这一点，使这个理论又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只有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科学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

（四）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从哲学上讲，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由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因此，社会发展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提法。

在民主革命时期，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他的失误在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这样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新认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的。其实，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说过“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问题，不过南方谈话以后这一点才得到人们的比较

充分的注意和重视。

所以，如同过去革命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样，现在改革这场新的革命，这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和其他方面体制的相应变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改革没有出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支柱。

改革的日标是什么？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十四大报告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这一条中，概括了改革的三大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确立这个目标模式方面，小平同志始终起着先导的、主导的作用。是他最先在 1979 年鲜明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今年初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讲了两个“不等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据实践的结果，根据十四年改革的经验，根据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根据对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观察，改变了我们老祖宗说过的某些话。这就大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为我们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作好了准备。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的问题上，是“主”和“辅”、“一”和“多”的结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经济成分为补充、为辅助，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是小平同志起先导作用、主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小平同志就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后来又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就国内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总结道：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然，我们所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把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秩序，民主与社会政治的稳定、民主与党的领导的权威，很好地结合起来，决不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一定要同“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天下大乱的“大民主”划清界限。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仍然是“主”和“辅”、“一”和“多”的结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主”、是“一”，多党合作、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多”。

同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还必须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主要目标，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早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是在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和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今年初的南方谈话，小平同志又强调要两手抓，两手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发展，“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一”与“多”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这是“一”；古今中外，立足现代而又继承遗产，吸收古代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有益文化成果，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这是“多”。

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三大改革目标和三个方面的有“主”有“辅”、有“一”有“多”（“一”是主导、领导、指导，不是唯一、单一、清一色）的结构，继承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纲领的许多仍然适合需要的内容，又适应社会主义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有了许多新的重要发展。

（五）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社会主义发展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了解、吸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的一切成果和经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历史要求。而历史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先在经济和科技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要解决这个历史现实和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实行对外开放，自觉地、积极地去利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任务就更加艰巨和急迫。这是讲必要性。还有一个可能性问题。现在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比过去要好的实行对外开放的可能性。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抓住世界形势变化中出现的时机，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邓小平又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调整对外关系，为我国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坚决地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必要条件，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助力。过去的封闭，一是人家封锁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一是我们自己对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主动不够，这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现在，人家同我们还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人家欺侮、封锁我们，企图演变我们的行为和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同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封闭只能导致落后，绝对无助于而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决不可以动摇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倒退到封闭状态。

（六）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它们是立国之本。十四大报告在概括这个问题上的论点时，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另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四项基本原则丰富新的时代内容。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不是新东西，并不是不重要。非常重要，今后还必须坚持，这是我们事业的连续性。但是，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理解，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经受实践的检验，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纠正不正确的、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某些旧的理解，接受新的、适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理解，这是我们认识的前进性。只有这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实现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内在联系，内在统一。

所以，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丰富新的时代内容，有这两条才能真正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否则，两个基本点就会互相打架。两个基本点必须也必定能够互相联系，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这四条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支柱，解决的是社会

主义的根本任务、内部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四个基本理论问题。化为指导我们行动的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小平同志自己做出的概括。十三大前夕，小平同志就说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四大报告概括这几个基本问题，并且按这样的逻辑次序排列，是以小平同志这个概括为根据的。

（七）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这是第五大支柱。十四大报告概括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共有三条，一是三步走的战略，二是台阶式发展的战略，三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的战略。

或问：三步走不就是工作安排吗？算什么理论呢？往深里想一想，这里包含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纠正了“左”的革命急性病。邓小平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这方面过去也有急性病。“大跃进”的时候讲三年、五年超英赶美，不去说它了，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由于对国际情况还缺乏清醒的了解，对自己的情况也缺乏清醒的了解，在实现现代化的期限和目标上还提过一些过急的口号。正是邓小平同志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国情，让我们打开眼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世界有了新的了解。我们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种雄心壮志是不变的，对实现这种雄心壮志所要经过的过程的长期性获得新的认识。认识到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才制定了三步走的现实可能的战略。

认识长期性，又要抓住时机，隔几年使经济加速发展上一个新台阶。慢慢吞吞不行，要争取现实可能的较髙速度，这是人民的、民族的愿望，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要求，其他一些国家也提供了这样发展的先例。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个形象的描述很好。过去往往用波浪式发展描述增长的不平衡性，但是纵波、疏密波，人们不大了解，横波，起伏波从形象上给人一个起而又伏，波浪来了迎上去，到了波峰还要掉下来的感觉。而台阶式发展就避免了这种印象，没有从波峰到波谷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如果我们经济生活里发生了这么重大的马鞍型，那是一种工作失误的结果。如果没有重大的失误，不应该发生经济的大幅度下降。总之要有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不可能是年年均匀的。台阶式发展，形象地表示了增长速度的不均匀性，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台阶式发展规律，既反映了我们要求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加速发展的愿望和客观可能性，又使我们能够把握发展和调整的辩证关系，取得指导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正是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增长不均匀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经济发展的战略的。

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只要有条件，有本领，靠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就要允许和鼓励他们先富起来，不要捆住他们的手脚。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先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逐步把革命推向全国胜利。邓小平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进程的不平衡问题，制定了先富带动后富、共富的战略。

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理论观点，化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战略，就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三步走战略。总起来说，理论上的五个支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战略”的理论基础。

（八）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这是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作出的一个新概括。领导力量是工人阶

级，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条过去和在现都没有变化。当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革命，对领导力量的自身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依靠力量，现在比过去更加广泛了。从前，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这是土地改革的时候的阶级路线。在城市工作中，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城市贫民，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现在阶级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当然还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包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两支大军，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只是属于团结对象，而是属于依靠对象。在农村，还要依靠广大农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我国社会主义还要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因为我们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我国社会主义还要依靠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本来是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现在仍然需要统一战线，而且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按小平同志的提法，它包括三个全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全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关于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这一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是带总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完整表达，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前，不是有个“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吗？

（九）用“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国家要统一，而且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人民的愿望。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和平统一？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现实可能的构想，是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这里没有用“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问题”这样的提法，因为我们并不提出用社会主义统一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小平同志说，这个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在中国的主体（大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身边，“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八个加一个基本问题的角度作了概括。联系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成果做个比较，我想应该说经过十四年的努力，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现在解决得是比较系统了。这个估计，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当然我们还只有十四年直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在十四年的基础上，也总结了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所形成的这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当然还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继续丰富发展。但是，的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理论，举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以上是我学习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对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对八个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对每个问题上的主要论点的逻辑联系，得到的一些个人的体会，是不是准确，是不是适当，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

一开头，我们讲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举起这样一面新的旗帜，的确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根本问题。十四大认为这个理论“第一次”初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实，除了“第一次”，

还有个“唯一性”：中国社会主义要保持稳定和发展，不能依靠别的，唯一的只能依靠这一套。外国的固然不行，过去的也很不够。把过去我们积累的经验吸收在内，外国的经验教训总结在内，我们形成了现在这一套，它是第一次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也是对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回答。坚持这个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直到实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他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确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手里，而且以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获得最后的解决。这当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也会发生巨大影响。

线索和阶段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十四大报告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这个定义，为我们研究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提供了基本的指导。

一、敏锐把握时代主题

定义一开头，就讲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时代历史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和平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重新估量了国际局势，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特别是占人类五分之四的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民族的愿望，也把握了中国对人类的责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科学技术革命飞快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生产力迅速发展。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挑战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要把握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但的确成了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求解决并可能解决的时代主题。和平有利于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对和平与发展的新认识联系于对社会车义的新认识。小平同志不是反复他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最终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靠我们的发展吗？

二、理论的起点在哪里？

定义接着讲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

可不可以把起点更向前推？我想，应该明确肯定，起点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不要模糊这个起点，这个标志。

这是作者提交在上海召开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国讨论会的论文，1993年6月23日发表在《文汇报》上，其中的第七部分，后来又作了一些补充。

当然，“起”，也不是突如其来。这个理论诞生的酝酿，我看可以追溯到1975年。这一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全面整顿。整顿，虽然没有也不能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错了，但又的确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来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来了一个“两个凡是”。临产会有阵痛。“批邓反右”、“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路线和理论诞生前的两轮阵痛吧。

小平同志后来说过，那时的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还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因此，我认为，从起点往前追溯，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当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是合理的。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从1975年开始，正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同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三重关系

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再往前追溯呢？有的文章，追溯到1956年八大小平同志当总书记那个时候，还有文章，追溯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更多分析。我认为，那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也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

无疑，从1956年开始了我们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贡献。1949年到1956年更是如此。小平同志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特别是八大他当总书记以后，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贡献中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小平同志还说过，八大以后中国挂领导人的像，有他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以前党中央的失误，也有他的一份责任。

我们曾经指出：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人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经济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小平同志后来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这就是说，那十年中无论是正确的发展趋向，还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要讲主要代表，总的说都是由毛泽东来代表，正确的发展趋向中积累起来的東西，大都是毛泽东提出的或者是别的领导人提出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它们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错误的发展趋向积累起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那属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来分析呢？

我一直认为，后者不是前者的单纯延伸，两者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一是纠正，二是继承，三是开拓和创造。

纠正“文化大革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的契机。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地考虑走一条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有很大的“功劳”。也就是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条件是要正视它的教训，总结它的教训。所以，纠正和总结“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研究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继承过去的探索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的一切正确的东西，体现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连续性。应该看到，纠正错误是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决不是全盘否定历史。如果全盘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会丧失基本的立足点。还应该看到，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回到过去的正确的东西。所以，对过去的正确的东西的继承，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线索。

当然，在研究这种继承的时候，又必须看到过去的正确的东西在广度、深度、确定程度、完备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不能混为一谈。

十四大报告所下的定义，讲到了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所凭借的历史经验——“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关系。这里包括胜利和挫折两个方面，并把它摆在新的实践过程和新的理论起点以前，摆在历史经验的位置上。

十三大报告讲两次历史性飞跃，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国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属于哪一次飞跃？它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次飞跃的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能说是在1956年或者1949年。

既然说是飞跃，那就不单是纠正和继承，而且有全新的开拓和创造。纠正和继承，开拓和创造，又是密切联系和交错在一起的。

在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有新的开拓和创造，这是我们在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又一个线

索。

四、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

阶段划分的问题，前面讲了起点。起点之前，算酝酿阶段。起点之后，经历了哪些阶段？

我认为，从历史进程本身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历史的新时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因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应该看作新时期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反映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论和形成和发展，也应该以这十四年作为第一个历史阶段。

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还可以再分为若干小的段落。我认为，有三个小的段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从十三大到十四大。经历了这些小的段落，这个理论产生，形成，走向成熟。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讨论真理标准，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切拨乱反正的先导。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十二大。可以说，这四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当然改革开放也已迈开重要步伐。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这个理论开始产生，到十二大形成和提出了一个集中的口号，即后来成为这个理论的名称和主题的口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文章收到十二大以前，正好是酝酿阶段和这个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的这段时间的著作。

五、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

十二大以后的主要历史内容是全面改革。这里说的改革，包括开放在内。小平同志说过：开放政策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叫改革。小平同志也说过：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他总是把改革开放统一起来理解。

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要求理论思考的深入。

小平同志十二大以后的著作，已经结集出版两本小册子，还有一些未收入小册子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和谈话。第一本小册子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书名，这不是偶然的，它正好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展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在这两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其他重要谈话中，小平同志反复阐述的中心论题就是：我们坚持

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要求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在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上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促使我们党重新构建关于社会主义任务和目标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来又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确认和展开论述的。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评价甚高，在通过这个决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即席讲话，称赞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接着在中顾委讲话，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他注重的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在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已经提出，作为一个理论来展开论述，用以贯通和解释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各方面体制改革、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则是十三大的事情。十三大报告就是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是经过小平同志同意的，他批了“这个设计好”五个字。大会前，他向外宾介绍：我们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大会后，他又向外宾介绍：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如果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建设经济特区，是改革起步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入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领导、提倡、支持下打开局面和取得成果的。

十三大报告明确地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鲜明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在六十多年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并列举了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因此，我们说，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个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

六、以南方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 1992 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

向成熟、形成体系。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一，是因为这个理论经受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的严峻考验。从十三大到十四大这五年，国内国际都发生了重大事变。这些变事的严重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未曾面临过的，它们的发生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正是这种严峻考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巨大的风波和变局中闯过关来，站住脚根，并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理论作指导，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和威力，人们增强了坚持这个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二，是因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这个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南方谈话是在总结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我们面临的时机和挑战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不仅有政治上的鲜明性和针对性，而且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南方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姓“资”姓“社”，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和探讨，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深刻透彻的概括和阐发。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关于台阶式发展战略的新概括，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等等，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新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1989年5月在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南方谈话正是这样的新的思想、观点。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三，是因为以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根据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历次论述的精神，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里面的“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成熟性，“初步”则是说的成熟程度，说的走向成熟。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四，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即这个理论实践的时间还不长，我们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能还要二三十年时间，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这个理论还有待充实、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相信，在由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辟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将接受新的检验，得到新的发展，

指导我们党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和小平同志的历次论述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

1992年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其中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节），一篇题为《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围绕介绍小平同志六次有关论述，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那两篇文章对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搜集得还不完全，现在再作一些补充，并从更广的历史背景来作一些探讨。

先讲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商品、市场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作的关于《共同纲领》起草的说明，则明确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953年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序言中说：恢复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起来，“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开辟了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于是计划经济开始支配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计划经济起过重要作用。面对全盘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在经济生活中引起的诸多问题，也曾多次设想对计划经济体制要有所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改革设想，是八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计划生产是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的思路。这是公开发表，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条改革思路，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人们不大知道。我指的是前些年我们写文章介绍的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就是说，那时曾经考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还可以允许国内的和华侨的资本家投资雇工办厂，这自然属于按市场变化自由生产的经济。前一个设想郑重地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后一个设想则只是思想的火花，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决策。

历史的曲折就在于。无论是前一个设想，还是后一个设想，都由于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被搁置，被抛开了。人民公社化中还刮起一股消灭商品的“共产”风。毛泽东最早觉察和批评了这种主张，并就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问题说了一些重要意见，这就是近来人们常引的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思想，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之列。当然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的思想没有能贯彻到底，而且包含着许多矛盾。后来在实际政策中对商品生产仍然有诸多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自由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的尾巴），在理论上则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

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尽管也有复杂情况和起伏过程，从根本上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遵循的是一条追求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真正的转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自那时开始，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观念，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十多年中，我们党的认识上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这个公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所确认，并写进1982年宪法。我以为，这是向八大一次会议写进决议后来又被抛弃的观念的复归。对这个公式，现在人们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已经不提了，落后于生活了。但是，观察历史进步，主要看它提供了哪些不同于过去的新东西。这样来看历史，就应当承认，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的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为辅，在认识上是一个前进。这个台阶，可以说是实际上局部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始。

第二个台阶，就是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决策，并在十二大得到确认。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使我们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一步展开。

第三个台阶，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这是十四大的重要贡献，已经写进经过修正的宪法条文之中。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入了目标明确的、不可逆转的崭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形成过程的轮廓，大致如此。

小平同志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这就要讲到小平同志的十二次有关论述了。

第一次，就是1979年11月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断然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1992年4月我在文章中摘引了这次谈话中的有关论述，引起大家注意，说是新闻。其实这次谈话全文，早就收在人民出版社1980年内部发行（十万册）的《中央领导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中。现在有关的段落已经收入《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了。

这次谈话还沿袭了当时大家都赞同的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这有历史原因，从认识的前进来看，这次谈话的重要性在于贡献了新的东西，即突破了市场经济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排斥市场经济的固定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小平同志考虑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还没有把个体

经济和私营经济考虑在内，因为那时个体经济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得到较大的发展，允许私营经济的决策还没有作出。他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可以搞市场经济。这至今还是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需要抓住的重点和需要克服的难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主要任务就不能认为是成功地完成了。

第二次，是 1980 年 1 月《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这是当时公开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了的。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到了“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当时的规范化了的提法。小平同志那时更习惯的恐怕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或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的提法。

第三次，是 1982 年 7 月关于长远规划的一次谈话中的一段论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这就是说，在小平同志看来，改革开放搞活，活与不活，就在于市场运用得好与不好。所以，搞活，也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走向市场，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同时不可以抛弃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次和第五次，都是对 1984 年 10 月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评价，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市场经济，但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新观念的积极评价，无疑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过渡的重要步骤。

第六次，就是 1985 年 10 月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

经济改革决定解决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仍然是有力量的存在。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又回到他 1979 年即已提起的社会主义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话题，重申了他的一贯观点。这是这次谈话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

我 1992 年介绍这次谈话的时候，引用的是当时报上的报道。这段谈话的准确文本是：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提法也很值得重视，它讲的是方法论，也就是强调在观察、判断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类问题时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还有一个情况应当介绍，就是关于这次谈话，当时的报道和现在收在《专题摘编》中的摘录都没有表达出小平同志所作的回答是针对怎样的提问。人家问的问题是：经济改革出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美国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许多人深感困惑，要求回答的问题。小平同志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他认为，解决那些消极现象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他说：“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观察和按什么思路去解决上述这些令人困惑的矛盾和问题，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七次，1987年2月6日，小平同志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已经没有讲计划经济为主，但这个思想还不是很明确，认识也不是很一致。根据小平同志这个决策，十三大报告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

第八次，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工作汇报时说：“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这段话在字面上没有涉及计划和市场，而在实际上，对于新的条件下的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的宏观管理，这段话对我们会有重大教益。

第九次，1989年6月9日的重要讲话。这是当时公开发表的。小平同志在强调我们的路线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没有错的时候，重申了“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且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些。”“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这里用的是市场调节，但是我体会，综观小平同志前前后后多次谈话，并不包含排斥使用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的意思。

第十次，就是薄一波同志最先给大家介绍的1990年12月24日的谈话。“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第十一次，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两次谈话的背景是什么？我以为，当时有些理论文章又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引起人们的困惑，是客观存在的背景。

第十二次，就是大家知道的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其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两个“不等于”的论断，对长期困扰人们、当时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与此相联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而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对小平同志十二次有关论述的历史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中，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贯的，全面的，深思熟虑的，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他始终走在最前头，引导我们看清方向，排除困扰，坚定不移地逐步前进。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他关心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他要求我们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坚持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思想路线和判断标准，来解决和衡量包括市场经济问题在内的各种政策和理论问题。

小平同志说过，他在经济问题上讲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什么叫从政治角度讲问题？我体会，就是从我们的政治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角度讲问题，就是从我们的政治立场——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来讲问题，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来讲问题。这一点，从他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十二次论述中充分体现出来了。这样的政治角度，这样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判断标准，是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根本线索。

论《邓小平文选》

意义和要领

——从南方谈话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一篇谈话，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

一个大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一部著作，现在出版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

三件大事，连为一体，已经、正在并且必将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为终卷篇，《文选》出版的同时又把南方谈话在报上全文发表。我觉得，这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表明：我们应该联系到南方谈话，联系到十四大，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意义和要领。

（一）南方谈话一传达，正如我国舆论界形容的那样：“东方风来满眼春”。当时许多同志就指出，学习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基本路线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加快建设的再推进。在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全党全国人民振奋起来，全国形势打开了世界瞩目的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党的十四大，是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一篇讲话和一个大会，那么，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就是把新时期的历史发展推进到加快步伐的新阶段的一篇谈话和一个大会，是划阶段的一篇谈话和一个大会。

十四大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了郑重的结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如同党的七大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党的史册一样，十四大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科学评价，提出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而载入党的史册。

十四大把这个战略任务提出来了，拿什么作教材呢？最好的教材当然是小平同志自己的著作。这样，尽快完成编辑和出版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成为强烈的呼声。

（二）大家知道，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前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成为强烈的呼声。晋察冀，苏中，东北，晋冀鲁豫，各

地都编出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建国以后才出版，1951年出第一卷，到1960年出齐四卷。这四卷书，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全部重要著作，是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总结。它的意义伟大，永远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91年，中央又决定出版了它的第二版。毛泽东同志建国以后的著作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编成选集。经他重新审定同意编入第五卷的，就是《论十大关系》这一篇。

《邓小平文选》一共三卷。在十四大以前已经出版过两卷。“十二大开过后不久，1983年就出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卷。1989年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五六年）卷。小平同志十二大以后的著作，1984年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收集了二十二篇谈话的小册子，1987年初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收集的谈话增加到四十四篇，1987年十二大前夕出版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共九篇，此外还有报上的报道：党内的通报。这些小册子、报道和通报，对于读者及时了解和学习的，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同编定一本完整的文选，在整体规模上，在完备和准确程度上，在精益求精的加工整理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十四大以后，在强烈呼声的推动下，小平同志同意着手进行准备工作，1993年小平同志用四个多月时间，亲自指导加工整理，并经他逐篇审定，于9月27日完成了编定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工作。这一卷《邓小平文选》确定称为第三卷，以前出版的那两卷，将修订再版，按著作的时间，改称为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卷《邓小平文选》时间跨度为十年（一九八二——一九九二年），一百一十九篇，正文二十五万字。将近九十的高龄，伏暑盛夏的季节，集中注意力完成这样一项宏大的工程，可见作者对出版此书重视的程度和期望的深切。

（三）为什么说，编定一部完整的文选，同以前发表那些小册子、报道、通报相比，有很大的前进？这要从篇目和总体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篇目总数来说，在两本小册子中发表过的、在十二大文件汇编和《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这两部文献汇编中发表过的，以及没有收入上述小册子和汇编但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包括简略报道）的，共有五十九篇，没有发表过的有六十篇。

第二，已经发表过的五十多篇中，根据作者的要求并经作者审定，大多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又从文字和条理方面作了再整理，其中十多篇（包括1983年3月2日《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按照原始记录增补了不少当时没有发表的重要内容。

第三，过去报上的报道，包含不少重要内容，但大都比较简略，还有不少重要论点和论述没有报道出来，个别还有不准确之处。而且散见报端，一读而过，查阅不便，往往被人们忽略。现在按照原始记录整理出来，分别成篇，内容比报道完整、连贯，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增添了新篇目。这类篇目约有三十多篇（包括1985年10月23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7年10月13日同卡达尔的谈话、1988年6月22日同门格斯图的谈话、1989年5月16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等），占全部新篇目的半数以上。

第四，过去党内发过通报的，党内较高级别的或在某些部门（主要是外事部门）工作的干部分别读过一部或全部，现在收入书中公开发表，大家都读到了。而且收入《邓小平文选》时也作过文字和条理方面的再整理，有些也有重要的补充。这里面包括《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这样一些发过党内文件的重要谈话，9月4日这一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这一部分还是收入《邓小平文选》时补充进来的。这类篇目，占全部新篇目的大多数。

哪来一个“半数以上”，又一个“大多数”呢？这里有一部分重复计算，因为有一些简要的新闻报道，同时在党内或部门内发过较为详细的通报。

以上两类，扣除重复计算；约有四十多近五十篇，占全部新篇目的四分之三以上。

第五，还有一批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或部门、地方负责同志的谈话，当时既没有报道过，党内也没有发过通报，这次收入《邓小平文选》，是从最充分的意义上说的党内党外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谈话有十来篇，包括《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3月4日）、《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等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这些谈话，都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作出的内容极其重要的谈话。

这是从篇目上来说的。

（四）从整体上说，十年的著作，编成一卷完整的文选，人们从一整卷书中学习，所能得到的，就不是从散篇或某一侧面专题摘录中所得的可比了。这里从历史、大局、理论三个角度作一些分析。当然，历史是大局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把握大局的指南，三者是相互联系的。

第一，历史。通读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对这十年历史的完整的理解。

这十年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来的十年。书里讲的都是我们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读这一卷书，可以从整体上回顾和总结一下十年中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路和正在走的路，并且是从小平同志论述的思想高度来进行这种回顾和总结。这对我们认清过去历史、认清当前现实、认清今后走向，无疑会有极大好处。

第二，大局。通读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了解到小平同志著作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

什么叫大局？我们理解，大局就是“根本发展战略”，就是我们党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中的战略目标，就是我们党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确定的战略布局。小平同志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大局就是为坚持这样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所必须创造和争取的根本条件：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和平环境。大局讲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页。

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和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大问题，是中国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大问题。对大局的把握，来自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来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作的关于形势、挑战、机遇的深刻思考。

这十年，是很不平常的十年。在不平常的进程中，强调把握大局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大局并不总是很容易把握的。看起来好像都很清楚，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经常变动，由于一些未曾预料到的事件的突然发生，由于各种复杂纷乱的现象的不时干扰，致使我们的头脑不能保持冷静，视野模糊起来，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这时，能不能把握住大局，把握住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就要经受考验了。

这十年，我们经历了国内的政治风波和国际的急剧变局。这十年，我们前进的步子迈得是很大的，在实践上，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的步子迈得很大，在理论上，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步子也迈得很大。正是在这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之中，在大步前进难免带来的一些颠簸和困惑之中，小平同志把握大局，排除干扰，带领和指导我们沿着确立的路线坚定不移地向前进。

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充分反映了小平同志这十年在各个关键时刻把握大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魄力、智慧和勇气。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对于我们认清把握大局的意义和提高自己把握大局的本领，无疑会有极大的好处。

第三，理论。通读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可以帮助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和领会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从理论上弄清楚问题。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围绕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特别是在中国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反复指出，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全书不下二十次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是全书探讨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小平同志说过：“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他还说过，“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清”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5 页。

民主专政的道理；对于我们的构想“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正是小平同志从理论上说明、论述这些重大问题的一部著作。

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正是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的一部著作。

（五）这样一部著作，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中央和全党非常重视的著作，它的意义怎么来概括呢？

我们体会，可不可以这样来概括：这部著作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的历史性嘱托，是面向现实、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性嘱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造成的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新事业。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非常重视党的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十三大以前他就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十三大以后他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准备并且实行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班。这个交班，是职务的交班，更是路线的交班。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职务的信中，小平同志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时的讲话中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作为“忠于”和“关注”的集中体现，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他编定的以这个谈话为终卷篇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这一全新事业中形成的基本路线，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可以说，他这部著作是献给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骨干的，是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帮助党和人民更好地掌握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论发生什么预计到的和没有预计到的、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风波，都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直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这个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不能动摇的嘱托，贯串全书。开卷篇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提出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中间几次波澜，几次重申。1989年风波，小平同志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篇他自称是“我的政治交代”的谈话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5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终卷篇的南方谈话：“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足见这是小平同志最关注最重视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最重视的主要问题，是决定中国大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关键一条。我们一定要牢字地长久地掌握住这一条。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这是小平同志对我们这些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

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要领

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怎么学？它内容丰富，学习的时候，怎么抓住要领？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对怎么学，怎么抓住要领，有明确的全面的指示。仅就读书而言，我们体会，就是要钻研原著，通读全书。对有一定政治经验和文化理论水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也能够这样要求。

怎么抓住要领？我们体会，抓住南方谈话就抓住了融会贯通地理解全书的要领。

这是基于南方谈话在全书中以至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带有总结性质的地位；又是基于南方谈话中的基本观点在全书中以至在《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中都是一以贯之并有其由来和发展的事实。

（一）南方谈话作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终卷篇，是这十年中或者说这十多年中小平同志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全部理论思考的总结，发挥，深入，升华，并且形成为一定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新上卷《邓小平文选》直接反映了这十年的过程，同时书中对这十年以前的过程以至这十年中的过程，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根据这些论述；对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作出一个粗线条的勾画。

第一，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诞生前的酝酿。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几次说到那时的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一次试验，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所以，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是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

第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个理论开始产生。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当然都是为着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包括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政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25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Z19 —

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 1982 年 10 月同金日成的谈话以及其他许多谈话，反复地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必要性及其基本进程。同拨乱反正相伴相随，改革开放也已迈开重要步伐。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这个理论逐步发展。

第三，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这个理论已经形成主题。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十二大以后，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全面改革。从十二大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逐步转向全面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改革。这里说的改革，包括开放在内。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要求理论思考的深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促使我们党重新构建关于社会主义任务和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以后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改革全面展开以后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有鲜明的反映。

第四，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列举了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可以说，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个理论逐步发展，形成轮廓。

第五，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是因为南方谈话反映和表达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实，即这个理论经受住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的严峻考验。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是因为南方谈话把这个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三个突破。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还因为以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对这个理论的评价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里所谓“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成熟性，“初步”则是说的成熟程度，说的走向成熟，说的在实践中发展理论还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艰巨的任务。

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回顾中，南方谈话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全书和这个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就很清楚了。以南方谈话为要领来融会贯通地领会全书，这个学习思路的道理也就清楚了。

（二）读了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我们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南方谈话同小平同志 1989 年 5 月到 9 月《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等三篇党内谈话和 1990 年 3 月 3 日《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以来的多次

党内谈话，是紧密相联的。简直可以说，这些谈话是南方谈话的前篇，是南方谈话的先导，是南方谈话的预备。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方谈话的基本论点的由来和发展。

进一步说，南方谈话的基本论点不仅是上述那些谈话的基本论点的归结和发展，也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书其他各篇的基本论点的归结和发展。

下面我们以南方谈话中的几个基本观点为例，来看看这些观点是怎样贯穿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成为全书的主要思想线索，并且在全书中怎样得到反复的论述，怎样一步步丰富和展开的。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新的事业、新的理论

南方谈话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走出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业。这当然也是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最根本的精神，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根本的精神。十四大概括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头一条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小平同志一再说：“我们现在于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78年以来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

为什么说是全新的事业呢？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落后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古老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先行者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第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失误，我们的事业经历了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更使我们的事业几乎走入绝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必须开拓一条走向柳暗花明的新路。第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系列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动荡，遭到失败。中国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屹立，说明我们开拓的新路是正确的，又要求我们从比较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去开拓自己的新路。第四，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经济 and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拥有许多既得优势，我们面对着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压力。挑战严峻，机遇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打开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世界上争得自己应有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的确是一番全新事业。

（二）这样的全新的事业，怎样去开拓？从马克思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列宁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前人的本本里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哪国的模式都不行。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握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进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9页。

这就是为什么小平同志始终把恢复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在最重要的地位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作小平同志的思想和理论的精髓、真谛、灵魂的原因。

（三）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新时期新事业的开始，坚持这条思想路线，贯串在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拨乱反正主要是从“两个凡是”、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那么，全面改革则要求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时代发展与世界科技和经济进步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从传统观念中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的框框中解放出来。

这十年中，每当我们党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上迈出重大步伐的时候，小平同志总是同时向全党强调地提出解放思想的任务。

（四）十二大形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伟大成果，又是要求我们根据这条思想路线去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

小平同志多次重申，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他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他还强调：“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自己的道路。“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说，我们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自己的新的思想、观点和理论。

（五）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长时期束缚我们思想的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小平同志称赞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

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理论创造，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成果，又是对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巨大推动。正是在评价这一成果的时候，小平同志郑重提出：“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里讲老同志，因为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讲话。实际上这当然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

（六）十三大确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最先是在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来的。十三大报告以这个论断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说明由此而来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以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这个思路是经小平同志同意的了，他批道：“这个设计好。”大会前小平同志同意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大会后小平同志又在同日本社会党土井委员长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同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的谈话中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角度对过去“左”的错误作了新概括：“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新的理论创造，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成果，又是对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巨大推动。所以，小平同志说：十三大的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七）南方谈话是新阶段解放思想的新宣言。南方谈话前一年，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就已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三个“一点”的精神贯串在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中。

思想不解放，归根到底，要害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弄清楚而引起的长期争论的问题。南方谈话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就为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从而帮助我们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摆脱那种把某些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方法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把某些并不一定损害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方法当作资本主义而固拒的传统观念，大胆放手去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0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7 页。

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

南方谈话是新时期开创新事业中新的理论创造的总结，进一步推动着新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八）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写出新的著作，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自己面临的新的问题。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做了才取得成功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就是说，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时代要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论的任务。他为此而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后来发生严重失误，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只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这十几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才初步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们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产生了新的理论，中国革命的自己的理论。同样，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理论。一面旗帜，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毛泽东思想”，写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举起这样一面新的旗帜，按照十四大报告的说法，就是举起“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

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南方谈话最具号召力的几句话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这样，就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把对发展速度的正确把握提到了重要地位。这同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鲜明的命题，以及全书中关于发展速度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一脉相通。

（一）在这一卷，小平同志多次回顾和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下决心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历史由来。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这种情况造成的恶果：“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两句话，是令人痛心的概括，也是发人深省的概括。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二十年间改善很少。“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一条“一心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4 页。

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是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给出的一个界定）。这些命题，看起来似乎平常，却总结了沉痛经验，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新一卷《邓小平文选》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结合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首先提出和反复阐发这些命题。

确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要继续加以解决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受干扰，不再动摇的问题；一个是发展经济要力求有一个适当的、较快的速度的问题。

（二）干扰问题。党的八大也曾确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国内外未曾预料到的一些事件的干扰，不久我们就从实践上到理论上离开了这个中心，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近几年国内外风波迭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清醒地把握住局势，断然地排除了干扰，保持了国内政治的稳定，保持了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中心。

（三）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还是从现实的战略把握来说，都包括两个方面。

“大跃进”，头脑发热，盲目求快，生产被破坏，人民遭灾难，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也要牢牢记取。这是一个方面。过去的教训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政治上的折腾和混乱使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我们同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比建国初期还要大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小平同志把握速度问题一直注意两个方面。

他制定的翻两番，三步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样一整套发展战略，就是记取了要求过急的历史教训。只要想一想这个战略是重新解释和修改了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口号而制定出来的，再想一想到下世纪中叶的目标怎样由接近世界发达国家修改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小平同志在1989年6月9日的重要讲话中郑重地提出问题：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不是错了？他明确地、肯定地回答：“没有错”，这“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

不能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速度太低了也不行，“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四）通观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一直关注着经济发展要有适当的、较高的速度的问题。

1982年头一次出现了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原定计划很多的情况。这时，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

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要注意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计划订低了，会产生什么影响？

1983年3月视察江浙回来后，小平同志很高兴，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不要议论得多，行动不快。

1984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名文中，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

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的风险议论纷纷。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在改革过程中保持比较好的发展速度，就能提高承担改革风险的能力的重要论点。

1988年秋天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小平同志是赞成的，同时叮嘱：无论如何“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1989年风波平息不久，小平同志要求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情况，头一件就是“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

1990年3月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中小平同志又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适度”，就是既不要主观臆想的、会伤害机体和机制的过高速度，又不能是没有危机感、紧迫感的慢慢吞吞、疲疲塌塌的低速度。“适度”的标准，就是至少要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的，把物价上涨因素扣除在外的再翻一番。老老实实讲求效益的、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的再翻一番。

“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这些话说得多么重要，多么恳切啊！

（五）一个适度发展，一个台阶式发展，小平同志认为这是带规律性的东西。1991年8月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中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356、355页。

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六）读了这些文字，再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讲“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从我们这些年的经验和国际上的经验讲“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讲“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讲“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些思想的确是经他反复思考、深思熟虑过的，就十分清楚了。

（七）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是我们对自己的人民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责任。在发展速度问题上，要把握住不能过急和不能太慢这两个方面。南方谈话以来经济发展的形势总的说来是很好的。世界普遍不景气而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这件事情的意义与影响不可低估。发展中产生和暴露许多问题，中央已有明确分析和重要举措，全党要坚决贯彻执行。这是为了更好地、全面地体现南方谈话的精神。

同时，发展工业、第三产业，不能忽视农业。小平同志一再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发展加工工业，不能忽视基础工业，包括能源、交通、信息、原材料。“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年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发展经济，不能忽视教育。“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量的发展，更要注意质的提高，质的提高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新论点，反映了时代，继承了马克思，又发展了马克思。科技与教育要摆在发展战略的首位，“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去发展经济，必须有全面观点和长远眼光，从各方面去创造和改善为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健康的、有后劲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36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0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275 页。

三、是坚持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政策，还是选择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的好的政策？

为了发展，必须改革，而且是深刻的、带根本性的改革。南方谈话一开头就提出和论述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点。这是关于我们改革的性质的重要论点，说的就是十四大所概括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那时小平同志就曾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当时报上报道过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曾经引起颇大反响，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以至后来很少被再提及，许多人淡忘了，许多人不知道。南方谈话以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索。现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把当时简单报道过的谈话，整理成篇，收了进来，还收入了许多论述改革的文章。通读全书可以看到，这个观点在小平同志那里确是一以贯之的，是逐步深入和发展的。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小平同志就已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里面包含了改革，但着重突出他讲改革的革命性质，则是在农民创造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大规模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也就是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

先是讲：这几年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随着改革发展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在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小平同志在同联邦德国科尔的谈话中进一步从总体上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不久，在同日本二阶堂进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重要命题。

（二）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呢？

小平同志在随后同坦桑尼亚尼雷尔的谈话《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中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七年。”第二次革命，就是相对于那一次伟大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的一次伟大革命）而言的。

（三）为什么有了第一次革命，还需要第二次革命呢？

小平同志接着说道：“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在于怎么坚持。“是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4 页。

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改革的历史根据，也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改革的性质。

改革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重新选择。

改革是要改掉不能摆脱贫穷的不好的政策，改掉仍然束缚生产力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经济体制。这就是说，改革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

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这个转变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四）政策的重新选择，最根本的是“三个转变”。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概括：“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在这三个根本性质的政策重新选择的基础上，还要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进程中，在各项工作、各个地方、各种形势变化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去不断地选择和重新选择各种具体的好的政策。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五）体制的重新构建，就是南方谈话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个“从根本上改变”的论断，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提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理解，南方谈话重新提出，人们才认真去思考和领会。说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就意味着不是在原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作一些细枝末节的纯粹量变性质的修补，而是要在体制这个层次上（不是在基本制度这个层次上）来一个质的性质的变化。这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突破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到突破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到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进程是由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推动的。而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思考和把握，他的一系列有关论述，从1979年同吉布尼等人的谈话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里遇到的仍然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传统观念一直认为社会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4—13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这有一定的由来和根据，却没有能够经受住长期的全面的历史检验。市场经济在现代被证明是发展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较高的体制和方法。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坚持传统观念，把它拒之门外，还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它采纳过来，以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和活力？小平同志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勇气，在这个问题鲜明地表现出来。

（六）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一个关键问题是放和管的关系。

1988年9月，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工作汇报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的宏观管理，这段话对我们会有重大教益。

（七）放开，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放开，就是让农民家庭有经营的自主权，让集体的企业有经营的自主权，也让国有的企业真正有经营的自主权，有自主权才有积极性和创造性。放开，就是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让国外境外资本进来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把这一部分积极性调动起来。放开，就要走向市场，让多种经济成分和形式在统一市场中平等竞争，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改造自己的实现形式，增强自身的内在活力，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使整个经济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从一个意义上说，也就是市场一步步放开的路子，一直到确认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即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种新体制要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形式长期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要建立在以按劳分配和劳动所得为主体，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上。所以小平同志充分肯定“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

（八）但是，放开并不等于不要管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正是有一套适合市场经济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如此，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不同经济学派影响下，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小平同志说：“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呢？”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不要管理呢？应该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所进行的控制和管理，相当有效，相当严密，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要管理，完全自由放任，是小生产的意识和要求，同社会化现代化是不相容的。

在管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总是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中央要有权威。”“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数。”中央要制定法律并严格有效地督促法律的实施，要制定政策和措施并严格有效地付诸实施。这是中央的责任，不能放弃责任。中央定了法律、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自然，这里讲的是“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不是指合乎中央政策范围内的正当的对策。

另一个方面是，管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所以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既不同于过去的管理，又不是不要管理。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以后，如何实现这种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正是建立这种新体制并使之健康运转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党正在致力于研究和解决这个重大课题。

（九）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只能沿着改革这条路前进。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贫穷落后状态。

正是走这条路，十多年中“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活，从根本上说，是活了社会主义，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目的。

所以在决定实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小平同志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1989年风波，小平同志回顾过去，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1991年小平同志又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综观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反复论述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界定。

四、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有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南方谈话强调“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一系列的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最根本的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个坚持。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全书都贯串着两手抓的根本方针。

（一）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一文中，小平同志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27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

十三大概括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从这里来的。

（二）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流血牺牲而作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团结、进步的牢固基础。“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

历史已经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在近代中国，此路不通。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才站立起来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这些历史结论，已经成为经历过旧中国的深重苦难和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的几代人的共识，还要通过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后代，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教育青年、教育后代，使这个共识一代代传下去。

我们说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首要问题，而讨论这个问题，前提是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要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从研究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中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坚持好社会主义。所以，坚持社会主义，作为前提和目的包含在我们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之中。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统一整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界定。

（三）中国要摆脱贫穷，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别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因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不能纵容。中国不允许乱。中国有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惨痛教训，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会出现真正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出了一人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的真理。中国人民懂得这个真理，外国负责任的政治家也会懂得这个真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8—24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7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1 页。

政治稳定，一靠四个坚持，一靠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是靠经济发展。小平同志说：四个不变（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才能稳定。又说：要有两个稳定，即政局稳定，政策稳定。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四）在四个坚持中，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缺少的一条。在国内外还存在敌视和企图破坏我们的势力的情况下，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威胁，不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政权，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制止动乱，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也不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人民利益，依靠人民群众，凭借人民的国家机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有效地保证国家的安全、稳定、秩序，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长期安定的环境，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大得人心的事情。如果人民民主专政软弱无力，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就会丧失人心。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多次讲过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在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领导广大农民同盟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两个方面存在劣势。一个是生产力发展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求我们作最大的努力去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使中国逐步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一个是阶级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改变这两个方面的劣势，是密切相关的：靠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来保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靠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离开、破坏这个中心，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说，发现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并非“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把阶级问题同生产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过去讲阶级问题，对生产力发展、对马克思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思路注意不够，恐怕是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原因。

（五）一个政治保证，一个精神动力。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建设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界定。

“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久，我们党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在党的文献中，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和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提出了这个问题。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贯串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全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2—333 页。

在开卷篇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十二大报告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是“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里讲的“四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四有”。

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着重提出了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迫切任务。

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又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许多工作。

“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并且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所属的企业“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确定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小平同志在全会上讲话以及这以后的多次讲话，反复论述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

1989年以来小平同志几次批评这些年“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认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要求我们切实纠正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失误。

总之，强调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是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在精神文明建设纲领的“四有”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理想和信念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同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小平同志讲理想、讲信念，总是把它同人民的物质的利益联系起来，把它建立在对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讲精神文明，总是把它同物质文明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上。他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在南方谈话中他表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14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7、290、3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六）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上，在我们党内，滋长了许多消极的腐败的现象。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说：“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

他反复嘱咐新的中央领导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又要让人们明白，不能把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归咎于改革开放并由此而怀疑改革开放。这些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所需要、所提倡的，而是为了健康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加以反对、加以克服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

1985年外宾向小平同志提问，这些消极现象的出现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采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是因为这样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他还说，对于消极腐败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我们必将做到这一点。这段话，为我们如何正确地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同精神文明方面出现的消极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七）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这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科学理解。两者都围绕和为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以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标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任务出发，提出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次讲到这个战略方针。就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右，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定改革开放，认为那是搞资本主义，这是“左”。右，当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左”，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变成坚持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发展下去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总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9—15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

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呜呼哀哉，死路一条。如同改革开放要贯串我国发展的整个过程一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要贯串我国发展的整个过程。这“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南方谈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中国的发展问题摆到世界范围的背景上来考察，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也是这样。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

（一）小平同志强调：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要有两个条件，就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重要变化。以前总是担心打仗，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根据对世界大势和周围环境的新的观察、新的分析，我们得出新的判断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小平同志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新观察、新分析，我们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点，就是为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地打开更宽阔的局面。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是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界定。

（二）“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小平同志这样总结了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我们老祖宗吃的苦头来说：近代西方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头，而正是这个时候，我国实行了两三百年的闭关自守，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鸦片战争以前。“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落后就挨打，从反鸦片战争算起，世界上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我们，欺负过我们。我们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和耻辱。

从我们吃的苦头来说：建国以后，一方面是人家封锁我们，力图把我们孤立于世界的发展之外，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所以，小平同志总是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0 页。

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篇作为政治交代的谈话中，小平同志谆谆嘱咐：“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

小平同志还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所谓赶上时代，就是要开放，要面向世界，赶上当代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小平同志的结论是：开放才能发展，开放才能赶上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三）开放的必要是一方面，开放是否在客观上确有现实可能是又一方面。如果没有现实可能，如果世界形势、外部条件不允许我们开放，那么开放只能是幻想。

因此，小平同志在反复论述开放的必要的同时，又很注意观察国际形势。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末期以来，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在这种新情况下，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对我国对外方针的坚定把握和深刻论证，成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很突出、很精彩的重要内容。

（四）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有些什么观点呢？归纳起来，比如说：

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世界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可望至少在本世纪内不再发生，尽管国际局势发生剧变，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这些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观点；

关于国际上旧的格局已经改变，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一个针对第三世界，一个针对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持不久，少数国家垄断一切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

关于要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发展起来，就谈不到下世纪是“亚太世纪”的观点；

关于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下世纪是高科技世纪，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我国必须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

关于坚持一个方针：同俄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样跟日本、欧洲国家也搞好关系的观点；

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观点；

关于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的观点；

关于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的有利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的观点；

关于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怕威吓，不受挑动，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的观点；

关于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观点；

关于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2 页。

的观点；

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的观点；
等等。

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对国际大势的观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深刻地影响于党的路线、战略和政策，深刻地影响于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事业。这里的根本点，在于清醒地估量国际环境对于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从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五）说到对外开放和对国际形势的观察，还必须十分注意领会小平同志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于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小平同志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开卷篇中的这一段话，真是掷地有声！

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终卷的最后几篇中，小平同志又斩钉截铁他说：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从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国际上一股逆流来势汹汹，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

面对这个情况，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否则，即使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也不容易。

小平同志还强调：中国现在也还是个穷国，为什么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的地位？就是因为不是看着别的大国的脸色行事，不是坐在别人的车子上，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六）总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世界上要善于自处。不做附庸，也不搞霸权；不示弱，也不逞强；不怕谁，也不想得罪谁；不高估自己，也不贬低自己；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广交朋友，又心中有数；决不当头，又有所作为；同某些外国的关系难免不时出现事端，发生起伏和冷热，但这是政治上的态度，至于开放政策那是不变的，不受这个态度的束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尽可能利用外部世界对我有利有用的一切条件和因素来尽快地发展我们自己，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六、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3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1 页。

从十二大开幕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提出坚持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到南方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个不能改变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命题，成为贯穿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全书的一条红线。

（一）提出不能改变，就是因为有可能发生改变，或者是明文昭告地改变，或者是不知不觉地改变。这有历史上八大一次会议路线很快改变的教训，这十年也一再发生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会不会改变的担心。

1984年，针对国际上关于“邓某人不在乎政策要变”的担心，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这个时期，他跟外宾谈话也总是谈我们的路线变不了，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1987年初针对那时又起的议论，小平同志反复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受影响，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他还进一步说：“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小平同志5月31日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风波刚刚平息，小平同志6月9日讲话又郑重他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

1989年秋冬以后国际局势发生剧变，小平同志又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南方谈话，千叮咛，万嘱咐，关键就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由此可见，小平同志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他认为，这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二）“变不变”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不对”。

小平同志在讲会不会改变、应不应改变、变不变得了的时候，反复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说，“变不变”，不单纯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根本上要看实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34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7页。

实践证明它是不是“对”，而“对”又是有客观标准的，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力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只能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从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来加以检验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里包含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讲“大局”，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握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小平同志对于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制定的路线的信心，归根到底来源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三）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本人也正是这样。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科学思想的直接继承。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来的时候，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初，是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标准，最先还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来的。他晚年犯错误，就在于多少离开了他自己原来的科学思想，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忽视。经过拨乱反正，吸取教训，小平同志因而更加强调要始终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四）再有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实践创造，而这与最重视生产力是相联系、相一致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科学思想的直接继承。

他在讲路线会不会改变、应不应改变、变不变得了的时候，总是从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高兴，人民是不是满意，人民是不是拥护，人民是不是赞成，人民是不是答应，人民的心情是不是平静这样的人民立场、人民感情来观察问题，并且教导我们都应该这样来观察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

“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会丧失人心。”

“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一句话：只要路线是对的，人民拥护的，谁也改变不了。正确的、人民拥护的路线，谁改变谁垮台。

党的基本路线，一个是为了人民群众，一个是来自人民群众，来自对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概括。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审阅十四大报告草稿的时候，他又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84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1 页。

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三者是一个整体。这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基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基石。这个特点，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表现得再鲜明不过了。

（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中国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对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到本世纪末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扎扎实实地不含水分地完成翻两番的计划，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下世纪二十年代初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二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到下世纪中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古代人类最辉煌的历史。近代产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走到前面去了，十九世纪成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到那个世纪末衰落达到极点。中国人民是在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的耻辱中，迎来 1900 年的。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战斗、走向振兴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我们相继推翻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世纪的后五十年，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经历了发展和曲折，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以建立起小康社会迎来 2000 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世纪。那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我们将建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五十年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中国的振兴，对于同我们一样遭受过殖民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是极大的鼓舞。对于世界上相信和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无疑也会是极大的鼓舞。当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不少人出来预言：二十世纪兴起的显示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将在二十世纪内灭亡。这个预言肯定是要破产的。小平同志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部分中，小平同志着重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示了信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表示了信心。他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这就是说：

中华民族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

社会主义将在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再造辉煌！

这就是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坚持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0、32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2—383 页。

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实现的光辉前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读《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的出版，是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进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创造这一成果的最杰出的代表，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对它的创造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成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形成，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用这样的观点作指导，党的文献编辑工作逐渐打开了新局面。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了。1981年，《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了。《朱德选集》不久就要出版。这些著作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们的出版，说明我们不再以编辑毛泽东著作为限。当然，毛泽东重要著作仍在继续编辑。1982年，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九十周年，正在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其他集子、周选和刘选下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集子，编选工作都在进行或计划中。

我们也不以编辑历史文献为限，而是十分重视当代文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选编和汇编，就属于这个领域。现在，《邓小平文选》又出版了。这些当代文献的出版，表明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在反映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新成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1975年以来党的正确领导的纪录

《邓小平文选》先从1975年以来的著作编起，是有重要理由的。因为，从这时以来，是邓小平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他的这部分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新的代表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当前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先把这部分著作编选出来，公开出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1975年到现在，通过粉碎“四人帮”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三次从危难和困境中走出，转向胜利和发展的伟大转折。这部文选反映了小平同志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力争取和推动实现这一伟大转折所作的百折不回的努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是，在这期间党并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如实地认清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我们的党有重要意义。历史决议在分析天安门事件这场群众抗议运动时说：“这

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收入《邓小平文选》的 1975 年的讲话，正是纪录党在当时复杂情况下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文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历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粉碎和揭批“四人帮”，是巨大的前进。在揭批“四人帮”的推动下，许多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变，但是，揭批“四人帮”要深入，势必引向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 年小平同志所实施的方针，就是要从实际上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的，因此发生了“批邓”这段曲折。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被“批邓”所打断的历史进程，认真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成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却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表示着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它的提出包含着要肯定发动“批邓”是“必要”的，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革命运动”这些尖锐的政治内容。它导致历史的徘徊。但是，党和人民要前进。党内外广大群众要求为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不是拥护哪个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求我们党有能带领人民前进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机构中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能够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并展开了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批评，确立了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代表这种领导的，是党的好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和新进的领导人。而小平同志，正如耀邦同志所说的，“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这两年的著作，是纪录党在这段时间又一种复杂情况下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文献。当然，这方面还有别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党的其他文献，这些还有待编选和汇集。

三中全会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这以后，历史前进的势头，如河出峡谷，浩浩荡荡，奔腾向前。尽管还有种种困难和阻碍，我们党是迈开大步前进了，各方面工作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完整地记录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进程。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后四年的著作，大多已选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平同志的这些著作属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核心部分。他那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宣言书。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我们党制定这个对统一全党认识有极重要意义的决议的基础。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精要透辟，是十二大全部文件的总纲。属于这个核心部分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著作，以及党中央集体形成的一些文件。这些年我们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实际情况是这样：重大的决策、重要的思想，许多是小平同志提出，还有许多是其他同志提出，经党中央集体讨论而确定，并且由党中央集体以及党和政府各部门对它们进行周密的研究，加以详细的论证，形成具体的政策，制定实施的办法。拿历史决议来说吧，小平同志的《意见》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基本的判断和轮廓。没有这些，决议是不可能形成的。同时，

历史决议又是经过党内广泛反复讨论而形成的集体作品。它吸取了大量的各种的正确意见，在对历史事件作系统全面分析方面，在对历史经验作理论总结和探讨方面，由于集中了集体智慧，都进一步丰富和展开了。

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是集体领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由党的集体来实现和推进的。集体领导中会涌现出若干更突出的领袖人物，成为集体的代表。他们的突出地位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形成的。强调集体领导，并不否定这些突出的领袖人物的作用，而是要正确地和科学地评价他们的作用。同时这些领袖人物只有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度，才能真正代表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

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的表现

《邓小平文选》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理论内容，这里只想谈一点超乎这些具体内容之上的东西，比如说，通过这部著作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领导能力。

共产党员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来源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的。

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小平同志下决心抓整顿。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小平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他果然再一次被打倒了，然而他的形象在人民中反而更高大了。

当小平同志在人民的拥护下再一次出来工作时，他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呢？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坦率他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作了一个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犹疑，没有采取“做官”的态度，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十年内乱及其严重后果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要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毛泽东两次（大革命失败一次，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又一次）领导我们党从危难和困境中走出，转向胜利和发展；又相继领导我们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领导我们在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信任和威望。这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和国家中已经有长期的发展，达到很严重的地步。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许多同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9页。

志习惯于以毛泽东为正确的化身，以他的判断为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之所以能俘获和迷惑许多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打破长期来个人崇拜所形成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用实践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敢于正视和纠正我们党和党的伟大领袖人物所犯的错误，这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我们党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领导人的领导下，表现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表明了我们党不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平同志等领导人既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正确意见，又善于照顾群众的多数，有步骤地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事物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领导者如此，广大群众更是如此。小平同志总是在适当时机，把问题提到适当的广度和深度，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从而帮助人们一步一步地由此及彼，由浅入深，逐渐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这种引导，表现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和能力。

但是，这只是我们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当着我们毅然公开地、郑重地指出和纠正我们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时候，种种怀疑或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议论，纷至沓来。有国外的，有国内的，有党外的，有党内的，尽管情况和性质很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这些错误，能不能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一种考验。在这一方面的严峻考验面前，我们党在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也表现得很有勇气，很有远见，很有魄力。通读《邓小平文选》，给读者以极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在反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和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用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冷静的科学态度，有力地维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维护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和发展的科学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强调必须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历史决议把正确论述和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整个决议的中心。因为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尊重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把它作为我们今后继续前进的立足点的根本问题。在遭遇挫折和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所以，小平同志说：“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所谓发展，就是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接触过去未曾接触的问题，提出过去未曾提出的政策和原则，形成过去未曾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三中全

会以来，我们党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毛泽东思想有许多发展。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文选》的显著特色。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这些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还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选四卷，以及周选刘选上卷和朱选的大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自己的理论，所写出的著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写出了一批成熟的、光辉的理论著作，构成毛选等集子的基石。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经过了顺利、挫折、转变的曲折发展。通过比较，我们在认识中国建设的规律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正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毛、周、刘、朱和小平、陈云等同志在建国最初十多年间已经写出了一些对于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重要意义的著作。《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则是这方面的新文献。随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必将逐渐成熟，现在的文献中若干篇著作的成熟性也将逐渐显现出来。

论党史研究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一) 从历史经验看当前路线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史，学习和研究我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是因为这卷书汇集了小平同志这十年的著作，本身就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这十年的历史。

我们大家过去不是都有一条经验吗？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史，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总的轮廓，总的恩路，总的过程，都有了。当然，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要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众多的历史事实，从各方面的历史活动，去进行研究，不能仅限于读《毛选》，否则，就会把历史搞得太狭窄、太单调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恐怕只有读《毛选》四卷才能掌握。同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也只有读《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才能掌握。

第二是因为这卷书不单反映了这十年的历史，而且书中还有不少地方讲到这十年之前的历史。

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多内容是回溯过去的历史。读《邓选》第三卷，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小平同志讲问题，经常从历史经验讲起。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论述方法，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讲问题，讲清楚历史的由来，凝结着历史的经验。对此，他自己作过说明：“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比如，他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转变，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搞建设，为什么要下决心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打开一条新路，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讲起。这样讲，就讲出了转变、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使大家明白，我们的确非转变不可，非改革不可，不转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又比如，他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什么？他也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讲起。讲“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讲“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讲“‘左’

本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一些补充。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

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从而使人们懂得，他作出这样一个政治判断，提出这样一个两条战线斗争的指导方针，不是对一时一事而发的，他的判断是有很厚很重的历史分量的。

小平同志从历史经验中来阐述我们党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是我们学习《邓选》第三卷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从这里也可以领会到学习和研究党史对于全党的重要意义。

（二）遵守历史决议，深化历史决议

《邓选》第三卷中，有十来篇文章主题可以说都是讲党的历史或者从整体上讲党的历史，或者讲某一个重大党史问题。至于讲别的主题涉及党的历史的，那就更多了。这十来篇中，有这一次新发表的，也有在过去出版的小册子中发表过的。过去发表过的，例如1987年4月30日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格拉的谈话，题目就叫：《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这次整理发表的，有1987年5月12日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的谈话：《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10月13日同匈牙利卡达尔的谈话：《我们于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等等。特别是同卡达尔的这篇谈话，对我们党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整个历史，作了言简意赅的深刻新颖的概述。

不是说要向前看吗？为什么总要回顾历史呢？

的确，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小平同志主持总结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本是非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

作出了历史决议，为什么还要常常回顾历史呢？因为历史经验需要反复领会，反复温习。历史决议的结论，我们应该牢记不忘，不要因为有一些风风雨雨，有一些颠颠簸簸，就对它动摇了，或把它淡漠了。对历史决议已经作出的科学的历史结论个动摇，是对从总结历史中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

小平同志讲党的历史，是遵守党的历史决议的结论的。这个历史决议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这些历史结论是在他的指导下，经全党讨论，根据实践的检验作出来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如小平同志自己说过的，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以他这样的经历，以他长期处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所积累的成熟的政治经验，以他敏锐的思想和善于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力量，他来回顾党的历史，叙说党的历史，的确说出了许多深刻的意见，说出了许多精辟的概括。这些概括，既同历史决议的结论一致，又在语言的凝练程度上，在表达的鲜明程度上，在逻辑的明快程度上，在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上，把历史决议进一步深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也可以说，这些概括发挥了、发展了历史决议的结论，很值得我们研究党史的同志们提起注意，细心玩味。

（三）头八年和中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2页。

小平同志讲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总是把它分作三段：头八年发展得很好；中间二十年发生“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左”的错误，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比如，1988年他同莫桑比克的希萨诺谈话，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

研究当代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大“之”字形的基本历史发展，看作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一条。

为什么说头八年？历史决议不是讲头七年吗？

历史决议讲头七年，是讲建国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小平同志讲头八年，是讲顺利发展的头八年，这八年包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个头七年，还要加上八大以后的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多一点，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历史决议上也是这样说的。

说头八年好，头八年顺利发展，当然是从总的情况说的，并不是说这八年什么缺点错误都没有。

中间二十年发生“左”的错误，“左”的错误从什么时候算起？

小平同志通常是讲“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更具体一些说可以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57年下半年算起，即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算起，这是政治上的“左”。如果从经济建设上来说，那就要从1958年“大跃进”算起，1957年这一年，经济建设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影响到经济建设，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

“左”的错误算到什么时候为止？

如同从什么时候算起有两种算法一样，算到什么时候为止，也有两种算法，要看考虑问题的角度和重点。有的时候，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这样算，二十年不到一点；有的时候，强调“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左”的错误还没有部结束，还经历了“两个凡是”、“两年徘徊”，这样来算，又比二十年还要长一点。二十年是取其整数，是个大约的数字。

小平同志在同但桑尼亚的姆维尼谈话时是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在同西班牙的格拉谈话时是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

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

在同南斯拉夫的科罗舍茨谈话时是这样说的：“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在同孟加拉的艾尔沙德谈话中是这样说的：“‘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这些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这两本小册子中早已正式发表了，是理论界、党史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著作的同志早已知晓了的。

这次新收入《邓选》第三卷中的有关论述则有：

同匈牙利的卡达尔谈话中这样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

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谈话中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

请注意，“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个意思历史决议上已经有了。决议肯定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造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1958年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同时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并且列举了这些失误，包括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样的失误。这一系列失误，当然不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而只能是“实际违背了八大路线”。但是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语言说出来，则是在小平同志同卡达尔的谈话中。

说“‘左’的错误二十年”，是不是意味着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一样的“左”？

当然不是。小平同志明确他说过，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六年，成绩更是主要的，这是一个总的估计，尽管1957年、1958年以后发生“左”的干扰，总的还是应该这样估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估计，则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22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乔木同志写过一篇《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其中说：“一九五八——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里的“中国领导人”，显然是指小平同志。乔木同志用了“动荡和停滞”的说法，加上“动荡”两字，描述得更确切了。此文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2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4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第266页。

的“左”倾严重错误。小平同志要求，在写“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时要“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这些事情写作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这就是说，要追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由来，就不能不讲到“左”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当然作这种追溯，要注意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从1957年开始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左”，和极左不同，这是一。从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这些年中“左”的错误有过比较显著的起伏，有过“左”的错误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和抑制的几段时间，如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八字调整方针提出后1961、1962年的纠“左”和这之后三年的经济继续调整，这是二。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根据历史决议的分析而得出的。书中把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列入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不能忽视这个趋向。说这十年“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上即是就这个发展趋向而言的。

除了上述这两点，我体会还有另外两点：一、“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年的“左”的错误，虽然有几段时间受到一定的纠正，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二、那些年的“左”虽然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在程度和性质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却构成这个期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左”的错误趋向，它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同在它之前的“左”倾错误有联系。不能忽视这种联系。说“左”的错误“二十年”，根本上即是就这个历史联系而言的。

所以，在追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的时候，在提起人们注意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历史上“左”的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造成的危害很大、遗留的影响很深的时候，就作出了“‘左’的错误二十年”这个概括。

（四）对“左”倾错误内容和后果的新概括

怎样来概括“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

历史决议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也作了简洁的归结。小平同志的概括则更加扼要而鲜明。他概括为二句话：“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个论断是在历史决议中提出来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和概括过去的错误，则是对历史决议的发挥和发展。

怎样来概括“左”的错误造成的后果？

小平同志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

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这里既肯定了二十年中的许多工作和成就，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又概括出了两个“状态”，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类似的意见，小平同志在别的谈话中多次讲过。如说：“‘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这些也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两本小册子中早已正式发表过的。

以上所列都是对“二十年”说的。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小平同志还说过：“‘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我在前一节和这一节里不惜篇幅，引用这么多处原话，是为了说明：这不是小平同志偶尔一次的说法，而是他十分确定的看法。

这两个“状态”，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二十年间改善很少。这个意见，小平同志也多次讲过。如说：“我们于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当然，从1949年到1957年，即头八年，由于改革土地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明显的。小平同志强调的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强调在这段时间里“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强调“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

一个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一个经济发展的缓慢状态，一个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这几个“状态”的尖锐概括，是令人痛心的概括，也是发人深省的概括。

（五）用什么做参照来衡量二十年的经济发展

对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这个概括，该怎么看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达到极点，这想必是大家都同意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该怎么看？我看，拿“反右倾”运动来说，党内从中央到基层，那么多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许多政治是非搞乱了，党内政治生活搞乱了，不能不说是某种“混乱状态”吧。再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来说，那么多党外党内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政治批判和处理，说是某种“混乱状态”也不算过分吧。当然，这时的情况同“文化大革命”时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不可等量齐观，但终究是在政治生活中搞得相当混乱，而且正是这时的政治混乱，积累起来，发展下去，导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的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这是历史的事实。

对经济情况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个概括，该怎么看呢？

我看，“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破坏，使我们经过好多年才在粮食和农业生产方面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钢铁生产的恢复也用了好多年，且不讲这中间造成的巨大损失，单从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说，多少年才恢复到原来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不是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吗？“文化大革命”中，好几年年份由于政治混乱而出现生产下降或者没有增长，这不是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吗？

至于其他年份，至于二十年总计，从经济统计数字来说，当然还是有发展的。问题在于如何分析这些数字，如何考察经济实绩，如何看待慢与不慢。这就要有一个比较快慢的参照。拿什么做参照来衡量呢？

一个是以“头八年”发展得很好的时期做参照。用这个参照一量，就不能不承认，这二十年经济发展是缓慢的。

一个是以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做参照，以我国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做参照。用这个参照一量，就不能不承认，问题是很尖锐的了。

小平同志在同“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谈话的时候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

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的时候说：“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

这次谈话是面对当前现实谈问题，不是讲历史，但是包含有历史。从比下有余变为比下也有问题，这中间就不能不记住二十年耽误的历史。

在学习《邓选》第三卷的一个研讨班上，我听到山东的同志介绍，拿山东同韩国比，五十年代中期山东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韩国高，几十年下来，韩国超过了山东好几倍。

可见在当今开放的世界，在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看经济发展的快慢，不能只是关起门来看自己，还必须同国际作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醒地看清形势，认真地警醒起来，发愤图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283—

（六）“文化大革命”的“功劳”

“左”的错误，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最。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历史决议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重要历史结论。对历史决议的结论不动摇、不淡漠，一个重要的内涵就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不动摇、不淡漠。

小平同志说：历史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一生中做的这一件大事。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意味着要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对此，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毫不含糊地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同志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

小平同志在《邓选》第三卷中，则从反面的意义上，从物极必反、教训变财富、坏事变好事的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功劳”。他说：

“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过去耽误大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

“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4、26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2 页。

这些论述，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改革这样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聪明、高明，提出要改革，而是历史的发展，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重新探索，迫使我们走上改革的新路。

这些论述在《邓选》第三卷中反复出现，正好说明了它的极端重要性。它是对历史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的重申，又把历史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进一步深化、强烈化了。

（七）全面整顿是拨乱反正和改革的预演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别值得研究的历史，就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

《邓选》第三卷两次比较展开他说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

一次是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这篇谈话中。小平同志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另一次是在前面提到的同卡达尔的谈话中。小平同志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历史决议对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有极高的评价。决议在讲到1976年四五运动时，是这样说的：“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我想，这里指的就是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所体现的党的正确领导。

《邓选》第三卷中关于1975年的这两段论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个是整顿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一个是整顿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关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整顿当然不可能公开提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它是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来进行的，而且发展下去必然要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小平同志说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文化大革命”还是那时被确认的正调、主调，整顿是同它唱反调。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这是一个新概括。这个概括帮助我们更深地去理解 1975 年全面整顿的意义，也帮助我们更深地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路线的历史渊源。虽然后来的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比起 1975 年的整顿来，要深刻得多了，广泛得多了，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的确应该追溯到 1975 年。

（八）“两年徘徊”和“三大转变”

从 1975 年改革的试验被打断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新发动，中间经历了一个“批邓反右”，一个“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导致两年徘徊。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历史的前进。顺应历史的前进，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这种要求却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历史的前进出现徘徊。这种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结束。

在《邓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扼要而透彻的叙说。我指的是十二大后不久小平同志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时在火车上谈话所作的叙说。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经历了伟大的转变。对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历史决议总结到 1981 年，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总结到 1992 年。《邓选》第三卷中的一些文献在回顾和叙说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有一些精辟概括。

比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转变内容的概括，即“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有时也概括为“两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这样的概括，同对过去错误的“三句话”的概括，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括，是相互沟通的。

《邓小平地》第三卷，第 9—1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3 页。

比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历史进程的概括，即“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当然都是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比如，对拨乱反正进程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概括，即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这是前提，由此而发展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再发展到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再发展到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至此基本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比如，对改革进程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概括，即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这是启动，由此而发展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再发展到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再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至此基本展开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

说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概括，因为历史的基本进程，是有它的根据的，是有它的逻辑的，是有它的规律的。通过历史可以认识规律。小平同志多次向外国同声和友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是怎么一步一步产生的，实践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他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统一起来叙说，用不多的语言就勾画了这场新的革命的全貌。至于《邓选》第三卷全书，更是从整体上充分反映了这个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就不能也不必分别摘录和引用了。

（九）中苏论战的历史是非

前面几段介绍了《邓选》第三卷中从整体上讲我们党建国以来历史一些论述，这一段介绍《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篇同当时苏联党领导人的谈话。“结束过去”，就要对中苏关系（以至中俄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表明中国人、中国党的看法，作一个交待。其中就涉及中苏两党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激烈争论，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篇谈话中有这样几段话很引人注目，就是：“多年来，存在一—289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这些话是针对什么情况说的，是从哪个话题引起的？从过去的简要报道和摘录中，这一点是看不出来的。读《邓选》中提供的文本，这一点就清楚了，是从中苏论战讲起的。小平同志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就我们党这一方来说，当时是怎样批评对方的呢？大家知道，我们编了几套材料，一套是马恩列怎么说的，一套是老修正主义怎么说的，一套是“现代修正主义”怎么说的。当时我们许多同志认为，只要把这些材料拿来一对照，现代修正主义的面貌就清楚了。现在回过头来，这种对照，自然也是必要的，也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嘛，但是单靠过去书本的对照，能搞清楚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能。所以说了许多空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1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1 页。

但是，理论论战只是中苏争论的一个方面。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小平同志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时的苏联搞老子党，搞霸权主义，企图对中国发号施令，而且对中国进行威胁。小平同志在另一次同东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这是对中苏两党争论历史的重要分析。大家知道，历史决议没有正面涉及中苏两党那场争论。但历史决议对我们国内方针上“左”的错误所作的深入分析，已经为我们重新判断那场争论中我们自己的许多观点的是非，作好了准备。从批判苏联赫鲁晓夫到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表明了那场争论中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形成的若干观点同“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历史联系。《邓选》第三卷中对那场争论的两个方面及其基本是非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是对历史决议的一个补充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一书叙述这段历史，就是以小平同志这些论述为指导的。

（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最后，说到《邓选》第三卷对党史研究的意义，我们不能只限于去领会书中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些论述和概括，还应该着重去领会书中反复强调的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这个总的命题。

小平同志在1989年6月9日那庸重要讲话中说：“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从历史上说，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第一，中国是一个在近百年中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国家。中国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耻辱中迎来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谁也不应该忘记这个耻辱。小平同志在同一位华裔人士谈话时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一一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把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提到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这样的高度，这是我们应该认真领会的一个重要思想。

第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才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胜利的国家。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他说：“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邓选》第三卷中两次讲到精神动力，都是同讲历史联系在一起。

第三，中国是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和时代要求的自己的道路，正在向本世纪末实现小康、下世纪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胜利前进的国家。我们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分析我们的失误及其后果，绝不是要否定我们化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不是要否定我们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要从研究历史教训中，更清醒地理解实现历史转折的必要，更深刻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历史由来，更自发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国将要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

当代改革，指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个改革，开创了我们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同时从我们党以往的历史中又可以找到它的由来和发展的深刻根源。

我们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进入这个历史新时期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二大转折和变革。我们又是以党领导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奋斗历史中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基本的立足点而进入新时期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和接续。继承和接续，是基本的方面。否则，改革就不是我们党来领导和进行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离开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变成别人来“改革”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当然，转折和变革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为基础的伟大历史转折和一系列变革，我们就不能前进，也会丧失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通常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我想，称之为“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十年，也许更恰当。这样就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突出出来了。探索有成绩，也有失误，包括实践上和理论上两个方面。十年探索中央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是大家都讨论过了的。十年探索中积极方面的积累，是不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准备？不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很值得深入展开。

我曾经多次建议要研究1956年。我认为，1956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探索，在思想上收获十分丰富的一年。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1956年的探索和努力的发展和继续（参见1986年5月12日《光明日报》上我和刘武生合写的文章）。这里谈的1956年，其实还包括1957年的上半年，即以八大一次会议为中心，前后共约一年半的时间。

我建议还要研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那八个月，研究从1960年冬提出调整方针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间的那两年。这两段时期是我们在实践中碰破了头，集中力量纠正“左”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形成许多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的时期。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两段时期纠“左”并不彻底，“左”的错误的一些根本的政治命题和理论命题未能触动，因此不能阻止这种错误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毕竟应该承认，以七千人大会为中心的前后两年，全党奋斗的方向，是恢复和接续被庐山会议打断的那八个月纠“左”的积极的努力，也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恢复和接续被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打断的那一年半的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且适应新的情况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努力。还有1962年到1965年三年中经济的继续调整，也作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同样值得我们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根本错了，上述几段时期探索和努力积极成果许多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终究不

能把党所积累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全都批倒、抛弃。在实际工作中，在许多时候，党的许多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执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就没有被统统冲掉。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根本错了，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仍然做出许多成绩的一个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党历史的新时期，是以“拨乱反正”为支点的。拨乱，主要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包括导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那些错误之乱。反正，首先是恢复党过去为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进行的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当然，决不可以把新时期我们党的路线看作“文化大革命”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方面的简单复归。在新时期，我们党面对新的实际，有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开拓和新的创造。因为有这些新质的产生和发展，才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但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新时期有其历史的渊源。设想一下，如果抛开我们党为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积累的积极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探索能够顺利地迈开步伐吗？

研究历史发展中继承的一面，又研究历史发展的大转折和新开拓，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的关系，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走自己的道路 ——在中国现代史学会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是邓小平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这篇开幕词不长，但思想深刻，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概括全篇要旨的是这段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那个时候讲“长期历史”，是指从党的一大到十二大，共六十一年。六十一年历史经验，结晶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基本口号。十二大，是我们党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发生伟大历史转折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讲的这段话，也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从十二大到现在，又经历了九年时间的考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中，更加显示出这个基本结论、基本口号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所以，今天来说，它是党的七十年历史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反复论述过他的这个基本思想。十二大以后他的讲话和谈话，汇成一本集子，书名就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书中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结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以别国模式为社会主义范本，因而也不同别国社会主义模式共命运。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依靠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我们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来掌握。试想，如果我们跟着别人的步子走，所谓“亦步亦趋”，或者坐在别人的车子上，命运由别人掌握，那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在自己的国家里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往我们的革命能够自己取得胜利的根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国际变局中能够自己站稳脚跟的根由也在这里。

市人提出问题：不是说过，“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吗？“走俄国人的路”和“走自己的道路”，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的关系很清楚，它们属于不同层次。

“走俄国人的路”，属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十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共产党人到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这代表一种新的觉醒。在这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的口号是“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国人的路”，“走德国人的路”，“走美国人的路”，那时中国人摒弃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想走日本、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这种努力，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都失败

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此路不通。因为走在前面的资本帝国主义各国不断侵略宰割中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新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历史发展的这个方向，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上指明的，十月革命是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最初的尝试。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而调转了视线；中国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作为历史方向的重新选择所表达的实质意义。

社会主义方向选定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具体道路问题，这属于另一个层次。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找自己的道路，而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这就是“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口号的由来和含义。这里面不仅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包括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靠城市起义，而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斗争，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的全新的问题。而要懂得这一点，掌握这一套，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并不是一开始人们都有这样的自觉。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一开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照抄照搬不断碰壁的教训，逐渐使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觉悟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努力和创造，逐渐为党中央领导层的多数所理解，所拥护，成为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的思想。这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比较顺利发展的道路。

革命胜利有一个寻找自己道路的曲折的探索过程，建国以后，如何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又经历了新的曲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299—中，再一次发生了“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已经不是历史方向的选择那个层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办法、方案这个层次了。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借鉴他们的经验，这是历史的必需。我们党也提出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但是，能不能说，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就可以照搬苏联经验了呢？没有谁这样提出问题，实际生活中却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回顾建国初期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导的、基本的方面：我们党继承革命时期形成的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原则，创造性地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建设的任务，总的说来做得是很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方面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世界上只有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先例，而对苏联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又很少了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而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中的不少东西。应当看到，这个方面虽然不能说是主导的方面，但是这种影响是深层的和长远的。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寻找自己道路的那种自觉性，进入建设时期多少有些淡漠了。

觉察这方面的问题，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1956年有了新的开始。这就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演讲。这些虽然只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的巨大精神压力下不能独立思想，没有汲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于是，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兴起了人民公社运动，这标志着我们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八大一次会议为核心的那个探索的开端，由于国内外一些事件的干扰而被搁置了，被认为思路不对头了，八大二次会议要按新的思路另行探索。大家知道，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共产”风所代表的新探索是不成功的。为纠正“大跃进”、“共产”风中当时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我们党又作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当然，中间又发生了“反右倾”错误的波折，后来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尽管“文化大革命”也是标榜要开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不成功的。这两次重大的失败和挫折，给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灾难，给全党很大的震撼。对于我们付出了沉痛代价的这些历史教训，决不可以躲闪、掩饰、淡化、遗忘。同时，在分析和总结这些历史教训的时候，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这些毕竟是我们寻找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是独立探索在几个阶段和几个重大问题上走入歧途的结果。“走入歧途”错了，“独立探索”并没有错。总结走入歧途的历史教训，决不是要放弃独立探索自己道路的努力，决不能得出结论：还是“规规矩矩”；照搬别国模式和经验，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为好。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方向，从总结、研究走入歧途的教训中使我们的探索走上正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历史决议）对于过去探索走入歧途的原因，作了许多分析。由于胜利而骄傲，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和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了；离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凭主观愿望和意志来指挥一切了；违背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日益发展了；等等。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经验。那两次大失误，虽然相继以批判对苏联的教条主义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为号召，但是，从失误的方面说，我以为有两点：第一，没有尊重苏联经验中那些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不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等于要全盘否定苏联经验。把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从苏联经验中学来的和我们自己积累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成功经验，合乎科学的经济建设方法、程序、规章，都当作迷信来破除，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当我们提出一大二公之类的设想的时候，从表层来看是跟苏联不同了，从深层来看，其实并没有摆脱由苏联的经验和理论而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反而把这种模式推到极其简单和急促的极端。而真正要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从被认为是“纯粹”和“高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去寻找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可惜这方面的一些创造性的努力（如“包产到户”等）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给压制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

索，走上了富有成效的正轨。这个历史新时期中的探索，同过去的探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有三重关系：

第一重关系，是纠正过去的错误，主要是历史决议所确认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实践和理论的错误，以及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些指导方针的错误。没有这个纠正，就没有“伟大的历史转折”，就没有历史的新时期，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第二重关系，是继承过去的正确的东西，包括历史决议所阐明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贡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六个组成部分，包括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没有这个继承，就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党和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珍贵遗产，我们就会丧失自己的基本的立足点，从而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样也就谈不上历史的伟大转折和发展。革命的历史如果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会“转折”和“发展”到哪里去呢？

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拨乱反正。上面说的两重关系的综合，就是拨乱反正。

还有第三重关系，那就是在上述两重关系综合的历史基础上，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理论。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全面改革。全面改革，属于这第三重关系。没有这第三重关系，没有新开拓、新创造，也就没有历史的新时期，没有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下称《七十年》）中有一个新论点，引起读者的注意，这就是称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突出“探索”这两个字——“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这个论点其实已经孕育在历史决议中了。历史决议一方面分析了这十年中错误如何一步步发展，直到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另一方面又肯定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这些“在当时和今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不就是——303——“两个发展趋向”吗？后来理论界在这方面也多有探讨。拿我自己说，我就多次提出要研究1956年（以及1957年的上半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1956年的探索和努力继续和发展（见拙著《在历史的转折中》第351页、380页，《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第196—199页）。现在，《七十年》一书明确地提出“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把这个问题的论述提到了新的高度。《七十年》认为这两种倾向（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倾向和错误的倾向），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在概述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时，列举了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三段探索中的积极成果，在历史决议中都已概略地点到，而在《七十年》中进一步作了比较系统和细致的开掘，这种开掘和介绍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以便我们不忽略前人探索中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包括那些只是开始触及，没有展开，尚不完整，并未付诸实

践的东西。思想的火花哪怕只闪烁一现，也是有价值的嘛！在概述“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步步发展的错误趋向时，又指出：“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但是，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在指出这种历史联系的时候又必须看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发展到全新的历史高度，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中正确趋向的积累，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

就是说，除了拨乱、反正这两重关系以外，还必须看到有第三重关系，有新创造、新开拓。

“探索中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是从分析八大后十年这一段历史中提出来的。其实，它也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

《七十年》还有一个新论点，尚未引起人们的谈论，这就是《结束语》中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的历史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

加上建国以前的时期，则整个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三大篇。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篇，经历两大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前篇，又经历两大曲折，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告一段落。第三个时期，社会主义新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而胜利结束？还是到下世纪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胜利结束？这大概要由将来的历史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从这样的三大时期的历史划分中，我们可以更加看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倡导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我们党

和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

在这第三个时期中，我们能不能避免大的曲折，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我们有这个信心。为什么？因为已经有过了前期的大的曲折，正如革命时期实际上也可以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进一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是因为前期已经经历大的曲折，党已经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有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七十年》在论述这种信心的时候，强调指出：“这固然因为党已经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因为党已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并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学到了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或者不真正懂得的事情。”这是说得很深刻的。

实际上，这十几年，虽然也有些小的曲折，总的说来，没有大的曲折，发展比较顺利。即使经历近几年国内外的风波，我们站住了脚跟，局势比较稳定。这就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和威力，说明了这个理论和路线由于十多年来在实践中取得的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比过去（例如比八大的时候）成熟，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我们已经确定的正确的路线，继续贯彻和向前推进这条路线不动摇。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对于坚持自己的阵地、经受严峻的考验、发展我们的胜利的信心，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避免大的曲折、保证稳步前进的信心，就建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决心上。今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讲统一思想，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讲统一思想，就要统一在这里。

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纪。这个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事实，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不少人曾经以为，二十世纪会是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几国胜利，到更多国家胜利的在坦途上发展的历史。没有想到竟然发生今天苏联东欧这样大的曲折。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崩溃，像人们说的那样，俄国人不“走俄国人的路”了。各国人走什么路，是各国人自己的选择，别国人不能干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历史，全人类都将走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都将自己选择或重新选择，经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曲折性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前进性更是历史的必然。在二十世纪初期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二十世纪中叶的辉煌胜利和二十世纪末的艰难曲折，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各国人民经过自己的探索和自己的道路，走向和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的经验，总结到理论上，必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全新的发展，比起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认识必将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

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党史新著 ——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在论述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指出了三条：一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是“温故”。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知新”。知新，需要研究新的历史条件，研究新的实践经验，不能只靠温故；但温故有助于知新，不温故，知新难以有历史的深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薄一波同志新著的出版，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由来，有重要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勇于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非常重视理论，因而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在党的领导层，中心主题就是讨论和总结党的六大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果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就是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全党共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进到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在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广泛深刻的讨论，结果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就是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新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决议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十二大小平同志的开幕词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心口号。

十四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历史的回顾”和“郑重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历史的决议。在这个历史回顾和郑重结论的基础上，十四大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并且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论述。经过十四大，对坚持党的这个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取得了全党共识。

薄老的新著，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四大的历史结论的高度，站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回顾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这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用这段时间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这不但表—309—现为全书立论的基本着眼点，而且几乎在每个章节的总结性论述中都有着力的发挥。比如：在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论述中（第622页），关于八大以后修改对主要矛盾的论断的论述中（第632页），

关于“大跃进”的论述中（第656页），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的论述中（第805页），关于庐山会议的论述中（第874页），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中（第1012页），关于七千人大会和反“左”反右问题的论述中（第1043页），都有这类的精彩议论。真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仅举一例，在论述庐山会议的悲剧时，书中写道：“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政策，从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开了新局面，不正是从庐山会议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类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吗？”

在党史著作中，遵循党的历史决议和十四大的历史结论，体现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决议和十四大结论，是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主观的结论，是在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之后，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总结历史，经过集体的反复讨论，所作出的结论。它们既具有组织的权威，又具有科学的权威，是由科学的权威来支持的组织的权威。遵循历史决议，当然要求人们遵循决议关于重大历史和理论是非的基本结论；遵循历史决议，同时或者说首先要求人们遵循历史决议所遵循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所以。这是一项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进行周密的分析，而这正是薄老新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部著作搜集了毛泽东的大量著作、批语和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谈话，有的讲话（如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是一种科学”的讲话），引用的是原始记录，为如实地研究思想史的原貌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这部著作还搜集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从刘少奇、周恩来，到李富春、陆定一等许多同志）的论述和谈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部著作不仅注意搜集代表中央决策的许多决议和文献，而且注意搜集中央决策所根据的当时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执行中央决策出现的实际结果。这些地方，也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仅举两例，一是书中关于人民公社的酝酿，“共产”风的兴起以及刮这股风的指导理论和具体手段的记述（第728—766页），一是书中关于六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兴起，几位省委书记和几位中央机关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见解，以及中央常委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记述（第1078—1090页）。我认为，在不少历史环节上，这部著作材料的丰富，脉络的清晰，论述的深刻，是其他许多著作不能相比的。这就见出了这部著作的功力。

薄老新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史与论的结合，从总结历史中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我们党现在在这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这集中地见于全书最后一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分散地见于书中其他许多章的论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那一章。其中详细记述了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毛泽东关注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历史过程，从中得出结论：“三十年前，毛主席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

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老指出了这样几点教训：“首先，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其次，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再次，当时防止‘和平演变，所采取的措施，有许多是不正确的”。总之，防止“和平演变”要正确地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斗争，同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站得住，会不会垮，关键在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不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强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断得到改善。如果这方面工作搞得不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谁要‘演变’也演变不了。”（第1152—115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和现在党中央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薄老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他抱着老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和对人民事业、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来回顾党的历史，为我们党在艰难困苦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为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的重大失误而痛心，要求我们通过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我们从事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后辈，身分同薄老这样的领导人不同，但是薄老这些同志研究党史所坚持的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共产党员党史工作者，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在研究党史和人民历史的时候，要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而不能“置身事外”，像研究古代和外国历史故事那样去研究党史，更不能用搜奇猎异的低级趣味去研究党史。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研究当作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层含义。

刘少奇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在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九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讨论刘少奇的著作和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想，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

小平同志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取得了在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他的路线、理论的正确和领导能力的卓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少奇同志也是经过延安整风才为全党所认识的。194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陈云等同志就提出，少奇同志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给以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一篇驳“左”倾路线的文章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的“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党中央电召少奇同志回延安工作。回延途中，毛泽东同志不断给他电报，委托他代表中央解决山东问题、指挥整个山东和华中党政军全局、了解华北情况等重任，并给各地党委电报，要他们确保少奇同志沿途的安全。这一年年底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大字标题：庆祝元旦，欢迎少奇同志回延安。足见毛泽东对刘少奇器重的程度。1943年3月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刘少奇正式参加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党的七大前夕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比较，使全党认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决议》同时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这是重要的历史结论。少奇同志在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为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最有力、最深刻的说明。七大选出了毛朱刘周任五位中央书记。无论是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对毛泽东的推崇，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其他同志的器重，都不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内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关系。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团结、融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党的七大和八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主持召开的两次真正可以说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在八大，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的夺取全国政权和为人民共和国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伟大胜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

这是作者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11月23日发表在《经济日报》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大革命’。” 1963年9月,《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原稿中有一句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有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在审稿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一代领导集体内部的融洽关系受到损害,恐怕要从庐山会议开始算起。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当然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正如小平同志说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错误,不能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别的领导成员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我想,如果少奇同志活到今天;他也会说同样的话。不过,根据胡乔木同志的回忆,庐山会议快结束时,少奇同志曾经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另写一个中央文件,主要是反“左”。在当时的形势和气氛下,乔木同志感到很为难,其他一些同志也主张劝阻,这个文件终于没有写。后来少奇同志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情应该让后人有所了解。

第一代领导集体内部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说:“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本人,“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悲剧。

了解历史,才能忆得现实的由来

从某种意义说,“文化大革命”也有它的“功劳”。这就是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沉痛中觉醒,下决心去开拓一条新路,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我们走上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现在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这条新路的开拓,一是由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是由于继承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过程中积累的一切正确或者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实践经验和方针政策;三是由于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首先要研究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要研究党中央的当代文献,这是没有疑义的。同时也要研究历史,研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重要文献,包括少奇同志的著作。这些年来,《刘少奇选集》上下两卷出版了,《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出版了,现在又出版了《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我认为,这些著作,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17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类著作的出版，只是有对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对现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下大赞成这种观点。现实与历史，不能割断。对历史缺少必要的了解，就不懂得现实的由来。这是一般来说的，具体他说，在新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少奇同志这样的领导人，思考过哪些问题，设计过哪些蓝图和方案，哪些付诸实践了，历史证明它们的结果如何，哪些没有付诸实践，现在看来又如何，当时不同思路的争论，历史给了怎样的回答，当时注意的一些危险，现在是否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当时遇到的二些困难，现在是否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如此等等。了解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

几个饶有兴味的例子

就拿《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这部新出的书来说吧。比如，此书的开卷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这是少奇同志在 194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在这次会议和第二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好几位领导人都谈到革命转变问题。1948 年 9 月，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但即将开始。这时他们就讨论了党的任务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还涉及将来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真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经济建设问题讨论得相当细致，一方面是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是全国解放已经在望，新中国经济建设也到了必需作详尽的政策和工作准备的时候。至于新民主主义要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在理论上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革命转变的任务，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形式来实现这个转变，过去却没有论述过。正是少奇同志在这个历史时刻现实地、比较具体地提出和论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和步骤问题。他在 1948 年 9 月会议上的发言，和这以后几年间的多次提纲和讲话，包括那个引起过争论的天津讲话（1949 年初），勾画了这样一个蓝图：新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三年五年准备，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在同党外人士谈话时也说过几十年）建设；在这个阶段中，国营经济、合作社要有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工业）也允许发展；当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工业化实现），就可以一举实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这可望和平地实现；然后分地区实行农业的集体化，这个蓝图，应该说是当时得到共识的蓝图。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了新的蓝图：从现在起逐步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即逐步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3 年算起十五年完成（而不是十五年以后一举过渡）。少奇同志赞成了这个思路，并在 1952 年 10 月写的提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设想》中作了阐述。这样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原来的蓝图被放弃了。后来的实践，又实际上抛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蓝图，不是十五年逐步过渡，而是三年时间一个高潮就完成过渡。实际生活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有它的逻辑。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比较当时有过的各种蓝图，乃至可能设想的其他蓝图，比较实践了的方案的得失利弊，联系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联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

三个阶段相继发展的设想，比较一下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同和相异之处，这不是很有兴味的吗？

又如，少奇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期十分重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及其在组织、引导、改造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中的重大作用。他强调的重点在供销合作和消费合作，而不在生产合作，他认为，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的机械化，搞不了集体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这方面，他有不少提纲、讲话，包括那个引起过争议的山西批示（1951年7月）。后来的实践是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批评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观点，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手工劳动条件下的合作化，在一定限度内确能使农业产量有所增加。但是，机械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随后迅速到来，而合作化却很快向高级阶段以至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比较当时的不同思路，比较实践了的方案的得失利弊，联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实际，联系到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巨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联系到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长”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适度规模经营是很长的过程），这样来思考思考，不是饶有兴味的吗？

再如，少奇同志于1956年12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摘录了一段，题为《准许私人开工厂》。面对着上海等地出现不少地下工厂的事实，面对着这些工厂的生产有社会需要的实际，面对着资本家中有些有大量定息要找出路和华侨资本需加吸引的实际，毛泽东先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了只要社会有需要，允许雇工办厂，欢迎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的意见。少奇同志随即在人大常委会讲了这篇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不久，恩来同志也在国务院讲了工农兵学商，除了兵以外，都可以搞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的意见。总之，面对着全盘公有制和全盘计划经济在实际中带来的诸多矛盾，毛刘周陈都有过一些改革的设想。这些设想不一定成熟，后来大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实践，来考察一下那时的一些设想，也是饶有兴味的。

从前人的思考中吸取智慧，更自觉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说这些话，绝不是意味着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以至历史上少奇同志的所有意见都是正确无误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意见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而使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以前。当然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并不都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多次说了这一点。我说这些

话，更不是说今天就应该按照少奇同志这些意见来观察当前的生活，指导当前的实践。毕竟历史已经前进得很远了，我们今天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了解，由于经验的积累和历史的前进，总的看来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了。

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应该了解少奇同志这些领导人曾经怎样认真地探索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曾经怎样勤于思考，善于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探索中出现不尽相同的思路，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强调集中智慧，就是要在共同的政治方向和共同的指导思想下，发挥集体中各个成员的独立思考，在多种思路和方案之间作比较，把主观设想同实践结果作比较，从而把各种思路和方案中的合乎客观实际的创见汇集起来，这样才有集体智慧。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我认为历史已经表明，少奇同志对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智慧的创造，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他的许多思路和设想，包含着真理的颗粒，至今对我们的实践仍然有所启发。

让我们从前人的思考（包括他们的所得和所失）中吸取智慧，使自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更加自觉一些，做得更好一些。

散论

从整部《毛泽东选集》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我主要不是讲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而是就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讲一些认识。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把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摆在重要地位。

第二句话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从整部《毛选》中学，从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学。

围绕这两句话，总共讲十一点意见。

一、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又属于中国。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又的确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新的东西；它根植于中国大地，又使中国大地改变了面貌。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正是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发展，使中国出现新面貌。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考察“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又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加了新的东西，主要是使它进一步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用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化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党性修养和价值观念。

我说过这样一个意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总结和概括。”如果这个意见能够成立，还可以据此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它是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在中国是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的哲学论证；是对违背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所作的哲学分析和批判。它对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哲学上教给我们以方法。它是在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是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

这样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明确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目的。

主要方法：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理论，结合总结工作经验、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修养，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主要目的：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以毛泽

这是作音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后所作的报告，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讲座》一书中。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掌握提高觉悟、增强党性的原则和方法，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用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认识活动和工作实践之中。

二、为什么要把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学习《毛选》的重点？

重点不是唯一的。学《毛选》，当然首先要以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为重点，也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整个毛泽东思想。同时，我们必须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又有它的哲学基础，是以一定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指导的。要透彻地了解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

毛泽东说过：“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还说过：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宇宙观”（即世界观），就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把哲学摆到突出的地位。

当然，毛泽东又说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实践，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二是哲学。不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这个说法，同他上面的说法，似乎有矛盾，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和范围来说的。强调基础是社会实践，这是从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上来说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从实践中来，理论适应实践的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给予实践以指导，离开实践这个基础，以理论为理论的基础、来源、检验标准，是不正确的。同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就理论内部的结构和层次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又处在基础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学说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从这样两个角度、两个层次来看待哲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内部作为理论基础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学哪些毛泽东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5页。

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的谈话。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从上面的讨论中，很自然地得到这样的回答：要从整部《毛选》中学，从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学。

首先当然应该提到毛泽东那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还应该提到毛泽东专门讲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几篇著作。但是，光学这些哲学著作还不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六个部分叙述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接着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因此，我们强调要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来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从中“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为研究思想方法论指定学习材料的时候，他提出的第一本书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强调从这些著作中学习思想方法论和认识方法论，可以说，是把这些科学著作当作哲学著作读。所以，学习哲学，不能限于读专门讲哲学的著作。通过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政治著作和经济学著作，读毛泽东的政治著作和军事著作，人们不仅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军事理论，而且可以从这些具体运用的典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好途径，至少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大都选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中了。不过，《毛选》四卷中止于全国解放，建国以后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不在其内。这就不能不提到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这个选读本包括了建国以前和以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就建国以前的部分而言，它还包括几篇未收入《毛选》四卷的著作。

此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199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又发表了几篇未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收入上述选集和专集中的毛泽东著作），这几本书，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读一读都会是有益的。

如果读不了这么多，那么，对高级干部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干部来说，《毛选》四卷和《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没有收进《毛选》的那些著作，是必读的。

下面，我选取《毛选》四卷和上面提到的其他集子中的若干篇毛泽东著作，分为几组，从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角度，说一些我的认识。

四、“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 确认自己哲学立场的一个重要表示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据他同斯诺谈话的自述，是 1920 年夏天在北京的时候。标志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有三篇，即：《致蔡和森等（1920 年 12 月 1 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 年 1 月 1 日、2 日），《致蔡和森（1921 年 1 月 21 日）》。这篇发言，被《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选为开卷篇；这两封信，被《毛泽东书信选集》选为开卷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就是上述致蔡和森的第二封信里的话。

那个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兴会和一时的冲动，而是时代的潮流和人群的需要。毛泽东 1920 年 3 月从北京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是 3 月的事情，经过夏秋到冬天，毛泽东从“种种主义”中作出了选择，看起来似乎匆促，其实是有长期探索作准备的。这个选择，不仅是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长期探索的归结，也是当时中国一代、几代志士仁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长期探索的归结。这个选择，是在对世界大势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行精心观察和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在对当时流行的种种主义、种种哲学进行广泛了解和多方比较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自由争论，而作出来的，不是任何主观力量强迫他们接受的。毛泽东那篇《发言》，是长沙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三天讨论纪录中毛泽东的两次发言。那两封信，第一封是毛泽东回答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旭东、李维汉分别写于 1920 年 5 月至 8 月的来信，第二封是毛泽东回答蔡和森同年 9 月的来信。读一读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和与它们相关联的别人的发言和来信（均见《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作出这个选择的背景、思索和争论，是很有趣味的。

选择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接受它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科学的宇宙观”，首先又是指唯物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句话表明毛泽东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唯物史观上，这是合乎规律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基础。我不赞成那种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斥出去，认为它只属于恩格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01 年版，第 1515 页。

斯而不属于马克思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流行的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实际，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同时我认为，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完全必需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而革命者首先是为探索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思想武器而去寻找哲学的。这就需要寻找对社会历史进程作科学分析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旧哲学中脱颖而出，我认为，是以唯物史观的产生为先导，而以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来奠定基础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不就是举出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两大科学发现吗？

李大钊 1919 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扛鼎之作。这篇文章也是首先和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可能。”蔡和森 1920 年 9 月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也是首先和着重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张“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毛泽东复信中“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句话，正是同蔡和森来信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议论相呼应，也显然受到李大钊这位“时贤”所作的杂志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毛泽东同斯诺谈自己的思想历程，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讲认识论和辩证法，很少讲唯物史观。我觉得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毛泽东给蔡和森这封信可以为证。毛泽东一系列运用和发挥唯物史观来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可以为证。建国初期，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毛泽东强调：“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也可以为证。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所谓四大观点，也是把唯物史观摆在首要地位。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讲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看法之所以产生，我想一是来源于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常常没有着眼于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只注意他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二是过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得不够深入，概括得不够集中，提炼得不够精当，这是需要改进的。

五、《毛选》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国情的重要著作

在许多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努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多反动分子或者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分子，极力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拿出来的“理由”之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比如，说中国根本没有阶级的分别；中国的问题与阶级压迫和剥削无关，如此等等。同这类论调作斗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而要真正有效地克服这种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单纯地介绍外国书本上和外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学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0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6 页。

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果。

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阶级状况，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制定革命战略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说过，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很准确的概括。马克思自己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所以我们必须根据唯物史观的完整学说，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生、发展、消灭摆在由生产力发展最后决定的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总进程中考察，联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阶级的消灭来考察，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和正确的，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中说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并在全书的末尾归结道：“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毛泽东把马克思他们考察现代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所得出的一般原理，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去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阶级行动的具体条件和性质。社会性质不同，阶级状况不同，革命的具体条件、性质、阶段、路线和策略就要不同。中国社会阶级的具体状况，既跟西欧完全不同，也跟俄国有很大差别。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从中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配置和敌我友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党的一大明确选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党的二大制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明确了在中国必须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三大一般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是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东方大国的阶级斗争上的创造性应用。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得如此细致、准确、深刻，特别是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最主要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 - 33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2年版，第377—378页，第443页。

同盟军——农民同盟军问题，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格的问题。这两大问题，尤其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为真正取得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这篇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端。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虽然唯物史观不能归结为这一个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以前，观察和研究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行的，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另一方面，在我国，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教训也不能忘记。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本来就是错误的，认为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些不过是早被历史事实、被中国人民胜利的革命斗争所粉碎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回光返照。

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就要同中国社会的实际及其历史发展相结合。在革命时期，这种结合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了头。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并且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种结合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了头。

六、《反对本本主义》是自觉地提出和致力于 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 路线问题的第一篇振聋发聩之作

《毛选》第二版同第一版相比，保持原有的篇目，仅仅增加一篇，就是这一篇。此文非增不可，足见它的重要。第一版未能收入，是因为此文当时（1930年）虽然油印、石印流传过，却早已在战争中散失。《毛选》第一版编出后，才在福建老苏区发现了这篇文献，六十年代初毛泽东重读此文，很高兴。他说，三十年前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他的著作有些自己也并不喜欢，但是这篇他是喜欢的。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1961年党内重新印发时，改题《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改为现在的题目。这并不是完全新拟的题目，而是原来就有的一个小标题。因为这个小标题准确、鲜明，所以发表时被移作文章题目。全文都讲调查工作，把调查工作当作反对本本主义的有效武器，当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历来注意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调查。前面提到1920年3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其中就强调：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选》的头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直接来自调查的成果。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红军作战和行军的空隙中进行和组织了许多社会调查。著名的解决红军建军路线的古田会议决议，更把对调查工作意义的认识提到

新的高度，即肃清唯心观念（后来一般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毛泽东在这个决议中写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可以说，是后来明确地规范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初步表达。古田决议之后不久写出的《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进一步以极大的尖锐性、鲜明性和针对性，对这个思想作了透彻的发挥，对违反这个思想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保守主义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从1930年到1933年，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农村调查，最重要的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现在都收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

有一句后来形成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的著名口号：“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最先提出来的。随后，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作了补充：“我们的口号是：一，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和红军内错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毛泽东自己从事和倡导调查工作的实践经验的生动概括，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实践第一、依靠群众、独立思考的思想路线。

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一道，《反对本本主义》还提出了“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的口号，强调“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现在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可以说已经初步地提出了这三个基本点的雏形，并且相当深刻地阐明了这几点之间的内部联系。

七、《实践论》、《矛盾论》是标志毛泽东 哲学思想达到成熟的代表作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口号所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当时没有为党的中央所接受。相反，还受到指责，被讥评为“狭隘经验论”。这当然不是抽象的、学理上的哲学争论，而是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争论在哲学上的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斗争经验的实际出发，在努力探索和逐步形成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具体政策。而在一些脱离中国实际，拒绝中国革命经验，把“本本”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领导人看来，却有许多不合乎“本本”，因而被认为是错误的。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加上主客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2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的其他原因，把中国革命几乎拖入绝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危难中走出来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由此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纠正过去的错误，是从军事路线开始的。因为这个问题最急迫，在战争中丢失中央苏区的失败，使军事路线的错误暴露得最明显，解决起来条件比较成熟。随后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就是转变到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了帮助党的干部、党的领导层更好地领会和推进这个转变，还需要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解决。这就是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注重提倡干部学哲学，并且自己在抗大讲授哲学，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据有关同志回忆，主要内容都反映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是一部从中国革命战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来讲战争认识论和战争辩证法的光辉著作，真可以说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哲学著作。毛泽东说，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系统地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的著作，是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它也可以说既是政治著作又是哲学著作，是从思想路线（批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以“本本”为圣经的观点）和矛盾分析（对当时中国阶级矛盾变化的分析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格的分析）的哲学高度讲政治战略的著作。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说，这两篇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声。读《实践论》、《矛盾论》，必须结合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才能增加实感，增加历史感，才能比较深切地理解《实践论》、《矛盾论》作为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著作的意义。

写作“两论”，毛泽东作过许多准备，仔细阅读当时能够得到的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是一个方面的准备。毛泽东阅读这些著作时作了许多批注。在“两论”之前的批注，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即读苏联西洛可夫《辩证唯物论教程》和读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的批注，都收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了。这些批注，有对原书论述的提要或评论，还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作出的发挥。学“两论”的时候，联系读读对这两本书的批注，以及后来毛泽东对其他一些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的批注，是很有益处的。一来可以了解“两论”中许多论述同当时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的联系，以及“两论”中的论述超出和高于这些教程的地方。二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如何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联系对中国革命过程中错误思想路线的批评来研究哲学。这一点，许多批注甚至比《实践论》表现得更明显，因为批注并不准备发表，而在抗大讲哲学的时候，那些批评要含蓄得多。这样联系起来读，既可以克服过去有过的把“两论”中每一个论点都当作毛泽东的创见的偏向，又可以澄清近年来出现的认为“两论”没有什么创造、都是别人教科书中的陈言的偏见。“两论”的独创性，主要还不在于某个哲学概念、提法上的创造（尽管这种创造也不少，而且绝不是不重要），主要是在于它们所体现的把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解决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问题结合起来的原则、方法和成果。这样的创造，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

富于特色的创造。这是任何外国书本和书斋著作不可能做到的。

我认为，就“两论”对中国革命经验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的总结而言，就“两论”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的批判而言，就“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言，就“两论”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队伍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两论”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著作的行列。

“两论”是毛泽东为抗大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这两节是充分展开了论述的，其他十几节都比较简略，所以《毛选》中只收了“两论”。我有一个建议，既然毛泽东读哲学书的批注已经汇集出版，批注的论述当然大都是很简略的，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其他各节虽然简略，同批注比较，重要性绝不在以下。所以，《批注集》再版时，最好把《讲授提纲》一并收入，提供给研究者参考。

《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在章前说明中讲到本章要分述辩证法的几个法则。可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矛盾论》讲完之后，提纲就中止了。显然这个提纲没有写完。毛泽东准备在后面几节中如何论述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五十年代毛泽东换了一个提法：肯定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不得而知了。但是从《批注集》中透漏不少消息。此外，在别的文章中也透漏一些消息，比如：《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新收一篇《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便是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摆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有创见的论述；《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1939年2月致陈伯达、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便是用辩证唯物论评论和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给人启发的信件（虽然毛泽东自己认为所说意见“不过是望文生义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还收入毛泽东在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的一段批语，虽然是后来（1965年）写的，我认为，它言简意赅他说明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规律和范畴体系的精辟见解，如果写《讲授提纲》的当年写完了第三章，也许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见解。当然，读书批注和私人通信跟正式发表的著作不同，未经作者反复推敲，思想未必十分周密，表达未必十分准确，观点前后可能变化。我们现在不会再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著作，更不必说对待他没有准备发表的笔记、书信、谈话了。

八、《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军事、政治 著作的哲学意义

前面我们谈到要联系“两论”以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些军事、政治著作来学“两论”，这里我们讲，还要联系“两论”以后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著作来学“两论”。

我们说毛泽东这些光辉的军事著作和政治著作，同时也是光辉的哲学著作，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这些著作通篇体现了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研究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一是这些著作中常常有一些段落深刻地提出和论述了重要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要是总结过去的中国革命战争，那么，《论持久战》则主要是对当时面对的抗日战争和它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它对战争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各方内部的矛盾，整个战争矛盾发展的趋势和阶段，矛盾双方力量消长的规律，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和争取这个前途的方法，所作的透辟分析，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预见力，不仅武装了共产党人，而且为当时国民党的许多抗战将领所折服。抗日战争后来的进程，证明了这部著作的光辉预见。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结束时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论持久战》中预测的反攻阶段没有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展开。联系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发展，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战争中的运用推到了极高的境界。

《论持久战》中专有一节讲“能动性在战争中”。这一节所论述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重要的论题，对于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与革命者的本性不能相容）和鲁莽蛮干的盲目态度（这给革命和建设带来过许多损害），有巨大的意义。《实践论》中包括了这个思想，《论持久战》中对这个思想的论述，有新的深化和发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是一篇完整的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只是没谈军事。从学哲学的角度来读这篇著作，要从整体上把握这篇著作历史地、系统地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方法论。其中讲到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名言，然后指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这一大段话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论述，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密切不可分的。

《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完整的纲领，重点是讨论文化问题。这并不是说，文化问题应当成为党的纲领的重心。当然不能这样。这只是因为文章是为《中国文化》杂志创刊而作。本来是讨论文化问题，然而，如果就文化论文化，就不可能论述清楚文化的基本问题，所以，就不能不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系的全局的基础上，来展开论述文化问题。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者充分重视文化、思想、精神在革命事业中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就在这个地方，不重视文化、思想、精神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在“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决定于经济和政治，然后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这样的格局中来强调文化、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离开这样的格局来强调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4页。

文化、思想、精神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民主主义论》所依据、体现和发挥的哲学基本观点，仍然很有价值。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不对的。一手硬，一手（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有严重的教训。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党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我们今天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它摆在这个总体布局中间。这就体现了在文化问题上用唯物主义看待历史的观点和从全局看问题的辩证观点。

《论联合政府》，通常人们不大注意在学哲学时提到这部著作，我愿意在这里比较详细他说一说。我认为在这部著作中也体现和论述了重要的哲学思想。

比如说：《论联合政府》是从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入手的。对世界大势，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应当“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个“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对国内前途，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实际状况和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顺利，“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另一方面又指出：形势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好的可能性，好的前途。这种对历史总趋向的判断，对争取好的可能性的信心和勇气，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吗？不是在分析政治形势和确定政治战略的时候，活生生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吗？

又比如，《论联合政府》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其中不仅精辟他说明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关系（前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不变的，后者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阶段中要随情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且精辟他说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一般纲领同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奋斗，对它稍许放松，稍许表现不热情，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不也是活生生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将来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目标和最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吗？

再比如，《论联合政府》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2—1053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1060页。

风。毛泽东称之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从全党来说，这三大作风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党员来说，这三大作风提供了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把理论同实践相脱离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看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提供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又一个根本标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几篇文章，正是按这个根本标准要求于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党员的模范行动在人民群众中提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化为共产党人实践和倡导的人生观。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作风，是对全党来说的，这个党要能自我批评；对每个党员来说，就是要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分析的基本观点，运用于党内生活和党性修养，形成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和准则。

这里，我还要提到首先在《论联合政府》中最明确地提出的两个重要哲学论点：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群众论的结合。《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就包含了这个思想。当然这里讨论的是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而不是某个物理学定理或考古学判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由此而论述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这是对上述结合思想的精辟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过这里主要还是从正确认识的来源的角度来论述这个结合。《论联合政府》中讲党的三大作风，在论述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提出了真理标准同人民利益的关系，这是从又一个层次、另一个角度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又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学习和研究。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被证明为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命题。真理的标准是人民利益，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被证明为符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个命题。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一致又有冲突，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无产阶级利益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一致。这两个认识论命题是否一致？把阶级利益和群众利益引为真理标准是否会使真理失去客观标准？应该说，在有关社会革命、社会进步的真理问题上，这两个命题是一致的。阐明这种一致性，并把辩证唯物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93—1094 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63 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99 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95—1096 页。

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群众论结合起来，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闪光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客观标准，是客观历史规律的根据，而同任何违背这个客观标准的以个人利益或少数人利益为归依的主观标准相区别。人们主观上认为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认识、政策、计划，是否确实符合这种利益，那还要到实践中间去检验。人们常常争论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我以为，《论联合政府》中的这段论述，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两种判断科学地结合起来了。

还有一个是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把生产力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同那些把抽象的道德、理念摆在第一位的历史唯心主义相区别。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条根本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实际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和方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相一致，归根到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所以这里讲的两点，又是相通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原理，本来是相通的。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彻底性和政治上的自信心。我们坚信自己政党的政策，自己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能够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好。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作百倍的努力，作长期的奋斗，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政策、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在建设时期比在革命时期更加现实、更加直接、更加重要。邓小平同志多次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杨尚昆同志在1991年10月28日出访伊朗之前回答外国记者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提问时又讲：“一种社会制度有无生命力，关键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前一段时期对生产力标准有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误解和曲解，必须加以澄清。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必须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有自信心的共产党人应有的观点和态度。

九、整风文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9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81页。

四十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壮大有重要意义。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提出过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当时未能解决，甚至受到批评。“两论”及其前后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著作，制定和阐明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但是要彻底深入地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上面所说的这样一场大讨论。1940年12月，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的指示。这篇文章对过去“左”倾时期错误政策的批评和对当前政策的分析，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政治策略的典范。可是党内对此有不同意见。这说明展开这样一场大讨论的必要。当时战局发展和延安形势的相对平稳又为展开这样的讨论提供了可能。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思想路线的文献。

首先要提到《（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文章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可见，此文同《反对本本主义》密切相关，是对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 and 口号的重申和阐发。围绕这个口号的争论，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多次讲到。在《研究沦陷区》一文中说：“‘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则从另一方面指出：在调查中，“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接着是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一篇整顿学风的纲领。整顿学风，一是要“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这是针对当时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中仍然存在的缺点来说的；二是要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深入清理1931年到1934年的党内路线斗争，从思想路线上作准备。这两个目的又有密切联系。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不对周围环境调查研究，不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强调要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方法。文章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释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从1941年9月起，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历史问题，9月29日中央研究组毛泽东、王稼祥写信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提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

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给“学风”下的定义，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同时中央作出关于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于高中级干部学习理论，规定“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教材”。4月，按照毛泽东的提议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成。

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论，这反映了他对哲学和对学习哲学要抓住哪个环节的一种看法，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哲学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思想科学、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科学、思想方法的研究，的确很有见地。

1942年3月毛泽东还讲过一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4年4月又讲了一篇《学习和时局》，都是结合研究党的历史，讲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有哲学意义的著作。

延安整风有两大成果：一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以来一直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层所广泛接受，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良作风，主观主义被公认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二是产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深入地清理了党内历史上的路线争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理论——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整风达到的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思想保证。

十、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什么新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题目，这里只能就《毛泽东著作选读》中选收的建国后的几篇最重要的文献，简单说一点意见。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是在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泽东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以驾驭全局，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两篇有独特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部已经不再存在矛盾，存在的只是一致；一种无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性质，沿用估量和分析过去社会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估量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毛泽东摒弃这两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坚持到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但是矛盾的状况和性质已经同过去不同。这是当时毛泽东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来具体分析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第一篇著作就是《论十大关系》。前面五条，都是讲的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首先分析这些矛盾，说明当时党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这些分析中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后面五条，是讲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矛盾，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最后一句话，提出了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也是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全局必须抓住的纲（即主要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估量和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理论上又有重要的新发展。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仍然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反映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矛盾有两类：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根本不同，处理的方法应该根本不同。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里明确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也表达了主要任务（主要矛盾）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思想。文章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这两篇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开拓，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讨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抛开这个基础，只能走向迷误，这是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和在它前后的几篇哲学短文（选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

工作方法文选》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关于重新提倡调查研究》，选入《选读》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六十年代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期从哲学上来论述纠正错误、转变作风的必要性和方法的著作。

当时的背景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使我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错误首先是由于违背了过去确立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造成的，纠正错误也首先要从重新恢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手。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中的一段，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自己的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重新发现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信中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强调以实践而不是以过去作出的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这就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毛泽东这时还给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分别写了好多封信，要求他们下去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当然，那时对“大跃进”、“反右倾”还没有从根本方针上认识它们的错误，因而纠正错误还不彻底。但是毕竟纠正了当时已经认识到的许多实际错误，制定了有关调整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艺政策的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文件，使实际工作有了向好的方向的转变。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是调整时期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思想前提。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有一节讲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连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组哲学短文，是力图从认识论上来总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又纠正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著作。

十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 转折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什么作用？

这是我讲的最后一个题目。题目很大，只能集中讲一点，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为我们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前提。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事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这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可以同遵义会议所实现的那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相比拟。这次历史转折的基础，我以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纠正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二是继承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88页注。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89—390页。

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三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开拓新局面。前两条就是拨乱反正，后一条就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这八个字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是概括得很准确的。邓小平同志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理论，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全党展开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由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而展开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观点，在政治上表现出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复杂问题，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加以纠正，才能继承毛泽东思想的优良传统。这样的观点，在思想上表现出“本本主义”，“句句主义”，以“本本”、“指示”、“决策”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用实践去检验各项指示、决策是否正确。这样的思想路线，本来是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本来就在于反对这样的思想路线，倡导和实行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的话被吹捧为“句句是真理”，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这个影响还严重存在，“两个凡是”就是集中的表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哲学讨论，也是一场政治讨论。一场哲学讨论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对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哲学史上和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这场讨论中，克服“两个凡是”的观点，靠什么思想武器呢？靠的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真理标准讨论中分清是非、确定方向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系统地引用了毛泽东从古田会议到《反对本本主义》，到“两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的一系列论述，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由此可见，我们正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过去为我们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新局面的。

如果说，在长期个人崇拜的形势和影响下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需要有胆有识，那么，当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指出和批评以后，一种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涌出来时，指出坚持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把它确立为全党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也需要有胆有识。邓小平同志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了深远的目光和巨大的勇气。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两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论断和深刻的分析。这一个历史决议，专有一章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选读》把它印在了书的前面。《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决议》既反对那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

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态度，又反对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的态度。《决议》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这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前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最明确的回答。

宪法与改革 ——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而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时期。新时期有一部新宪法,就是1982年通过的宪法。这部现行宪法,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进入新时期十四年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政治、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人民物质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而现行宪法,把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提升为由根本大法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是这些成就所以能够取得的重要保证。

新时期我国人民从事的事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是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概括,其实,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即已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称之为“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多次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

第一次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分为两个阶段的这一次革命,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1954年的宪法,可以说,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一次革命的宪法。

第二次革命,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目的是使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宪法。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是指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变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是指改革与现代化进程已经引起和将要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变革不是局部的变革和纯粹的量变,而是全局的多方面的带有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革。改革的时代,是广泛、深刻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这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宪法的,就有变和不变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宪法,应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发展方向不变,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路线不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宪法,还应该保证改革的进行,适应和促进改革所引起的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包括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变革。又变又不变,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相反,这两个方面正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

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现行的宪法,在保证变和不变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宪法,是一部促进和适应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事业

的很好的宪法。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变的。而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在一些小的地区，港澳台地区，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后，允许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政策上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宪法，保证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同时，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保证了必要的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以宪法的这一条为根据的。

又比如说，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根本性质是不变的。而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宪法，保证我国经济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同时，宪法第十一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作了规定，1988年修正后的这一条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私营经济作了规定，宪法第十八条还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外资经济作了规定，这就保证了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进行及其所引起的巨大变化。

再比如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变的。而这种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则是变化的。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宪法第八条对于集体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没有作硬性规定，这就使现行的宪法能够很好地适应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

还有，我国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宪法规定了的。但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1988年修改过的宪法第十条取消了不许出租土地的规定，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很好地适应和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这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又一个巨大变化。

现在，我们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对于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正在进行新的探索。为了适应和促进这种新的认识和探索，人们提出了对现行宪法的有关条文进行修改的问题。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总结过去修改宪法的经验，思考当前修改宪法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一方面，必须承认适应改革的需要而对宪法作适当修改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尽可能避免对宪法进行过于频繁和琐碎的修改，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应该只规定根本的东西，不必规定诸如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管理方式、国民经济调节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这类具体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在对宪法作必要修改的时候，最好按这样的思路来考虑，即保持和完善那些最根本的规定，删除那些不适应实践发展的具体规定，不增加那些不是非写进宪法不可的新的具体规定。

现行宪法，适应实践的发展，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必要的修改，我认为，它必定是一部更加合乎改革时代的需要，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的宪法。我们要为提高对宪法的权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努力奋斗。

论多样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同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我们在文化方面的目标，我想，可以考虑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多样文化。

这个概括突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多样”本身有多方面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一”还讲“多”。经济生活如此，政治生活如此，文化生活更是如此。“一”是主导，是领导，是指导，不是单一，唯一，清一色。“一”之外还要有“多”。“一”之中还包含“多”。活泼多样的统一，而不是僵死单调的统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和“多”的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是“一”。有“一”还要有“多”：多种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港澳台和外资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一”中还包含“多”：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多样（过去就有两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每一种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方式的多样，以及各种公有制经济之间和它们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结合方式的多样。而在统一的市场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和多种成分结合的无数多个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法人，按照法律和市场规则平等竞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也是“一”和“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宪法确认的，这是“一”。有“一”还要有“多”：多个民主党派，多种社会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多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宪法确认的。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统一的法制中，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民主权利，应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义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和“多”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宪法确认的，这是“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也是“一”。有“一”还要有“多”。古、今、中、外，各种各样优秀的文化成果，都要“拿来”，为我鉴赏，为我吸取，这是“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多”。“百”，不就是言其“多”吗？

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多样文化建设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百家争鸣问题。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得好：“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是对于精神、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的最生动有力的说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保证文化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就是宪法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

化活动的自由”。在科学研究和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争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爱国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三个基础，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不同的范围。并不是说，三个基础俱备，才有齐放和争鸣的前提。在不同的基础上，有不同层次和范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爱国的基础上，有最大范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同包括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中的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时候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里不需要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有许多文化活动并不涉及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也有很大范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不反对社会主义，不等于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巨大的责任，去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去争取那些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接受这种思想。而这个任务不能也不应通过强制，而应该通过学习，讨论，比较，选择，就是说，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在这个层次和范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并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和条件，毋宁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为使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更好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揭示更多更深的真理的道路。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内，仍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在从事科学的研究，取得许多有益的成果。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批判地分析和吸取这些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研究。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之外的广阔的学术领域，更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在从事认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百家争鸣，有利于真理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广阔园地。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仍然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仍然需要展开自由的争论。真理只有一个，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通向真理的途径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曲折的，而不是笔直的，普遍真理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会表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点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而这正是具有共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仍然而且必然要有百家争鸣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是一家（这是就世界观、就根本指导思想而言的），一家之内还有百家、多家（这是就具体的学术、理论观点而言的）。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生动活泼、兴旺发达的景象。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许和自期的理论工作者的自觉要求。在这个层次和范围内，说百家争鸣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和条件，是正确的，也只有在这个层次和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地坚持本本上每一个词句和论断。人们在创造着新生

活、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在研究和创造新生活、新世界中，提出新论断、新原理去丰富和发展原来的论断和原理，以至于更新和改变某些原来的论断和原理，那么，生活就会离马克思主义而远去。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也正如小平同志所强调的：“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思想、观点、论断、原理，必定同原来的发生差异和矛盾，这就会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新的思想、观点、论断、原理的萌发、形成和成熟，必定有一个多途和曲折的过程，这中间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探索新的思想，会有创造，也必定会有错误，到底是创造还是错误，也需要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只能实行百家争鸣，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解决。如果教条式地对待“坚持”，认为凡是本本上没有说过的话，同本本上说的有所不同的话，都是有悖于“坚持”的，从而加以压制，不许它们有参加百家争鸣的权利，这样的做法，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

百家争鸣政策提出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严重的教训。远的不讲，单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来说，十几年来，不就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吗？它们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确立，靠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它们之所以屡遭批判和抨击，就是因为在一些气候下一些理论家离开了这样的思想路线和学术方针，拿着本本，用大帽子吓唬人。因为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因为改变了“老祖宗”说过的某些话，就被某些理论文章批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时被置于难以参加百家争鸣的境地。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批的，这种批判应该指向那些真正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不应该指向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为探索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而提出的不同意见。大家知道，直到小平同志 1992 年初南方谈话广泛传达，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才得以比较自由地重新展开，并在党的十四大上被确认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在理论研究中如何坚定地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难道不应该作出一些必要的结论吗？

总之，我认为，百家争鸣，最困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最关键的也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搞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团结也就广泛了。这个层次和范围的百家争鸣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思想就会僵滞，队伍就会变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是要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同一切严肃的学术工作者一道向反社会主义、反人类进步的思想作斗争的。如果思想僵滞，队伍是个小圈子，怎么能有战斗力呢？

赋予党的教育方针以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同志 1983 年 10 月 1 日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过一行字，却作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一书。将来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肯定也会把它作为一篇文章收入。这件事情，说明这个题词的意义之重要和内含之丰富。

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当然是在党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面。

或曰：党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怎么可以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方针，取代原先关于教育方针的提法呢？

我认为，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不是要取代德智体全面发展，取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是要赋予这些教育方针以新的时代内容。

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教育方针。当我们把德智体全面发展纳入党的教育方针的时候，是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规定，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的了。这就是 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教育方针的论述的含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马克思认为它是未来社会教育的先声。1958 年党中央通过关于教育工作的决定，据此把党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我们不再采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个口号曾经被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的理论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即使对无产阶级政治作正确的理解，教育也不能限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应该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所以，现在用“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取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教育方针的认识发展的一段复杂的历史。

德智体全面发展也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也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好，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这些教育方针都应该有新的发展，新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标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等，一句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新的理解。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党的教育方针当然也是如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现代化，首先是把生产力提高到现代水平的进程，是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还包括社会关系各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化经济是市场经济，现代化政治是民主政治，现代化文化是科学文化。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所以，我们所要发展的现代化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所要发展的现代化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所要发展的现代化文化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包括要面向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包括要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教育的要求。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意义不限于教育方面。

应该说，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都要遵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或者说，精神文明建设中历来的各项方针都要由三个“面向”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哪一项工作的方针，不需要由三个“面向”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毛泽东与中国文艺》序

宋贵仑同志的书《毛泽东与中国文艺》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嘱我写几句话。我乐于应命，因为我知道他为写这本书，是作了很多准备的。

贵仑同志上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多年。这个背景为他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准备了很好的条件。1986年我和他合作，写过一篇《“红学”一家言》，是介绍和研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论述的。因为提供了较为完备和准确的资料，而且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在红学界和关心这个主题的读者中，引起了一些注意。

199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五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将《毛泽东论文艺》增订重印，要我帮助他们做这项增订工作。为此我同他又一次合作。说是合作，我不过给他出些主意，提些线索，最后帮他确定篇目，审读注文。工作主要是他做的，资料的搜集，篇目的初选，注文的起草，都是他出的力，而这个过程，也就成了他写作《毛泽东与中国文艺》的直接准备。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篇目有很大扩充，新收了不少过去被忽略了文献。这些文献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它们产生的背景是怎样的，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些，宋贵仑同志想有所介绍和评论，就都写在他自己的这本书中了。

搜集到的毛泽东论文艺的文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收进《毛泽东论文艺》中，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献是毛泽东讲话、谈话的记录，或者是当时的记录，比较完整和不大完整的记录，或者是后来的回忆，比较准确和不大准确的回忆。它们都未经毛泽东审定，不便作为毛泽东正式论著选入。但是，它们对于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对这些文献，作者想有所介绍和评论，也都写在他自己的这本书中了。

还有一些毛泽东论文艺的文献，虽然是亲笔批语、亲笔修改，也没有收入《毛泽东论文艺》。因为这些文献中的思想，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基本上错误的，《毛泽东论文艺》作为反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内容的读物，自然只选其内容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文献。然而，要全面考察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对错误和失败这一侧面也应该有所了解。对于这些，宋贵仑同志也在自己的书中有所介绍和评论。

这样，在宋贵仑同志的这本书中向读者介绍的毛泽东论文艺的文献，比读者从《毛泽东论文艺》读到的文献，面要宽得多。在广泛地、多方面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这本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并且作了若干新的论述和概括。

比如，把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开端，这是有见地的。把1949年7月毛泽东作了大量修改并经他审定的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作为全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开端，这个论述也是如此。这两篇文献都是过去被忽略了的，而其中又都有重要提法。特别是后一篇文献中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375育。”文艺运动要“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配

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主要任务”和“两个配合”的提法，本来应该成为全国革命胜利后党的文艺路线的新起点，可惜的是后来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回到了这个提法。

又如，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三个高峰”的概括，关于新时期党的文艺路线的中心和基点的概括，我以为，也是有启发的。

关于“三个高峰”，第一个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高峰，第二个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代表的高峰，第三个是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为代表的高峰。第二个高峰，虽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那时提出的重要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而且应该看到它们为第三个高峰的形成作了一定的历史准备。

关于新时期党的文艺路线的中心和基点，这要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和基点去探讨和研究。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反映到文艺路线上，一个中心就是“重在建设”，两个基本点就是“二为”和“双百”。“重在建设”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文艺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个是文艺工作本身以建设为中心，以繁荣文艺为中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新时期不仅要体现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上，而且要体现在文艺的对外开放和文艺体制的改革上。

这样的概括，如果离开历史和现实，作空疏的讨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宋贵仑同志的这本书，联系丰富的历史资料 and 现实情况来作这样的概括，就可以对统摄资料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毛泽东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

十九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

有三个伟大人物，即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二十世纪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其目的，一是要推翻腐败的社会制度，二是要改变落后的经济技术状况。前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后者是产业和科学技术的革命。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但是没有能够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所以后来他同共产党合作，转向新三民主义，要走这条新路来取得革命胜利。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宏伟壮丽，令人神往。他想要中国补上西欧把世界其他部分甩到后面的产业革命这一课。由于前一方面的革命尚未成功，这个计划只能停留在纸上。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先是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接着，又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最伟大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社会制度的基础。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他要求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大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于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说：“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

这两番话，当然还有他在其他时候和场台说过的许多话，充分说明，毛泽东的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包括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两个方面，即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方面的革命以外，还有一个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来求得实现的产业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宏伟目标。

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毛泽东从思考宇宙、社会、人生、思维的辩证法的角度，关心自然科学的基本的和最新的成果；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从实现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关心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它在工业、农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改造中的

巨大作用。可惜由于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他未能领导我们把精力集中到实现他所提出的技术革命和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上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的这个历史转折，包括三个环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也就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在新的革命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这个新的革命，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的胜利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是它的继承和发展，包括如邓小平所说的：“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国人民迈开了走向民族振兴的坚实步伐。这预示着二十一世纪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世纪。

后 记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主要是我 199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主题都是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发展，所以就以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作为书名。

1991 年秋天，理论界许多同志分外深切地感受到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多么的重要。在国际变局和国内风波中，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不就是因为十多年来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果吗？坚持沿着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就有前途，中华民族振兴就有希望，停止甚至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而这样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还做得很不够。从自己做起吧。于是，我重读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又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借来了报刊上发表过的邓小平言论的全部剪报材料。在新的形势下重读这些文献，有新的体会，而且我发现，剪报中有不少内容，如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一些重要论述，还没有收进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那些，有的我过去就没有注意到，有的在报上发表时一看而过，也没有记住。于是，我开始写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用个什么题目？我记得，从照片上看到过，七大的会场上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会标。1949 年 2 月北平一解放，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珍藏至今，它的扉页上也印着这个口号。旗帜问题，是关系到方向，关系到胜利的大问题。所以我就拟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这个题目。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讲习班邀我讲课，1992 年 1 月 8 日我就以这份笔记的初稿为依据去讲了一次。在继续整理笔记的过程中，传来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消息。快何如之！3 月底，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把这份笔记整理完毕。我觉得，这份笔记回顾了小平同志许多重要思想的由来和发展，搜集了比较系统完备的材料，对于人们学习南方谈话是会有帮助的。《解放日报》不吝篇幅，用四个大版，三天连载，把它登了出来。我为自己，也为读者，感谢报纸的不平常的支持。

这时，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召开哲学界人士座谈学习南方谈话，我作了题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发言，《文汇报》拿去，第二天就发表了，赶在《解放日报》发表那篇笔记的前一天。《新华文摘》全文收了。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界引起一些注意。这当然是因为文中所介绍的内容，特别是小平同志几次有关市场经济的论述。许多同志都说过去没有注意到，而市场经济问题正是当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人们纷纷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中国工商管理研究》杂志创刊，要转载那篇笔记中“坚持改革开放”那一节，借这个机会，我又作了一些补充。

当然，我的两篇文章也引起一些非议。除了因为我行路不当心踩了人家脚上的鸡眼，只好十分抱歉以外，主要当然还是因为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的确很深，381 换脑筋并不容易。

不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讲起，讲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再加上他 1979 年就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

市场经济，1985年又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表达得很朗白了。当然不是说，小平同志讲了什么观点，就得句句怎么样，关键是他的这个思路，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打开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新路。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明确地阐述了他赞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观点。这样，问题就更清楚了。8月，我出差到青海，出差期间写了《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以对谈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小平同志有关市场经济问题六次论述（我当时掌握到的有六次，比前述的笔记中又增加了薄一波同志文章中介绍的一次）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对这些论述意义的认识，这是应人民出版社编《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之约而写的，《党建》杂志经人民出版社同意，先予发表了。

这三篇文章，收在本书中，列为一辑，总题为《论南方谈话》。

然后就是十四大。围绕十四大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主题，我写了几篇文章。有短的，有长的。最长的一篇，是以在中共中央党校和其他一些场合所作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就是《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这一篇。其中有些部分，单独拿出来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解放日报》（《新的伟大革命》）、《黑龙江日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逻辑体系》）和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最短的一篇，是在《文汇报》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精髓·前提·哲学基础》一文则是为《经济日报》写的。

1993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题为《线索和阶段》，从十四大的论述谈我对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解。其中关于市场经济问题，我从更长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这是因为这之前的3月，我到香港参加《大公报》报庆“中国市场经济与亚太地区发展”研讨会，作了题为《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的发言，其中所作的这种考察，就用到这里来了。另外，小平同志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论述，又根据新掌握的材料作了补充，总共达到十二次。《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线索和阶段》，《新华文摘》也都全文收录。

这四篇文章，收在本书中，列为一辑，总题为《论十四大报告》。

然后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我写了《意义和要领》，也是为在中共中央党校和其他一些场合作报告而写的长文，全文在《党建》杂志发表。应报纸的要求，其中有些部分分别在《经济日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军报》（《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文汇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解放日报》（《南方谈话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发表。

郑必坚、逢先知和我三人合作，写了一篇《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发了通稿，《新华文摘》全文收了。

以中共党史研究会组织的一次报告为基础，我还写了一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送《中共党史研究》。

《意义和要领》这篇，加上十年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时我写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两篇文章，收

在本书中，列为一辑，总题为《论 邓小平文选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正逢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这就给纪念活动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色彩。

上海辞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毛泽东思想大辞典》，约请我写一个总条目：《毛泽东思想》。我和石仲泉同志合作，承担了这项任务。主要是石仲泉同志写的，我们商量了框架和思路，我对他写出的稿子提过一些意见，修改了一些地方，增写了一些部分。越写越改越长，所以又单独作为一本小册子印行，书名为《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此书的结论部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题，在《学习与研究》发表，《北京日报》转载，《新华文摘》也全文收了。

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三位同志，发宏愿采访百位名人学者谈毛泽东，编成了一部很有份量的《说不尽的毛泽东》。同我长谈了一次，访谈录题为《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先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发表，《瞭望》摘要转载了。

宋贵仑同志写了一本《毛泽东与中国文艺》，我给他写了一篇序。因为我曾同他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正是这项工作引起他写这本书。

中国管理科学院、《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联合召开“毛泽东与科学”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毛泽东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篇短文，这两家报纸和《光明日报》都发表了。

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中共中央几个单位联合召开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我提交了《邓小平论毛泽东》这篇论文，会议前夕在《人民日报》发表。

高路同志访问我，谈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我请他根据我们的交谈，根据我同张素华等同志的谈话和我同石仲泉同志写的书的导言、结论，组织编写。这就是毛泽东诞辰前两天在《经济日报》发表的访谈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论毛泽东》这两篇文章，收入本书中，列为一辑，作为全书的《总论》。

本书还有一辑，总题为《论党史研究》。1991年，胡绳同志要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修改定稿工作。我负责修改、改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两章。这也是我近年参加的一项较大的写作工程。出版之前，我在《学习与研究》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的发言。出版之后，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遵义召开的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走自己的道路》的发言。这些，同我1993年在薄老著作座谈会上和在纪念刘少奇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合在一起，列为一辑，而以《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与党史研究》为这一辑的首篇。

全书最后一辑为《散论》。首篇是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后，我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的一个讲座所写的讲稿，其中一段以《论联合政府的哲学意义》为题，单独在《学习与研究》发表了。其他的都是1992年、1993年写的。

我的上一本论文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收到1990年。现在这本论文集，从写作的时间到论述的主题，都可以说是同上一本相接续的。

编辑的时候，对各篇文章之间重复的部分，尽可能予以删除或者删减。仍然不可能完全避免重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有些引文，原来引用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当时报刊发表时的文本，凡现在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了的，都改用新的文本。

作为作者，我还要在这里对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热心和支持，对萧淮苏同志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表示谢意。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于万寿塔下

